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月號總56期

No.56 JAN. 1988

總理養子接總理

專制機器加效率

改善專制,民主免談

中共十三大內情剖析



趙紫陽改革方案製作內情 ● 鄧力羣下台內幕

迎接 中國民聯三大召開

中國之春編輯部就組織中國新型民主政黨

舉辦徵文活動並徵集新政黨黨綱黨章草案

中國之春自發起時起，就充分意識到中國大陸成立反對黨的必要性。此後為了推動工作的需要，我們成立了推展民運的壓力團體——中國民聯。

當前，根據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很多人士認為現在是討論成立中國大陸新政黨的時候了，像民聯這樣的團體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新政黨應該喚起大陸、台灣、香港、海外每一位關心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中國人更多的使命感和參與感，讓大家都來關心國家大事，為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體，為中華民族的起飛而奮鬥。

中國目前的形勢令人憂慮，海峽兩岸和香港充滿了危機。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十年，也是歷史再一次賦予中國人民以振興起飛機會的十年。不少人士認為，不管中共改革是否成功，成立新政黨都是情勢所需，歷史必然。如果中共政治改革成功了，中共應該發生質的蛻變，新政黨將作為一個合法反對黨而登上政治舞台，成為反映民意、制衡執政黨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中共改革徹底失敗了，統治者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勢必激化，那時新政黨將同全國人民一道，為收拾中國大陸的政治殘局而努力。

一個政黨的成立，一般而言，應具備如下條件：

- (一) 有一批決心奮鬥到底的骨幹份子；
- (二) 有一個適應國情的黨綱和黨章；
- (三) 有一個支持政黨活動的財力。

有志組建中國新政黨的人士，應在這三方面下一番功夫。

為推助中國新政黨的成立，本刊編輯部現舉辦徵文活動。徵文活動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一、有關新政黨成立的時機、組織形態、理論基礎、運作方式的探討。本刊將出專輯選登優秀稿件，稿酬從優；

二、徵集新型民主政黨的黨綱黨章草案（參考各國民主政黨之黨章并結合中國國情）。凡提供行文嚴肅、字數超過一萬字的黨綱黨章草案者，本刊將贈全套中國之春雜誌（個別缺期除外），并將列為本刊永久性榮譽訂戶。



爲下次民運高潮進行策略與組織準備

——迎接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二年前，中國第一個海內外配合運作的民運團體——中國民聯，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當時的形勢下，大會制訂了「支持改革、推動改革、批評改革、超越改革」的民主運動總路線。大會並預言，民運高潮還會到來，並舉出了民運高潮到來的條件。

民聯二大召開後的一年內，海內外民運人士做出了種種努力，利用各種手段，同極權專制進行了艱苦而又巧妙的搏鬥。

在海內外民運人士的共同推動下，一九八六年底，國內出現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高潮。遍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們，勇敢地走上街頭。他們舉着「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喊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時代最強音。

這次中共奪取政權以來規模最大的學生民主運動，傳播了自由民主的思想，鍛煉了新一代民運人士，也扭轉了人們對中國年輕一代的看法。另外，這次學運還有一個最大成就：它第一次迫使中共當局向人民公開低頭，按着北京大學遊行學生們的要求，釋放了被捕的學生。這項成就，在內心深處鼓舞了青年學生，顯

示了團結的力量，對今後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有巨大的促動意義。

這次學運，證實了民聯二大的一項預言：民運可在「改革停滯在一定程度而人民又尋求進一步突破時」出現高潮。

民聯二大另外還有一項準確的預言：「新舊洋務的推動者，既想引進西方多元民主社會的資本、先進科技和管理方法，又想維繫原有的腐敗制度，這就注定了不樂觀的命運。」歷史的發展果不出我們的預料，改革派的首領之一胡耀邦，在民聯二大開後一年便被整下台。

學運被鎮壓之後，當我們冷靜下來總結經驗教訓時，我們發現，一九八六年底的民主運動有如下不足：(1)缺乏明確而實際的短期及中期目標；(2)缺乏有組織的領導。

缺乏短期可以達成的目標，運動的參與者就難以獲得成就感；缺乏可以達成的中期目標，運動則不容易持久，易出現暴起暴落的現象。制訂具有策略性的中、短期目標，協調本校、各校與各地的運動進展，乃依賴一個有組織的領導系統。下一次民運高潮的中、短期目標是什麼？如何把這一目標傳佈到大陸各個院校

？如何在各校籌建不被當局明顯察覺而在情況需要時又能發揮協調作用的民運團體？這些都是所有民運人士面臨的課題。

二大之後，在國內學運的東風鼓舞之下，在胡耀邦事件的沖擊之下，中國民聯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已聚集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人才，這就為醞釀、促發、引導下次的民運高潮，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中共十三大之後，幻想的迷霧又擴散開來，民運再次呈現低潮。但我們可以預言，當形勢的發展再次打碎人們的夢幻時，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必會出現。一九八五年底，中國民聯二大召開時，也是正值低潮時期，但在一年後就出現了學運高潮，而且來勢之猛之快，使很多人有措手不及之感。二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基礎雄厚了很多，我們的經驗更為豐富，我們應該為下次民運高潮的到來訂好策略並進行必要的組織準備。當然，組織準備是個長遠的工作，短時間不可能完全做好，但在民聯三大上，我們至少要明確下一步組織工作的方略。

民主萬歲！

預祝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成功！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八年一月號總五十六期目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社論●

3 ■ 迎接中國民聯三大召開

讀者●作者●編者

6 ■ 短評三則等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胡平等

本期專題 中共十三大剖析

10 ■ 試圖走向理性專制的宣言

——王炳章談中共「十三大」

(本刊記者) 羅惠平

14 ■ 行政改良的死胡同

——留美學人關於「十三大」座談會紀要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 呼延民整理

24 ■ 「十三大」與中國大陸政情的發展趨勢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冷橫眉

27 ■ 重大突破與遮羞布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胡驕

29 ■ 是改進專制制度，還是建設民主之路？

(中國六陸留學生·耶魯大學博士候選人) 兼大長

民運報導●民運論壇

31 ■ 改革派，我們不能無限定期地體諒你 (本刊記者) 曾明九

34 ■ 學潮在繼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奎星

35 ■ 中國民聯關於魏京生近況傳聞的聲明

35 ■ 從外電傳魏京生死訊所想到的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鄭欣

36 ■ 通向自由之路

——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實行真正的民主嗎？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李少民

40 ■ 關於中國革命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基英

45 ■ 從歐共談中國、台灣與世界 (台灣旅美學人) 楊雲

51 ■ 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遺產及其代表黃宗義 (美國) 丁楚

●專題 美國憲法二百周年 (三)

57 ■ 自由、民主、和解、創新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微言

編者的話

鄧力群下台了，不少人感到愉快。很多人以鄧力群下台的表象來看待中共十三大。我們願提請讀者們注意：四人幫垮台時，中國人民更是一片雀躍。然而，四人幫的垮台真正解決了中共的問題了嗎？十一年的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如今，鄧力群也下台了，何必再來一場空歡喜？為了揭開表象，做更深一層的透析，認清中共所謂「政治改革」的實質，本刊編輯部特邀數位大陸留學生開了一個討論會，並組織了數篇稿件。讀者們在讀完本期「十三大剖析」的專題後，有何不同意見及感想，請寄給本刊，我們願進一步爭鳴。

愈來愈多的留學生開始訂閱本刊，不再「白吃免費的午餐」。我們希望有能力訂閱的留學生都這樣做，因本刊的經費實在有限。

更可喜的是，留學生的來稿也愈來愈多，有些開始使用真實姓名。「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想想幾年前連閱讀「中國之春」都會受到官方警告，看看現在大批留學生投稿本刊，不可不說其間已有了巨大變化。再過幾年，你會發現，原來在「中國之春」用真姓名發表文章是一件平常的事。

下期預告

台灣開放黨禁並成立反對黨，對大陸民運有很大鼓舞。一些大陸民運人士也醞釀組織反對黨。本刊就此問題廣泛徵集了意見，發覺看法差距很大。下期，本刊將選登一些來稿，對組織以大陸為背景的反對黨問題，展開初步討論。

周恩來的義子李鵬，已正式接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政府工作。在留蘇派首領李鵬主持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將會出現什麼結果？本刊擬組織這方面的稿件，歡迎大家踴躍投稿，尤其是內幕性稿件。

國內快訊

- 64 ■ 一場改革派「初勝」的拳擊賽 (國內) 曉波
- 67 ■ 中共沒有放棄武裝攻台的野心 (國內) 許肇時
- 69 ■ 中國大陸軍火「一枝獨秀」 (國內) 許肇時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縱橫談)

- 70 ■ 醫生難治自身病 (中國民聯) 王炳章

兩岸風雲

- 71 ■ 在溫馨懷抱的背後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梁堅
- 74 ■ 義士何必曰利 (台灣留學生·美國) 郭斌
- 74 ■ 溫元凱打出一張「牌」 (台灣留學生·美國) 莊夢蝶
- 75 ■ 文學大師梁實秋病逝台北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王秀平
- 76 ■ 要文詞，不要武詞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劉小梅

專論

- 77 ■ 西藏暴亂的背後 (藏族留學生·美國) 阿沛·晉美

大陸專欄

- 85 ■ 物慾橫流的彭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葛飛
- 86 ■ 「三年災荒」回顧質疑 (美國) 匡建昌
- 88 ■ 中共向錢看了 (日本) 黎音
- 88 ■ 中共牢不可破嗎？ (香港) 關金城

留學生專欄

- 89 ■ 給中國大使館教育處一秘俞肇基的一封信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吳方城譯

- 90 ■ 國際關注楊蕪案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張朝

- 92 ■ 中共不敢公開報導赫姆斯案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張朝
- 28 ■ 還是回不去好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太德

- 23 ■ 因為有了他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陳明郁
- 50 ■ 一件小事 (美國) 馬嘉正

台灣專欄

- 93 ■ 民進黨中的台獨陰影揮之不去 (華僑·美國) 周立仁
- 95 ■ 第五個現代化 (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 張俠

文藝園地

- 98 ■ 海外無產者的煩惱 張諱
- 91 ■ 贈郭城(詩) 楚人

讀者·作者·編者

短評三則

讀完「中國之春」第五十五期「讀者、作者、編者」欄，有幾點簡單的意見想談一談。

一、朝開牆在和我商榷的短文中指出，資產階級民主並沒有欺騙性。我以為是不錯的。去年九月五日在北京舉行的關於「論言論自由」專題討論會上，一位朋友建議我在文章中刪掉毛澤東同志關於言論自由的論述一段文字，因為毛澤東本人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青年論壇」）。這個意見也很好。

不過我想說明的是，我當年寫這篇文章，主要目的在於應盡可能多的人接受言論自由的原則，確立自由民主的最基本的共識（CONSENSUS）。為此，我必須充分照顧到國人的一般思想基礎，確切地說，我必須照顧到那些對官方意識形態還真誠地信仰，或者是對之還缺

乏足夠的批判能力，但仍舊抱有一種較為通情達理的態度的人們的思想基礎。這就需要盡可能採用他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和方法。我要說服的是那些原本不贊同言論自由的人，而不是那些原本就贊同言論自由的人。

二、成功先生在「人心向背和革命實力」一文中，寫道：「中共號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在這個組織領導下的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現在中共又把知識分子的地位提至僅次於工農的第三位。根據目前的中國大陸的基本階級成份來看，無論從黨內還是到黨外，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包括在統治基礎之中了。所以當今民主革命派的任務是十分艱鉅的。」等等。

這段話令人費解，既然是「號稱」，又怎麼能一定當真呢？蘇聯領導人稱他們的黨是全民黨，那是否意味着全體蘇聯人民就真的都是蘇共的統治基礎呢？中國古代的地方官總是自稱為和被稱為「父母官」，那是否意味着他們就真的是其治下百姓的仁慈的父母了呢？

三、關於陳捷宏的「有欠考慮」和「春編輯蕭爽的「責任在誰」兩篇短文。

作為「留美同學、知識份子、民主與現代化討論會」的組織者之一，我認為中國之春第五十三期上的報導還是如實的。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報導是否如實（據我所知，大部份發言者都不認為在報導他們發言時有原則性的失實），而在於它發表在「中國之春」這個被我們某些領導人認定是「有問題」乃至「反動」的雜誌之上。

前不久我和兩位領事聊天，說起中春發表我的「論言論自由」文章一事。他們以為那是「不好的，因為中春「有問題」。我表示不同意他們的看法。這不僅僅是因為我根據我一貫主

張的言論自由原則，認為我們的政府應當學會容忍像中春這樣的主張自由化的雜誌，而且也因為我強調說，一篇文章、一個講話，假如說它本身的內容無可厚非，那麼它發表在何種刊物上就完全是「不相干的事」。我說：「當年毛澤東在世時，西方許多出版社、許多報紙，其中大多是『資產階級的』，有的甚至是『反動的』，或是一些恐怖份子的，紛紛刊載出版他的著作，從來沒聽說毛澤東發過抗議或是聲明劃清界限，可見，你可以根據一篇文章本身的內容去批評它（當然，絕不能搞因言治罪），但不能根據它發表在什麼刊物這一點去進行指責。」

這裡我打算再多說兩句。在過去多年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中，人際關係和一般道德觀念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其中，所謂「劃清界限」一說無疑是起到了相當惡劣的作用。反觀今日國內，自由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們學會了和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正常相處。那些被欽定的「問題人物」非但不像以前那樣遭受孤立打擊，反而往往能得到更多的關切與同情。這就使得某些人試圖以「劃不清界限」為理由給別人穿小鞋很難得逞。

聯邦德國一位十歲的男孩子寫信給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地球上不僅有人，還有動物和植物。難道僅僅因為觀點的不同，就要把這個有四十億年歷史的星球毀滅嗎？」

話是天真的。然而，倘若人類不能普遍建立這種天真，我們的星球確實非毀滅不可。

同樣的，那些堅持要以觀點的不同去阻止人們之間的正常交往的人，實際上是在繼續摧殘我們這個民族。

（中國大陸留學生 美國）胡平

言論和行動可否割裂？

讀了貴刊連載胡平的論言論自由的文章，深為作者的獨到分析所感。十一月十四日，胡平同學又來加大柏克萊講演，講當初他為什麼要寫論言論自由，而一些觀點又比發表的文章更進了一步。

但讀了他的文章，覺得有一個基本的不足之處，就是他在引用邏輯界中一種以分層的理論解決理論問題時，把言論和行動割裂開來，認為言論應該不受限制，而行動的自由却應該受到約束。

在柏克萊的講演中，胡平同學同意，對言論自由中的言論，是有一定法律規範的。諸如誹謗、色情、暴力等等。應用同樣的推理，對行動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法律規範，行動的自由也應該是絕對予以保障的。

言論的自由固然十分重要，但行動的自由如果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樣重要的。尼克松總統如果不是顧忌美國人民對他採取行動，大概不會那樣懼怕新聞界對水門事件的揭露。行動的自由，小從搬家、找事、擇偶；大到集會、遊行、示威；直至選舉、監督各級政府，對人民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一個把人當作螺絲釘的政府，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我們的體會，大概也是不淺的。

言論自由是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自由又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中不可割裂的一環。爭取言論自由，是爭取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重要一步。而言論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個充分民主、自由、法治、尊重人權的社會中才能得到保障。

對胡平同學的勇氣、博學表示由衷的敬佩

，上述膚淺的看法，謹與胡平同學商榷。
(中國大陸留學生) 加大柏克萊

建興

從里根總統和夫人的病況所想到的

不久前里根總統和夫人相繼患病，各家電視台、報紙均以特大新聞作了報導。為了說明病狀的所在，電視上居然出現總統生殖器部位的示意圖以及總統夫人乳房的X光側影。一國的總統和總統夫人患病當然是國家大事，新聞機構的人民報導情況實屬正常，美國人民對此毫無異議。可是這一事倒對一位長期生活在封建極權統治下的我來說卻感到驚訝萬分。

衆所周知，古今中外的極權國家總是把統治者患病的信息予以嚴重封鎖，然而在科學昌明的年代要封鎖客觀存在的事實，多半是徒勞無功的。於是猜測、傳聞紛紛，這就是專制獨裁國家所共有的怪異現象。舉例來說：七〇年代大陸醫務界接到中央指示要對「老慢支」進行攻關，所謂「老慢支」即老年性支氣管炎，是一種常見的老年人的慢性病。奇怪的是五〇年代，六〇年代不提攻關，偏偏到了七〇年代才下達緊急任務。難道是那批自稱「人民的服務員」的權貴突然想起千百萬老年人的疾苦要為他們「服務」了？不！絕對不可能！於是人民開始思索，猜測，原來二〇年代有相當一批官僚已邁入了「老慢支」發病階段，自身體會到這種疾病對他們肉體造成的痛苦，不難理解，下達攻關命令，實際上是緊急呼救的嚎叫。

天安門事件發生前，有消息說上海醫療器廠接到突來任務，要研製一種能幫助癱瘓病人定時翻身的床，儘管報紙上天天印着「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字句，可是這位封建暴君病

入膏肓的消息，已家喻戶曉了，當然消息不可能來自電視和報導，更不用說在電視上會出現「他」或「她」的生殖器圖像（江青動過子宮手術），因為誰膽敢這樣做「老娘非殺你個人頭落地，株連你九族不可」！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邱奇於美國

推薦一本書

我想向關心中國前途的讀者推一本
即《TODAY'S ISMS—COMMUNISM
FASCISM, CAPITALISM, SOCIALISM
》，作者為 WILLIAM EBENSTEIN 及
EDWIN FOGELMAN 兩人皆為美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我所讀到的是該書英文第八版（一九八〇年），不知有否更新版本或中文譯本。

這本書對當代流行與得勢的四種「主義」，即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做了相當客觀和具有說服力的論述。尤其是關於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踐特徵，起源，相互比較，發展前途等問題，該書的論述對有意探討中國社會今後發展方向的人具有啟發作用。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該書對中國當代社會本身做了詳盡的討論（這大概要靠某些來自大陸的學者來承擔），而是因為當今的中國青年正處在為自己或為祖國選擇「主義」（或拋棄「主義」）的時代。

我敢斷言如果將這本書譯為中文在大陸發行（該書文筆簡明易懂，翻譯不難），一定會掀起一陣讀者熱——當然目前的中共政權似乎不會容忍這種書籍的翻譯發行。

在此，我還想向《中春》編輯部建議，開一個「讀書園地」或「書籍介紹」或類似的什麼小專欄，向《中春》的讀者介紹一些有益

的著作（比如 JOHN SQUARE MILL 的《ON LIBERTY》）。

（中國大陸留學生）程實於北美

帽子工廠製作出來的 荒謬帽子

最近，蘇紹智被扣上「用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這是四人幫帽子製造廠「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變相新產品，可笑的是，反改革派這一論點，還比不上當年「四人幫」的理論水平！

打着紅旗反紅旗，就像穿上敵軍的表面服裝，去襲擊敵方。

這樣說多少還有點講得通。但「用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却令人費解了。共產黨人堅稱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是宗教。那麼，我們就把這種主義歸納入科學種類中。科學是有其實質和特定的內容的，並不帶有表面的服裝。比如牛頓定律，我們就不能說出「有人穿上牛頓定律的表面服裝，去攻擊牛頓定律」這種蠢話吧？！

馬克思主義如是科學，就必有其實質和特定的內容，怎麼能找一件「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反「馬克思主義」呢？

再說，科學是不怕攻擊的，被攻擊垮的科學必然是假科學，同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怕攻擊的，假如馬克思的一些理論沒有被他自己的另一些理論推翻，馬克思主義就更顯得偉大，假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可以被他自己的另一些理論推翻，就證明這種主義在今天已經不合時代的要求，這種主義是一種個人的見解（OPINIONS），而非真理（FACTS）。

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自身經不住考驗，而是靠「搞運動」封住別人的嘴巴，

又「及時地」把批評它的理論家們按強制手段加以「處理」，馬克思主義理論才顯得安全，那麼，這種理論，是否科學，是否真理就很明顯了。

所以，奉勸帽子公司在給別人製造帽子的時候，應該懂得一點關於帽子的常識。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廣昆

要研究農村問題

我建議中國之春組織關於「中國農村改革」的文章。中國是有八億農民的國家，因而農民問題怎麼能忽視呢？這使得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比較艱難，而不同於西方許多國家。近八年來，中國農村的所謂改革（這是衆口一詞讚譽，也是中國當政者們近年來的引以自豪的主要政績，但我對中國農村的狀況一直在憂慮之中）的實質是什麼？改革如何深化？……有許多有趣的課題。所有發生在農村的「改革」皆為對「四個堅持」的否定；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沒有了，毛澤東「憑馬列主義在中國具體實踐」經營了三十多年的那一套全否定了，共產黨遵守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農村以自我否定的形式而宣告徹底失敗。

中國土地少，如何從全體統籌考慮國土規劃整治，開發大西北等，中國農業人口過剩，如何正確引導從事極其落後的農業方式的人民進步到產業化（農場化）？是否有可能將中國農業勞動力投入到世界勞動力市場？我認為中國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潛在方面是大批剩餘的農業人口（數以億計！），如何首先指出問題，分析問題，指出解決辦法，這是值得的。

現在農村的大辦鄉村企業等等過程是當權者的無能之策。什麼「農民企業家」等等，共

產黨總有好聽的詞兒，與幾十年前的大躍進年代的「農民煉鋼能手」一樣可笑。鄉村企業與城市工業爭原料。而這種企業是外行辦的，其行政管理、財經管理、質量管理及發展與研究等等是極其低劣的……如何引導剩餘農業人口循着正常的工業化過程（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轉化）轉化呢？這裡可做出簡直可以與許多關於城市改革的文章比美的宏篇大論來，我很想寫，可惜我是學理科的，又總想早點拿 PHD，本身的科研也很有趣，忙得不可開交。如果有哪位學人文科學者選該課題一定很有價值，一定很受歡迎。

大陸留美學生 林二狗

認同中國文化

談到中國，他當然應該向一種聯邦的體制發展，中國人應該接受一種多元化的政治觀念，一黨專政、中央集權，已經不符合今日時代，但中國做為一個整體，他也要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而這個基礎，只能基於中國故有的文化傳統。

中國文化是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雖然有他「理性」觀念較為薄弱的一面，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找到通向現代化的道路，而且像我們這樣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民族，任何外來思想，如果不能和本土文化相結合，他也不可能在中國立足。如何在現代的歷史時期，發揚光大中國文化，應該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但「中春」對這一點，並沒有足夠的重視。

「中春」刊登的一些討論中國民族性的文章，看後也不能令人滿意，當然中國人身上是表現出很多缺點和弱點，但這不能代表「民族

性」，對我們自己的民族性作何評論，作為個人是無所謂的，但一個中國的政治組織却不一樣。

在今天的中國形勢來看，共產黨統治大陸佔「天時」，國民黨隔海相峙，居「地利」，第三種力量只能廣泛爭取人民的支持，以取「民和」。才能在今後的時局變化中，做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與國共兩黨鼎足而立，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貢獻，要做到這一點，不僅在於他宗旨的正確，而且也在於他與中國文化的認同程度。

(中國大陸留學生) 草葉於美國

就留學生歸國問題致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一封信

中共中央、國務院：

我是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博士後研究生。就留學生歸國問題，我想向你們坦率地闡明我的意見。我相信這些意見都是於國於民休戚相關的肺腑之言，懇請你們能予認真考慮。

最近從「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七、九、一、）得知，中國政府已向美國政府提交了一份達一五八九名的留美學生名單，其總的意旨是要督促這些留美學生「期滿回國」。由此可見，我國留學生中存在有嚴重的不願歸國的現象。這是什麼道理呢？

我相信愛國愛家像熱愛真、善、美一樣都是人類的天性，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總是不會違反這一原則而行動的。既然現在多數人不願回國（當然這決不能等同於不愛國），就說明國內現在處於一種不正常政治狀況。這種不正常主要表現在：

(1) 缺乏民主制度。體驗了西方民主生活的留學生們當然不願意重入專制制度的樊籠。可以說五七年自反右以來，從上到下哪一個人不是對政治問題噤若寒蟬？中國的知識分子早已過夠了在「達摩克利斯寶劍」下忍氣吞聲，苟延殘喘的生活。西方社會儘管有它自己的陰暗面（如剝削、欺詐等等），却絕無「因言獲罪」的政治冤案。這裡不需要宣傳什麼「言者無罪」的道理，因為人們根本就沒有「言者有罪」的概念。因此生活在西方的人們通常只需要為謀生而操心，但生活在國內的中國人除去謀生之外，更多和更要緊的則是不得不為防止政治迫害及免陷文字獄而分心和擔憂。

我相信無論是留學生還是其它中國公民，包括你們這些曾在文革中罹難的黨政要人都不願意在這種達摩克利斯寶劍的威脅下生活。因此我認爲，要想徹底解決留學生不歸問題，首先要立即改革中國的政治體系，即從封建的、專制的、一黨專制的制度改為真正民主的、自由的、多黨競選的政體。只要人民能真正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海外的華人和留學生肯定會歸之若鶩的。

(2) 四九年以來中國一直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人們沒有行動自由的權利。因而所有持中國籍的人，不管是華僑還是留學生在回國問題上都有「有去無還」的擔憂。其實不管是留學生還是海外華僑在外日久都有思鄉之情，總是想回國長或短住的。但是這一限制出國的政策的歸途。因此我認爲，真正給予人民行動自由的權利，保證留學生來去自由，才能大量吸引留學生學成歸國。

最後，我還想說明一個道理，即留學生不歸國對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而非壞事。當權

者們不但不應爲此大傷腦筋，相反的倒是應該大力鼓勵更多的中國人出國謀生。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1) 中國有十億人口，現在強行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即是「人滿爲患」，爲什麼當局不但不鼓勵人口向外疏散反怕人們外出不歸呢？

(2) 中國人很「怪」，在中國自己的國土上總是庸庸碌碌，一事無成，但一離開中國便發展得使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這方面國內幾乎家喻戶曉的美籍華人楊振寧、李政道、王安等等不早已成爲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了嗎？

(3) 有人說「留學生是中國的精華，留學生不歸國將嚴重地影響祖國的發展」。應該承認在中國的現行政策限制下，留學生若非出類拔萃之輩，絕非有出國之日。但是絕不能說離了這些留學生，中國就不能進步。留學生會以各自的方式爲祖國的繁榮富強做出自己的貢獻。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故事。如果中國當局也效法曹操奪許庶的故事硬逼留學生歸國的話，其結果也只能是得其身而不得其心，試問這樣做於國於民又有何益呢？更何況，萬一逼人太甚，引起矛盾激化，留學生群起而避難，豈不有損於國家的威望？因此本着憂國憂民的心理和盼望祖國繁榮富強早日改變落後面貌的願望，我特寫此信向你們及社會各界呼籲迅速停止逼返留學生的一切行動。順致
同胞的問候！

中國科學院博士後留歐研究生 公正

試圖走向理性專制的宣言

——王炳章談中共十三大

●本刊記者●羅惠平

中共十三大於十一月初結束，海內外輿論紛紛評論，各抒己見。本刊記者特專訪了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他暢談了對十三大的看法，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下面是訪問的摘要。

試圖走向理性專制

問：中共十三大已經結束，請問您對中共十三大有什麼總的印象？

答：中共十三大給予我的總印象是，它試圖在修補和完善中共的專制制度，並非將中國引向自由與民主的道路。

問：爲何有此說法？根據的又是什麼呢？

答：民主制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但很可惜，中共十三大上，關於權力分散與制衡體制的根本原則絲毫沒有提及，反而在政治報告中提出反對三權分立，反對多黨政治。這樣，就把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先封住了。報告中把「四個堅持」列爲最高準則之一，更成爲民主道路的絆腳石。

從政治、經濟改革方案來看，中共試圖把中國引向一個理性專制社會，也就是走向軟性專制。其特點是在經濟上有所放鬆，例如人民可以從事某些小企業的自由經濟活動，但經濟的命脈仍然掌握在政府之手；在政治上，中共想開放一個對話制度，即：共產黨執政者，徵求一些被他們所挑選的「精英份子」的意見，使之參與決策過程。同時，在意識形態上，可允許對非原則性的問題進行討論。這種專制，比毛澤東時代的專制，無疑要軟化多了。但這種制度跟自由民主制度根本沾不上邊。按中共自己的話說，他只是想完善現存的制度，並非想改變現存的制度。

年輕化還是民主化？

問：中共自己和外界人士普遍認爲，這次中共十三大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幹部年輕化的問題。在中共中央政治常委中，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的平均年齡，比上一屆常委的年齡，年輕了十多歲。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問題，是制度問題

，不是領導者的年紀問題。領導者的知識化和年輕化，對治理國家來說，是重要因素，但非決定因素。

我們回顧一下中共建國初期的情況。毛澤東那時是五十多歲；鄧小平、林彪、彭真、陳雲，還有劉少奇，都只是四十多歲，這麼年輕的領導層，平均年齡比現在十三大的領導層還要輕；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和鄧小平等建立起來的，是一個極權專制制度。

反之，讓我們看一看民主國家。里根總統是七十多歲的人，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年紀也不輕，但他們在施政期間，都取得一些成就。因此，我們不能說，他們年紀大其政策就一定不好。當然，領導人年齡太大，如八十多歲，腦細胞已經退化，可能隨時會做出很不理智的決策。剛才說中共領導人年輕化有進展，但不可不知，最高權力仍然掌握在八十多歲的第一代共產黨人手中。

再看專業化。有人說，領導層專業化和知識化會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希望。這也不盡然。比如，蘇聯在斯大林時代，已開始注重領導階層的教育程度；到赫魯曉夫時代，更提高了領導階層的專業水準；勃烈日涅夫則是真正把

中共十三大後春風得意的趙紫陽
在回答世界各國記者的採訪



蘇聯帶上代技術官僚治國的時代。蘇聯現在的領導官員，普遍受到良好的大學或研究生教育，但是他們的體制，仍是一個專制的體制。相反，美國的總統，如卡特、里根的教育程度，並不比蘇聯的領導者為高，但美國却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所以，領導層的知識化和專業化，也不是治國的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的民主化。

軍權並未轉移

問：這次中共十三大選的領導階層之中，鄧小平、彭真、陳雲這些老一代的共產黨人，都沒有進入權力核心，引致許多人評論說，鄧小平已能成功地把握權力轉移到趙紫陽為代表的第二代共產黨人和以李鵬、田紀雲、喬石、胡啓立為代表的第三代共產黨人手中，你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從根本上講，權力的轉移工作並沒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軍權，仍握在鄧小平手裡。從表面的人事制度上看，趙紫陽在黨內是第一把交椅；但他在軍隊中，却是第二把手，而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鄧小平任軍委主席。這是違反「黨指揮槍」這條原則的。從政治上來說，這是「脫序」，即超出了常軌。為何一個黨的總書記，要聽命於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呢？這就說明了，北京政權仍然是一個靠槍桿子維持的政權。從鄧小平卸不下軍權即可看出，鄧小平的權力轉移工作並未奏效。我只能說，十三大開啓了垂簾聽政的時代。

政局穩定下來了嗎？

問：西方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認為，中國

自十三大以後，將進入穩定發展期，請問你有何看法？

答：中國的問題，政治上的突變因素太多，難以預測下一階段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我至少可以說，中共自身並未穩定下來。因為，穩定與否，要看中共結構制度化的程度。所謂制度化，就是看有沒有一個完整的辦事規章，而且是否已經按著一定的章程來進行政權的建設、運作及轉移。從十三大看，可以說，中共仍未達到政權制度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們這次又修改了黨章。而修改黨章，並不可以工作任務為理由，而主要是為了人事上的安排。中共在第十二大時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和中央軍委主席都需要中共政治局常委擔任。可是在十三大前，鄧小平表態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却又要擔任軍隊主席，這就跟黨章矛盾起來。為了達到鄧小平留任軍委主席之個人願望，於是十三大就輕而易舉地修改了黨章。這說明，章程和制度只是圍繞人的行為和人的權力。由此看出，中共的政權仍不是一個制度化的政權，愈不制度化，政治權力就愈不穩定。從此點可以預測，整個中國社會並沒有進入穩定的發展期。一些突變因素，可能隨時出現並發揮作用。

政治改革還是行政改革？

問：這次中共十三大趙紫陽的工作報告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政治體制的改革。趙紫陽列出了一些改革項目，你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總評估是什麼？

答：如果研究一下十三大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就會發現，它根本不能稱作政

治體制改革，而只能稱為行政改革。鄧小平訂的改革框框，就是十六個字：「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提高效率」。趙紫陽的報告，實際上只是充實了鄧小平所訂下的改革框框，其中中心任務只是爲了提高目前專制制度的辦事效率。至於建立一套制衡的體制來防止權力的濫用，以及錯誤的發生，在報告中連個影子都沒有。

問：那麼請問，中國共產黨本身有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務院也設了國家監察部，這些機構能否被認爲是制衡機構呢？

答：從政治上來說，紀律檢查委員會及國家監察部，根本不能說是真正的制衡機構，因它們只是中央權力機構的附屬機構。最高的領導權，完全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手中。道理很簡單：國家監察部受國務院總理領導，那麼，總理犯了錯怎麼辦？同理，紀律檢查委員會受黨的總書記領導，總書記出了問題，紀律檢查委員會怎樣去檢查他？因此，中紀委和監察部至多只能對下屬官員起點監督作用。由於中紀委和監察部權力不獨立，它們往往淪爲黨內派系鬭爭的工具。我們一再強調，所謂監督，是監督最高領導人，而不是一般官員，這樣的監督才有真正的作用。要達到這種目的，監督權一定要獨立出來，獨立於行政權之外。如美國的法院，是完全獨立的機構，跟白宮國務院的權力完全分開，故能起到真正的制衡作用。只有最高權力在同一水平上分散和互相制衡，才是真正的民主體制。

裁減政工幹部能成功嗎？

問：趙紫陽在十三大上提到了精簡中央機構、黨政分開、文官制度等具體行政改革措施

，你對此有何評估？

答：目前這幾項措施均停留在設想階段，尚未正式實施。這三項具體措施有一共同問題，即：精簡機構、黨政分家和實行文官制度後，裁減下來的政工幹部怎麼辦？如何安排他們的出路？

人性的弱點在於，在權力問題上，總是上去容易下來難。原來由科長升到處長，而再升至局長、部長，是很容易辦的。但倒回來降職，剝奪他們的權力，是非常困難的。政工幹部目前享有許多特權，諸如：分配到好的房子、隨意使用公家的汽車、安排子女和親屬好的工作，利用政治權力推倒對手或不喜歡的人等等。這種種權益，隨著離開職位而消失。他們能不反抗嗎？所以，共產黨國家歷來精簡機構都不成功，結果總是愈精愈繁，人員愈裁愈多。裁減官僚機構好像是砍掉一個腦袋，然後長出三個腦袋。趙紫陽在報告中提出，要下大決心，防止「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決心是好的，但我們尚未看到具體辦法。

我以前曾寫文章，指出：一定要解決那些被裁人員的出路問題。我開的藥方是經濟贖買。對這些精簡的官員，不是單由政府發出一大筆錢後就不再理會了，而是要使他們從事經濟活動，在新的行業中致富發財；政府也可從事幹部的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工作技能，不僅能謀生，還要比以前生活爲優。如能創立這種環境，提出這樣方案，那改革才能成功。否則，這些官員被裁後，他們的利益受到傷害，又沒新的出路，就容易聯合起來造反，導致改革夭折。六十年代，赫魯曉夫曾經有過類似改革，就是取消中央四十六個部門，而把各部的共產黨幹部下放。結果他失敗了。因爲他

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現在趙紫陽學赫魯曉夫的改革，取消中央的一些部級單位，進行大規模合併和人員的裁減，這也將觸犯既得利益集團，若不給這些幹部提供出路，必將招致反抗。

在經濟上使裁減的幹部發財致富，則將觸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大忌，因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視私有制爲萬惡之源的。所以，單純的政治改革和單純的經濟改革都是不行的，改革必須配套，必須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革。但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徹底的改革，在趙紫陽的報告中並未提及。

問：這樣說是否給人以改革必敗論的印象呢？

答：我並不是說改革一定會失敗，世界歷史上有許多改革成功的例子；我更不能說改革一定會成功，因改革失敗的例子也很多。我只是說，改革要成功，必須要有幾個先決條件。比如，我不能說種子撒下去一定會發芽或一定不會發芽；我只能說，種子撒下去，要有水份、陽光和空氣等充兄條件它才能發芽，相反則否。這個原理可應用到改革上。要有先決的條件，如意識形態要改變，給予裁減下來的幹部安排出路等等，改革就可能成功，否則容易招致失敗。

協商對話制度的本質

問：這次趙紫陽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有一項內容是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提高領導機關決策的準確性和開放性。這種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會產生什麼後果？

答：趙紫陽報告通過的程序已經違反了報告中所標榜的上述原則。經濟及政治改革方案

，都是關係到全國幾億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但報告未公佈前是「機密」，人民並不知道改革方案，如誰人在中共十三大前拿到報告的草稿，並公佈出去，那他一定被指控為洩露國家機密。政治報告中有這麼一段：重大問題要讓人民知道，經由人民討論。但確定政治改革方案這麼大的事，却違背了上述精神。它不但未經由人民討論通過，事前根本就不讓人民知道，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說的好聽，但做起來却是另外一套，這始終是共產黨的毛病。根據我們的理解，這種對話制度，跟政治報告的起草一樣，只是高層跟一小部份親信的人、所信賴的人進行討論，頂多找些知識份子徵求意見。如果中共真的尊重民意，那麼，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做重要決策前，應向人民交代，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讓各種意見都能發表。

談到這裡，我想簡單說一下某些中國知識份子的弱點。不少知識份子有一種心態——希望能得到當權者的重用，希望當權者能夠重視自己的高見。這種心態是一種不獨立的心態，是一種願意做「毛」而想依附於「皮」的心態。這種人對中共專制也不滿，但其不滿的理由只是當權者沒有重視他而重視了別人。這種人的心態被共產黨執政者摸透了。因此，這次所謂的政治改革方案中，列出了一項高層與知識份子的協商對話制度。這對上面我們所提到的那種知識份子一定有吸引力。他們一旦和執政者對上話，便有了滿足感，好像找到了可依附的「皮」了，當然，也就不再反對專制制度了。所以，從這點分析，中共打算開創一個協商對話制度，實際上是一種計策——利用某些知識份子的弱點強化其統治的計策。

自然，並非所有知識份子都具有上述弱點，但我願把這個問題點出來，算是一種警告。

我認為，中國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要獨立於當政者的問題。知識份子階層獨立之時，就是共產黨專制結束之日。

人事變動只是表層因素

問：你是否認為十三大上改革派佔了上風，而保守派受到壓制？

答：做這種結論為時尚早。讓我們看看政治局常委——中共的最權力機構。李鵬已是第二把手，他的思想路線與趙紫陽是很不相同的。國內高層幕僚班子的人都知道，趙紫陽非常防範李鵬，曾竭盡全力阻止李鵬任總理，鄧小平對李鵬亦有戒心。然而，盡管有趙、鄧的抵制，李鵬這次還是竄升到第二把手的地位，並且即將接任總理。顯然，這是黨內保守派共同大力保薦的結果。另一名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現任計委主任，是陳雲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李、姚的擢升，說明了黨內保守派實力的強大。還有，政治局常委喬石，最近一個階段政治態度很不明朗。這樣一分析即可看出，改革派在最高層並未佔明顯上風。

另外，我必須提請注意，趙紫陽本人盡管在經濟思想上很開放，但在政治上却相當守舊。「強化一黨專制、保障經濟開放」的思想，在趙的頭腦中根深蒂固。

歷史的經驗還表明，即使改革派陣營把保守派人馬全部搞下去，改革派陣營也會立即分裂出新的保守派，新的保守派可能比老的保守派還要兇悍。這是因為，共產黨統治的基礎是其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是人民。既得利益集團一定會在高層尋求其代理人。突出的例子是鄧小平——陳雲——鄧力群等聯手清除了華國鋒凡是派集團之後，鄧、陳之間立即出現裂

痕。其中，鄧力群的態度轉化十分具有典型性。鄧力群剛復出時，曾做過非常非常自由化的報告，其觀點比胡耀邦和趙紫陽還要激進，甚至把資本主義世界說得天花亂墜。但是，曾幾何時，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成了保守派的急先鋒。

因此，在分析中共政情時，人事變動，改革派與保守派勢力的消長，是最表層的東西，是浮現在海面上的東西。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其政權結構變了沒有，要看到海底發生了什麼。

建立獨立政治力量

問：針對中共十三大，民主運動的策略是什麼？

答：首先是要把中共十三大分析透。中共想通過十三大把其統治帶到一個理性專制的模式上，而不是一個民主的架構上。這一點要看清楚。十三大是中共試圖走向理性專制的宣言。十三大後某些人又對中共改革抱起幻想來。我們分析透了中共十三大的本質，就會打破這種幻想。

其次，既然我們已經明確中共不會自動地把中國帶向一個民主的社會，那麼，建立民主制度的歷史任務只能由一個新的政治力量來承擔。因此，民主運動的一項重要工作目標，就是推動一個新的政治力量的形成。這個問題，將在今年底召開的中國民聯三大上進行詳細討論，請您注意閱讀中國之春雜誌關於民聯三大的報導。

行政改良的死胡同

留美學人關於中共「十三大」座談會紀要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呼延民整理

第一部份：

政治報告、政改方案的產生

自由 民主 改革三派同路

【編者按：中共「十三大」一落幕，本刊即在編輯部邀請了幾位在美留學的研究生及訪問學者舉行了座談會。會前，與會者閱讀了已公佈的十三大有關文件資料及通訊報導，民聯總部還印發了討論提綱。座談會歷時十四小時，出席七人。本座談會，僅就已有的材料，從分析中共十三大問題着手，看中國社會的現狀，測中共改革本末及其自身的歷史趨勢，議中國民主力量的當前任務；其中有上層內幕的披露、社會底層心態的寫照，也有原則策略的爭辯。現將紀要整理刊登以饗讀者，希冀拋磚引玉，引起更深入的討論，從而為民聯三大的召開打下紮實的思想基礎。基於保護發言者，特別是有可能涉及國內同志們的安全的考慮，文中一律用代號表示與會者真名實姓，敬請諒解。】

以下紀要係據錄音整理，部份內容本刊進行了歸納、調整。若與原講者有出入，由本刊負責。

甲：中共十三大前幾天已閉幕，有關文件複印給了大家，討論提綱相信都已看過。同志們都關心着中國的命運，對在去冬今春形成的馬鞍形低潮條件下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一定有許多想法。我知道各位對中國的現狀、大趨勢和民主力量的歷史任務有過深入的思考，對國內的信息也掌握較多。今天主要是分析，並不要求對十三大作價值評估。首先，我們對中共十三大的背景和召開過程進行討論。

乙：我出國已有二年多，但一直關注着國內政治改革的發展。根據我蒐集到的一些資料談談這個問題。關於產生的背景，我認為有兩個。一個來自官界，第二個來自學術



界。幾年來經濟改革往前走得很遠，成敗褒貶不一，但是都認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為經濟改革的縱深發展開闢道路。所以各自從不同的途徑，用不同的手段來推動政改登上歷史舞台。此外就是來自青年學生的壓力。幾年來年年有學潮，每次選題不一，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是未來大變革的「前震」。知識界的言論，影響了上層人物的觀點，使之有程度地接受了「現代化是個整體，政治變革是整個社會變革、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的觀點。於是就出現了學術界自由派、青年民主派和中共改革派一時同路的形勢。下面就通過剖析政改方案產生的過程來說明這一時期的新特點。

四階段，學界推動官界

據一位剛從國內出來的朋友向我透露，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個階段：
一、分散研究、體會和認識階段。（從去年初至四月廿八日）知識界首先發起要求寬鬆政治氣氛的活動，隨後得到了胡耀邦和朱厚澤的支持。嗣後，鄧小平開始談到政改。由學術界領先自由談，這是建國多年來罕見的反常程序。

二、呼籲和啓動階段

四月廿九日至卅日，北京某雜誌社召開政改討論會，嚴家其、于浩成、蘇紹智、陸浩才等學界上層和一批青年新秀參加。「中國社會科學」發了評述後，波及各大學及報刊。繼中央召開紀念「五·一六」通知會後，上海及廣州召開了大規模的文化發展戰略討論會，以嚴家其在廣州

發言為代表，反映了以文化來影響推動政治的傾向。對此，時人評為「北方是直綫，南方是曲綫」由此誘發「文化熱」擴展至各省。七月十二日，中央黨校由幾名研究生發起召開政改會，規模達數百，囊括北京學界精英，中央體改組出席，陳一諮發言。

新葉公，高層先進後退

三、中央插手，拉班底、研專題階段
盛夏，北京學界組織「青年政治研究會籌備組」，首次會議被人民日報報導。捲入者有中宣部、中央辦公廳等部門的幹部二百多人。一時呈中央理論專利權旁落民間，中央文件不如「青研會」小道的現象。為免政治失控，半個月後中央即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組」（見附表）吸收了一批青年學者，力圖消化民間成果。這一階段，歷經了中共北戴河高層會及「精神文明全會」持續到學潮發動之後。

四、上層定調，班底摸國情、出方案階段（從今年三月至八月）

該階段，萬馬齊瘠，知識份子退出政治舞台。體改組按高層定調研究，與各省市、大企業首腦談話摸情況。萎縮消亡的是民主、法制各組（見附表），加強的是最關心的機構改革。幾經反復，始在十三大前定稿出籠。

政改本是爭民主的知識份子推動的，結局倒換來反自由的高壓或為愚弄群眾的假民主鬧劇。這就是中國改革各階段歷史運作早產夭折的主要原因。

極權與經濟起飛

丙：我想對剛才甲講的兩個背景作一點補充。中共經改派（丁：實際是補天改良派）無非是認為政治是為經濟服務的，經改是為主的，經濟發展是唯一的目標，政改要為經改作犧牲。他們的結論是：經濟要搞活，政治上必須集中統一，不能寬鬆，也就是不能搞民主。這一點還有一個引證，是說所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之前，都要搞政治上高度集中的一手。其實，這是不足為訓的。體改所說的例子，往往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內政治渙散，有不少國家還是部落酋長制，那麼他們的經濟發展初期，有殖民地結束時的混亂，所以要集中。而各社會主義國家已形成了高度的中央極權制，應當有個新的模式。知識界持相反的看法，他們是從整個社會發展的要素，從理論角度來看的：政治、經濟、文化是一體的，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於是就認為只有發展了民主，經濟、政治改革才有相應的進展。這與新經濟學派觀點類似，認為凡經濟決策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第二部份：

人事變動

李鵬何去何從

甲：上面兩位談的，實際上已涉及人事變動，下面我們就轉入討論的第二部份。人事變動並非特別重要，因為這是表層的東西。共產黨人多是用實用主義者，像列寧，一會

兒搞軍事共產主義，轉眼又變成新經濟政策的倡導者。不過，中國是個人治社會，人事變遷，至少可以表現目前的政策重心。先看看李鵬崛起的原因、反映的問題和政治傾向。

丙：對李鵬，大家沒什麼好感。留學生討厭他的政治色彩，老百姓反感他的血統裙帶。去年學運沒有喊物價口號，無非是為趙紫陽的處境着想。李鵬主抓國務院，大家就少了一點策略上的顧慮。

戊：趙紫陽要把總理一職讓給李鵬，要撤銷很多中央搞工業的部級單位，這似乎是對李鵬釜底抽薪的一招。

乙：不是這樣。確定李鵬晚於撤部主張的提出。今年五、六月份，剛把中央四號文件發出，又開了一系列會，批了胡喬木、鄧力群這幫極左派之後，那時決定了讓田紀雲進常委班子，只下陳雲一個人。當時就提出了撤部。改革就要削部，這就是趙的想法，還是趙最得意時的主張，可見不是當作鬪爭策略來使用的。因為部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具體執行者、代表者。（甲：所謂打掉條條，加強塊塊，當年赫魯曉夫一上台也想起這一條，實際這只是治標，不是治本的辦法）趙經常找人匯報機構改革，較多參與意見的是田紀雲，李鵬很少涉足政體改。關於李鵬的崛起，我覺得起因於他作了大膽的風險投資。李在三峽水利問題上早和趙鬧僵，只有靠攏保守派。保守派中年輕的少，自然就作為代表人物被提拔了上去。這反映了陳雲系統陣容還十分強大，居然能提出接班人。又上了個姚依林，這樣兩派就打了個平手，將來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新人展開另一回合的鬪爭，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組 (1986年8月成立)

趙紫陽 (組長)
胡啟立 (代表書記處)
田紀雲 (代表國務院)
彭沖 (代表人大)
薄一波 (代表中顧委)

研討組總辦公室

鮑彤 (總辦主任)
周杰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賀光輝 (體改委副主任)
嚴家其 (社科院政治所所長)
等

下轄一室七組

- 總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為陳一諮 (總辦辦) 聯絡組
綜合組
- 黨政分開組：負責人為溫家寶 (中央辦公廳主任) (該組級別最高) 陳俊生 (國務院秘書長)
- ※ → 黨內民主組：負責人為周杰
- 黨政機構改革組：負責人為賀光輝
- 原則與指導思想組：負責人為廖蓋隆
- 人事制度組：負責人為曾志 (中組部副部長)
- ※ → 法制建設組
- ※ → 社會主義民主組：負責人為胡繩 (社科院副院長)

附圖：這些人制訂了中共政治改革方案
注意：※表示這些組逐漸萎縮，愈來愈不起作用。
說明中共的政治改革根據沒有以「民主、法制」為基礎。

選在的老人則坐鎮幕後垂簾指揮。李鵬是希望走蘇聯東歐改革方向的，總之是在鳥籠經濟中做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陳雲兒子陳元一伙搞的一套。趙把西方的東西接過來，是在調雞尾酒。陳元他們現在埋頭搞的一套經濟理論，是在科爾內基礎上發展了的，對中國經改有了系統的說法，它既能滿足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又能對當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一些重要經濟繳結作出解釋。如果李鵬能和他們携手合作，也許

老鄧進退維谷

耀邦處境微妙

會造成重大轉機，形成新的體系，這就有可能比趙幹得漂亮，還要長命一點。當然，李搞得不好，趙來收拾殘局，趁機清洗保守派，也是一種可能。

戊：鄧是個策略家，縱橫捭闔這一手幾乎爐火純青。但這七、八年來，可以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時期，他先左後右時進時退，

主要用策略，也可以說每次都能把對手騙倒難住了的。後一時期，又摻雜了他自己觀點、注意重心轉移的成份，及騎驢看唱本、被逼宮無奈的一面。他老練，已經像個成熟的皇帝。然而說人品的話，就比胡耀邦差多了。

胡耀邦是鄧栽培的人，現在仍有相當的政治能量，不會像華國鋒似的處境，只變成一幫勢力的標簽和精神象徵。但是要讓胡將來重新回去當第一把手的可能性不大。趙大量回籠了胡的人馬，這人較有手腕，會拉住胡當一個胳膊壯勢。至於喬石，面目還不十分清楚，至少沒有跡象可以說明他與頑固頭子彭真有什麼關聯，他是個特務頭目。不過，有時也難以絕對地把派分清。可能是一時一事臨時聯合，事情在變化，人的觀點也會變化。

軍頭機制 事關大局

甲：再來談談軍內問題。這次安排趙擔任軍委副主席，越過了以往的慣例，像胡就沒有在軍內任職。這反映了鄧擔心趙控制不住軍隊，想讓自己死後趙能做到穩住軍心。值得考慮的是改革派在軍中真正掌槍桿子的是誰。

乙：這個人第一要有權威能掌軍權，第二要自己沒有野心。但權威會滋潤野心，所以真正的取捨還是忠字領先。估計秦基偉會當軍委秘書長。靠鄧作保險，讓趙來搞個整軍綱領，使國防軍職業化，使之不得參與政治。不能出個「水門事件」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把大權接了搞軍管。趙可能要削總長的權，把他變成事務官，國防部

長由文官擔任，由虛職變成有實權的政務官。估計十三大後很快就要召開軍委擴大會，趙會提出系統的整軍綱領。黨政分開後，黨和軍、軍和政也都要順理成章地分開，把軍的職權設計得很狹，再加組織整頓。趙這樣做是想避免「凱撒」上台，諸侯割據的局面。當年毛澤東、林彪是一身二任，以黨的領袖身份君臨於軍任職，軍隊不能反統帥，也就不可以反對黨的領袖。現在趙無法做到把二者統一在自己身上，因為他當不成真正的統帥，只是個文人，那麼唯一可供選擇的就是把黨和軍、軍和政分開。有可能，他會把國防部變成實體，來抵制總參的力量。（丙：第一步還不如把中共中央軍委的權力轉給國家軍委）寧可把國防部的權力轉給李鵬，不能轉給楊尚昆，否則就是兔棲虎口。軍隊在文革後對政局影響力已經縮小，現在還要進一步淡化。威脅趙掌權的，目前還不是學生娃娃，而是鼓吹「槍總是熱的」那些人，如王震之流。我看讓楊尚昆訪美，就是打算削他的軍權，讓他擔任國家主席的措施。

暫時無納吉 難出卡洛斯

丁：我感到，他們都叫共產黨，在質上是一樣的，只是量上有些區別。區別和分析他們是必要的，但如果我們全力押寶在上面，那麼還要民主運動幹嘛？再者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費神思索誰上台下台等問題上。這些人只是作為代表（統治着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國家意志的人格化）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們不可能違背自己的真正「

選民」。只要整個國家機器選被上層這一些腐朽份子霸佔，擔任「當然領導」，那麼，原則「法統」的運作是照常的，一時死了誰換了誰，這塊土地上的上帝就會讓它再生一個出來。在中國出現納吉條件不足，出現西班牙卡洛斯更無可能。所以，也不要對大變革的前景看得過於樂觀。因為中國文化使中國社會有局部自癒自我修補的能力，這種欲陰還晴不死不活的局面會拖相當長的時間。像這次十三大就一定會拖在國內不少人中誘發樂觀的夢想，希望和平演變少付代價少犧牲，輕易成功，這樣去冬積累的能量會就此消散，暫時度過危機，學潮、民運勢呈低潮，社會封建主義怪胎的死亡的陣痛必然因此而延長。

第三部份：

政策變動的分析評估

前途是發展大型家庭農場

甲：好，剛才我們討論了人事變動，下面我們就分析一下政策的變動，這是中間層面，因為所造成的影響比人事層面來得深遠。由於許多政策是觸一髮動全身的，而社會客觀後果與執政者提出時的主觀願望又往往大相逕庭。同時，一個政策執行下來，如同把一塊石頭推下山去，後果是難以控制的，最後也不知砸住了誰，所以要細分析。先看政治報告中所提出的一些，哪幾項是他真正想做也可以實在做的？哪些只是為了起宣傳效果，施加心理影響的？做了之後又會有些什麼結果，反饋回來還會使政策出現什麼新變動？

乙：政策變化問題要和理論變動合在一起考慮，政策是理論指導下的產物。先說土地買賣。中國農業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從世界各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從中國經濟的宏觀全局來看，農業的出路在於搞家庭農場。現代化農業就是大型家庭農場制。前面放上了「大型」和「家庭」兩個定語，說明了它的性質內涵條件。小塊土地對現代機械、化肥、農藥的使用和水利都不利，只有大面積經營才能使生產力大幅度提高，擺脫八億人搞飯吃的局面，大型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蘇聯搞集體農莊，中國有軍墾農場，更有遍佈全國的人民公社，有的是公有制，有的是集體所有制，結果情況都很糟。關鍵在於土地公有的共耕制不利於農業生產實現按勞分配，所以沒有生產的積極性。後來人民公社因此有名存實亡，只好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從大公變成小公。（丙：還有一點。土地不像石油這種一次性能源，它有其可循環性。土地承包而不歸個人所有，農民們害怕政策變化，就進行掠奪性生產，於是土地變成不可循環沒有輪休的，這樣下去沒多少年黃土地就會變成荒漠。）對。農業生產周期長，只有家庭世代相傳，才有可能珍惜這個資源。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只有走私有制的路，否則，大型就是空的，只會倒退回去。當然，建國時的集體化也是一種資本積累，用很大的剪刀差，無償剝奪農民來為重工業作原始積累。前些年搞承包制並非後退，應看到土地買賣的提出正是承包制的進一步深化。土地所有權歸生產者，這就為家庭農場的出現創造了根本條件，下面第二步才是發展

家庭農場。土地買賣勢必有土地兼併，那麼就有僱傭勞工的要求，才會提出開放勞動力市場，打開所謂「剝削剩餘勞動」的禁區。生產資料私有、削合法化，這個意義是非同小可勞動力化為商品、剝。只要土地買賣能成立，土地兼併就勢在必行。

土地買賣難推行，只為安人心

甲：但我們不必管別人嘴裡說的是什麼，主要看實際上做的是什麼。還要看實際上是否



這兩戶農民，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為小麥追肥。

行得通。（戊：這麼多農民，形成一大堆農民無產者，如何安頓？）（丙：英國的「羊吃人」就是要驅趕農民進城市當工人。但我們現在容納不了，比不上人家工業革命時候的條件，只好爭取就地消化，發展鄉村工業，有很大潛力。）對。一部份是流入工業勞務市場，只有很小的一部份進入城市或經商搞其他，多數是在鄉村企業解決，像蘇南就是如此。還有一些人是賣了地，蓋房子送子上學，去人家的農場當勞工，掙錢也不會少，比他自己經營土地或許還富足。不過要看到，這個過程必然是緩慢的。第一是農村生產力不會出現奇跡，馬上增大。第二是像過去幾年，有的人外出經商，寧可土地荒蕪，也不願自斷退路把它賣掉。第三是國家一定會採取各種措施卡你，讓你買地不容易，又會制定政策讓不想賣地的就可以不賣，否則他就不叫那個「社會主義」了。所以不會一下子湧現大批顯性失業者。（甲：現在的農村是隱性失業。）農民出不了高價買進土地，除非國家給貸款，否則土地就會轉為非農業用地，賣給公司蓋房造樓堂館舍、蓋戲院建球場，撈一大筆錢，幾代人有得花。（戊：還有農村基本建設問題。現在集體抗災能力大為減弱，大陸上年年水旱災不斷。）材料費可以向農村企業抽血，努力就不能像過去無償抽調，但這就需要大批資金當勞務費。沒有這筆錢，在多數情況下，農民還無法使用大機械。中國一是沒有西方那樣的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播種公司、收割公司，靠農場主打電話解決問題；二是用機械、耗能源，農民沒那筆錢，機械製造業也一時跟不上腳步。所

以只能像過去美國南部種植園一樣，把力量化在更好的管理上面。可見，土地買賣這一招，在中共當政者心中，只是爲了起安定人心使之敢於投資的作用。

文官制黨政分家 撤部後幹部去向

戊：文官制也只是爲了宣傳，是走不通的。過去封建王朝初期繁榮是清掃了一大批舊貴前朝遺老，所以做到輕徭薄稅，後來就尾大不掉，包袱極重，得了爵位的如汗牛充棟。像崇禎還是很精幹的，事必躬親，每夜至三更，但是狂瀾既倒，並不是他可以挽回的。我看中國官僚機構空前龐大，這些人寧可少拿錢不願失權勢。問題是他們肯被贖買養起來，倒又罷了，偏偏又一個個是一黨的好黨員、好幹部，絕不容忍被養的處境！一定要伸手抓、掄腿跑、付學費、發號令、施權威、發文件、開大會，出盡歪招盡擋道，事情也就一團糟。

甲：中國的問題主要不在精簡，在於職能轉化、本身的純潔和合理化。就管理人員來說，恐怕人數尚不足，還不到國外工廠管理人員的比例。職能放着，簡了還得再生「一歲一枯榮」。深圳的機構就是這樣一點點重新龐大起來的。上面來個計劃生育部長（有的地方還有什麼打狗辦公室，當打狗辦的主任），你就得有局長處長，兵少了不像官，招兵買馬再設科長科員，所以就越喊精兵簡政，越膨脹。

戊：說到黨政分家，書記們肯下一錢去？他既不頂大學生技術員用，更不肯當普工掄大錘，結果是加重企業負擔，多一些拉胳膊扯腿的閒王爺，遠勝過廢物和垃圾的破壞

力，只好民脂民膏養着一大堆蛆和腫瘤。還有，撤了局稱公司，撤了公司叫董事會，不是原班人馬換湯不換藥，就是爭權奪利、勾心鬪角一陣混戰，結幫組派、沾親帶故一場好戲。偏又不掉頭，活一天鬧一天，最後告狀平反，大家都是好東西，又平白無故多一批閒官！

丁：把大批簡下來的黨政人員轉到經委、計委的信息管理統計服務部門去，這批過去掌人、財、物大權的老爺既不肯去搞統計資料，也還幹不了。政改如果翻船，就一定翻在處理不好這批中層幹部這一點上。弄到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下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只有總崩潰能夠得以在動態中求得新的平衡調節，這就是一個革命的局勢。

乙：西方也有個官僚機構擴大化的問題。把指揮系統變成政策性指導，條條塊塊矛盾就增大。譬如鞍鋼，原屬冶金部和遼寧省雙重領導，中央財政困難，收不上錢，因爲「閻王好見，小鬼難擋」，往上鬆，往下扣，所以結果丟給地方，中央坐地管收錢，財政包袱就丟給了遼寧。結果地方水過濕及地皮，中央不少要，負擔便加重了。過去，省級幹部利益在中央組織部，愈扣愈升官。像陳錫聯搞到遼寧省每人三兩油的地步，得了「陳三兩」的雅號，他倒反而當了政治局委員。現在不同了，像上海與中央爭權就很厲害，地方有局部眼光，易造成宏觀經濟紊亂。甚至釀成結構性經濟危機。再者撤部，國家不管企業，放給地方，實際仍然是政企不分，只搞了縱向分權，沒有注意橫向分權，是重蹈赫魯曉夫覆轍。

甲：企業是經濟細胞，應有自己成長的生態環境。這就要求商品勞務、生產資料、和生產資本市場；稅收、價格、工資合理體系；經濟法、勞動法、破產法的配套成龍；輕重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的呼應；計劃計量信息機關形成網絡；領導人員、管理人員、科技人員的幹部隊伍、結構機制制度、人員素質、社會心理、文化觀念習慣、生活方式等的相應調節，要求政策體系成羣、要求同步有程序。凡此種種，要想一攬子解決，是相當困難的。就像有兩套交通規則，一定要出重大事故一樣，多層次經濟在新舊交替時期的多軌制，就會把本來的命令經濟搞得更加混亂了，但從權力制衡的角度看，從經濟割據到政治自由競爭，也有歪打正着的好處。

丙：聽說體改組提出政府職能轉化這些建議的一位主持人在底下說，他們本身也認爲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一開始他們提出八年撤部的時間表，是緩兵之計，也許到了八年會有新招。結果中央要求兩年，他們知道完了，兩年後會翻船，這是不高明的選擇，連主持者也不是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件事的。

乙：至於利改稅，實質還是一個企業獨立自主的所有權問題。企業是國家的，國家投資，政府成董事會，利是你向主人選錢。企業是社會集團或稱企業董事會所有的，稅是經濟法人向政府服務工作人員付錢，所以標準統一，管理也簡化了，性質有了區別，就好實行股份制，還是有意義的。說到文官制（即公務員制），最重要的一點，是黨政分工，黨只管政務官，不管事務官。意義不在於提高效率，也不見得就有

高效，因為軍事制也可以提高效率，就像建國初期周恩來當政務院總理時的情況，陳毅一到上海快刀斬亂麻，利用國家權力，幾下子就把物價穩住，通貨膨脹止住了。英美各西方民主國家建國之初也有個打天下坐天下的問題，政黨要把官位分給跟他幹的利益集團，結果造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混亂局面。後來，都走上了政務官、事務官分家的路，就正規了，在民主政體方面大踏了一步。問題是這一套在中國行不通。

改革層層阻力 首腦有法不依

丁：有一條要注意。中國的龐大官僚機構隊伍，像層層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防護林。從北京城刮出的十二級颶風，經過一層層錯落有致的防護林，不是變成強弩之末，也就全然變了方向。或者是消極怠工抵制，大象屁股推不動，或者是在樣子上搞得熱火朝天，實際依然故我，或者是把口號接過來制定出對自己有利的土政策，會出現千萬個變種。要估計到這些情況，才能對其政策變動的結果作較準的預測。

己：中國的事確很難說。很重要一點是有法不依，而老百姓也不當一碼子事。像這次十三大，鄧小平既想用年齡這條綫把保守派一刀砍掉，又想自己保留軍委主席的職務。這樣困難的題目，誰知他因人改法，修改黨章就輕易解決問題了！外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這類事。其實他們不理解東方民族心態。評價一個人是了不得的事，修改憲法却滿不在乎。這樣許多法規就失去了群眾監督壓力的安全系數。此外，我

們又往往名實不符。譬如按美國教授的意見，中國是最早建立文官制的。這就不是我們所說的文官制的概念。所以不少口號、名詞需要界定一個精確嚴格的科學定義，否則各有自己的概念，你就無法和他嚴肅討論問題，像泥鯁一樣，抓不住他。又譬如什麼叫「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玩意兒他自己就說不清，總之幹成啥樣是啥樣，標籤而已。這次的「初級階段」就是這種東西，和理論更不沾邊。最後，中國辦事是一湧而上，一哄而散，變種多，會不斷生出新的限制詞，所以歷朝改革都走樣、失敗，無法認真推行。東北鞍鋼搞合同工制，招一萬人，到了時候全無統一標準，也無足夠的權威去抵制各種歪風，於是勞動市場一招失敗。人大對破產法還在討論中，江西上千家工廠就申請破產。一破產弄筆錢大家做生意麼，不到破產程度的還想方設法搞成破產，結果人大不敢通過破產法。廠長不怕倒閉，工人不怕失業，這就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以不從四項原則開刀，不解決官僚所有制、一黨專政、宗教框架，中國是搞不好的，還奢談什麼改革？

戊：共產黨國家經濟發展有兩大問題：一無內在動力，二不能合理分配資源。千計萬策，就沒有咱老百姓出力幹活多勞多得的方法。病源在於公有制，它是共產黨的根，數學上屬於無解。

第四部份：

關於理論和策略

甲：從中共十三大所反映的問題來看，他們的所謂改革，第一是擺樣子，第二是難實行，第三是充其量不過是行政改革、政治改良。剛才我們探索了十三大的表層和中層，也就是人事和政策，現在來看看它的深層理論究竟是什麼。研討它的本和末，也就是它的實質和表象、來龍和去脈，看出它的本末倒置，也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心。

初級階段不是理論是策略

己：依我說，什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談不



集貿自由市場是經濟改革的產物，是對計劃經濟的衝擊。

上什麼「理論」，只是一個說法。他們的「理論」，時而只是策略口號，而且多是權宜之計，連定義都沒有。但好多人就是喜歡說「階段」，以為有了這就一下子都好辦。退，可以用來穩住保守派，當護身符，「我搞的還是社會主義，但因為是「初級」，所以有點私，五花八門的政策，亂七八糟的一陣你諒解着點。」意識形態問題也好說，總之不能塞給他超過階段的東西。進，現在用來打擊反對派，將來又搞左的那套大公平均主義時，譬如，將來再把土地收歸國有重搞集體農莊制，就宣稱到了「中級」或「高級階段」，不就完事了？中國人辦事，名不正言不順，就要自欺欺人，其實毫無意思，人家當了第一把手可以根本不承認。譬如什麼「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兩個詞是否能兜到一塊，就不管了。對不嚴肅的事不必太嚴肅，本身就玄而又玄的。

丁：「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少可以把時鐘撥回去吧？有時也可以利用它。譬如「人民民主專政」是他們這些年來的提法，有時還加個括弧，叫做「即無產階級專政」。你也可以攻他，說「人民」是幾個階級，所以只能是幾個階級的「聯合專政」，這樣也就沒理由搞一黨制，至少，幾個階級幾個政黨嘛！你說「即無產階級專政」把下位種概念取代上位屬概念，那麼爲什麼不說「即資產階級專政」呢？！

民運需要理論建設

乙：這說明理論在中國是有用的。人們需要它，它也被社會尋求着，不管是統治階級還

是被統治階級，不管你稱它口號也好，策略也好，明裡暗裡總有一個更本質的抽象，更穩定的固有東西在裡頭。

丁：一旦理論外化，就能變成理智的強大運動。

己：對理論的過份信賴，是西方民主國家出現的特殊要求。馬丁·路德倡導改革，提出理論成爲領袖。社會主義國家正好相反，先當頭，才能搞改革。提出了口號，文人們自然編一套理論幫他自圓其說，像阿Q一樣把圈畫更圓一點就滿意。美國建國之父們也不是先討論人類階段，千古不變的理論，而是先幹起來。你要問這些，美國十個歷史學家就有十個說法。

甲：美國革命是受法國革命影響的，法國革命是由啓蒙思想家在理論上奠了基的。我們有忽視理論的傾向，是危險的。要開展歷史現狀、未來的研究，搜集資料調查研究，哪怕先出些小冊子，用電台廣播，使得一般群眾心裡也有個ABC。否則怎麼會學潮大起大落，一會兒千人簽名信，一會又水波不興了呢？我們要有自由民主人權的「ABC」，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也使大家有個新的信仰、信心。

己：你要問鄧力群、胡喬木當年對馬列知道多少，他還沒今天北大學生知道的萬分之一。

丙：目前西方的許多理論已對各個學科準備齊全，我們拿過來就可以，不宜化過多精力。

丁：西方有許多新見解，但尚未形成高屋建瓴的完善體系。況且他們對中國問題的了解，也遠不如我們深切，往往隔靴搔癢。

乙：在座各位，如有心投入運動，究竟是做個

宣傳家、清高的詩人哲學家，還是當政治家？如做後者，就得有綱領、策略，得個社會變革的成果，這就需要理論。否則，就不掌握規律，一些機會就會抓不住，適時的口號就提不出，甚至會做悲劇性的指引。在策略上不注意，就使群眾離開你，結果只像蘇聯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變成一種遙遠的吶喊。就眼前而言，對中國政局的分析，上層兩派誰勝誰負，並非最重要的。關鍵是，將來如改革派大獲全勝，會怎麼幹？他的自身局限，會使他走向何方？我們在每一階段的對策又是什麼？需要理論喚起良知，需要組織，需要憑借以上的東西來宣傳鼓動。還要注意可行性、可接受性，做的時機、方式。不能脫離了國內的億萬人民。既要對現存體制作根本性的評估，也要有條不紊、脈絡清楚、循序漸進、環環相連地籌備長遠的事。說中共不行，爲什麼他還能維持下去？你又如何迫使他轉變？換了你怎麼幹？關鍵是摸透國情，看清歷史大趨勢。不能老是短期的、盲目的、自然的成功。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黑暗中摸索，一旦各國或先或後一條大路通了羅馬，意義非常重大。現在有一種設想，是通過經濟改革，活躍市場，使中國的經濟出現私有制佔相當比重，形成多種所有制局面，產生一大批企業家新貴，就有了未來大變革的政治承擔者（按共產黨的理論，叫做新的階級或階層），整個上層建築就會漸變，部份質變，將來大變動就和平一些，流血少些。

不合程序就得反對

己：這裡順便談幾句我對中共改革的總態度。

我對「支持趙紫陽、超越趙紫陽」這個口號的前半句持保留態度。你得有個原則的下限，不能什麼「做對的就支持，做錯就反對。」再荒謬的言論也得允許對方說，再美妙的行為也要經過受益人的同意。不經同意，就得在原則上加以拒絕。「即使主張和我們一致，但如果不合程序就得反對」。這就是原則的下限。專制就是壟斷做好事的權利。人家都不承認你的公民權利，一古腦兒塞給你，你只讚成他百分之五十，那餘下的一半又並沒有反對的權利，那麼就等於全部接受。海內外輿論要回到常識上來，「做對的就支持，就接受」等於稱讚他違背民主程序。群眾不能從根本原則上來反對他，那麼民主就毫無希望，永遠只能等待上天的恩賜。要知道，即使對過去幹的大量壞事蠢事作一點既不及時又不徹底的糾正，仍然連零錢都沒有越過，還是個不及格，而且還是負數，那還有什麼可以稱讚的？每當中共看到自己快完蛋了，就做幾件「好事」，然後又倒行逆施，就這樣周而復始。按我們目前的策略，他就能永遠穩定下去，因為你沒有做好事的權利，而他永遠可以給群眾幻想。更不要從他們的角度考慮，似乎他有無窮的苦衷可以加以諒解。靠讚揚淘氣學生的微小進步方式來促進中共，只是寵溺他更肆無忌憚。而且，他們曾多次反復、顛倒要賴、毫無信用，你寄希望於他的空頭支票，將來必定束手無策，現在一定極大地瓦解民主派的關志。必須讓騎牆的知識份子內心有愧，得有價值序列的正確評估，不要讓兩面討好的反側成了英雄。最後，

主張被人偷完，你也就被忘記了，這是最慘的，所以應當觀點鮮明，使中共不能剽竊。

爭取群眾 積累成果

乙：你的民主原則的思想是很精闢的，作為策略來說，代表一個派別的觀點是好的，然而作為一個組織的主導思想却是不妥的。

我是主張對改革派做的一些客觀上有利於人民的事採取支持態度的。這是基於以下的考慮：第一，我個人認為，按中國的國情，從目前情勢說，還看不出在相當時期內具備另一種勢力取代中共的條件。正因為你目前被剝奪了做好事的權利，那麼對於那些與你目標相同的政策採取支持態度，也就是把我們爭民主的成果體現在現有制度的漸變上。如此，社會在前進，人民在覺醒，統治者在後退，便在上層的讓步中，積累儲存了我們的鬭爭結果。現在，對官僚體制內部的派別鬭爭，我們只能兩害取其輕，把我們的成果轉到某一派身上，容易使主張得到實現。第二，假如我們在理論上明晰，在信仰上堅定，自然對中國和人類的前途充滿信心。對改革派的有益政策採取支持態度，無非是因為群眾（包括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尚未對中共完全幻滅，恰恰正是目前對改革派抱有的期望值過高。我們當然應該向大家說明這一點。

丁：問題是，讓大多數群眾信任我們而唾棄中共，這需要時間來向千百萬人顯示經過檢驗的歷史邏輯。對改革採取支持的意義；如果中共真正徹底改革了（哪怕是全部剽竊我們的，我們不計較一己的名利，只從

國家的進步着眼），那麼中共就異化，變成非共，變成社會民主黨，當然應該支持他。事實上這是虛假前提，譬如，他絕不能丟四項原則。如果中共假改革、真頑固，那麼他就會與曾被他的打倒的腐朽階級同化，變成最反動的垂死階級。自然，當年的微小「改革」那一套偽裝他會全部收起。這時，我們既可以用他自己昔日的改革綱領作矛去攻他，也可以用當年他的改革諾言當盾去防他，而我們的一貫立場觀點，也就留下了歷史記錄。人民將不忘記我們。這樣的支持中共改革，就是支持我們自己的未來聲譽，何樂而不為？

力爭和平變革的道路

乙：再可以補充一點，一個社會在還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時如有任何政治團體黨派主張使用暴力的話，就一定得不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甚至同情。今天在群眾中瀰漫着的漸變改良的迷霧，應當是中國社會和平演變客觀條件還存在的反映。而且，群眾的覺悟也需要逐步提高，現實將來會成為難得的歷史教師。我們對中共改革的支持，正是為了全民族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力爭和平的道路。革命有時要求迂迴、曲綫，這樣做我們將不被孤立，而隊伍會得到最大的發展。

戊：還有，中共經濟若遇到困難，勢必政治寬鬆，要進一步拿出改革的姿態，我們加以支持，這是最有利的形勢。

甲：我們的前途，就在於國內民主運動的如火如荼發展。在上述條件下，革命就有可能和平發展，反對黨派及政治團體有可能從地下非法變為公開合法，有可能出現中共

因為有了他……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陳明郁

代表人物靠攏人民的事例。支持共產黨領袖人物在改革中完成該黨應有的下降曲線，就是使民主變成強大運動的重要條件。

丁：現在，海內外有相當多人對中共的改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上層改革派所抱期望值過高。他們暗中竊喜，以為中共會異化為社會民主黨。事實上，真正存在的是另一種異化，那就是從大眾公僕變成社會主人，變成最腐朽的反動統治，變成阻礙社會進步的中世紀教會、垂死階級。我認為這是種異化對各國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是一種無法規避的世界性歷史趨勢，所以各國都爭相改革，妄圖逆狂瀾於既倒。不看中國，更不看越南，也不看波蘭絕大多數工人階級反對共產黨，只要看蘇聯對改革的迫不及待，就知道他們都已在異化的量變路上了。但，既然是一種歷史大趨勢，是「劫」，就絕不是統治者的明智或愚蠢可以得以改變它的死刑結局。緩刑雖可以做到，也只是使結局到來的速度方式有變化而已。我們以策略的變量去對付中共的本質常數，就能使積的總值不變。應當在理論上作出說明，使大家有信心；應當在程序上制定軟件，使大家目標清晰，隨時有相應的對策。這樣，民主派就能從「自在」化「自為」，從盲動變自覺。歸根究底，歷史的運作是由人作為細胞來完成的。免除了無序消耗的活化份子越多，對中華民族重新確認人的尊嚴，對世界人類重新尋求人的價值的貢獻也就越大。

甲：我們希望海外的華人，首先是學者、留學生，大家利用有利的條件來做這件工作，首先把留學生搞齊心了，讓千百萬人明白了，以此影響中國政局的發展，使中國之春早一天到來。

由於中共當局逮捕亞利桑納大學大陸留學生楊巍，至今尚未公開審判，促成美國參議院通過編號九二三號的「國務院授權法案」增加條款，允許來自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學生身份(F-1、J-1)失效後以「延長自動離境」的身份繼續停留在美國。

由赫姆斯議員起草的九二三號法案修正案，規定只要是中國大陸留學生，具有回國後被迫害的恐懼，都可取得「延長自動離境」身份。

法案認為楊巍並沒有觸犯中國大陸法律，他被捕是中共當局有意殺雞儆猴，恐嚇不同意中共政策的留美學生。

毫無疑問，此舉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人權問題的態度的一大進步。

因為有了他……

楊巍入獄已將近一年了。這個引起海內外矚目的案件至今沒有公開審判，使不了解個中內情的人們愈益懷疑中共當局理虧情怯，他們根本拿不出楊巍的犯罪證據。

自從教育委員會部長級大員何東昌來美後，幾乎全體持J-1簽證的留學生、訪問學者都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當阮孟雄參贊宣稱已有一份黑名單遞交美方，上列人員不得改變身份或延期離美後，這種壓力便增大到使許多人不堪負荷的態度。

於是，在留學人員中間流行着一個新名詞：「J-1之網」。被這張疏而不漏的巨網罩住的人，很難超期在美國繼續其學習和工作，更遑論謀求永久居留了。

現在，形勢急轉，九二三號法案的通過，使得被罩在「J-1」之網中的大陸留美學生有了新的出路。敢問何以如此？

因為有了他……

請不要忘記，「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正是因為有了楊巍這樣一位錚錚鐵漢，陷身囹圄，背負種種惡名，才使你我有可能在新大陸有更多的人生活選擇。

自筆者幼年入學，滿腦子便被灌入諸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類的動聽口號，眼見一個又一個偶像豎起——雷鋒、王傑、歐陽海、劉英俊……及至文革思想大解放，才發現這些都是當權者為了兜售狗肉而掛出的羊頭，從此不信世上還有真正的英雄人物。

而今，留美中國大陸學生裡出了個楊巍，我認為他不愧為真正的英雄。

楊巍以血肉之軀投入中共無法無天的虎口，犧牲了自己赴美深造的前途，却換來更多同學繼續深造的機會！

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們需要楊巍，十個、百個、千個、萬個……

十三大與中國大陸政情的發展趨向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冷橫眉

編者按：

冷橫眉先生對「十三大」後可能發生的中國政情的走向作了分析和預測，我們認為頗有道理。「十三大」將會對中國政局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我們應該作怎樣的評估和與之相應對策？對這一問題，希望能加深探討。

中共「十三大」結束後，其政綱不僅得到外國政府、官員、記者的一致好評，而且也得到了海外華人的交口稱讚，甚至連台灣國民黨政府，也認為「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反左利器，對此，我則存有異見，現將我的看法表述如下，以供探討：

必須注意「十三大」的「人治」色彩

我認為對一個國家的政情分析，第一個標準應該是：到底是「民主」加強了？還是「人治」色彩更濃了？後者絕對不是於國於民的好兆頭，但現在我觀「十三大」，非常失望地感到，該會並非顯示「民主」的進步，而是恰恰相反，却處處顯示了「民主」的反動。

先讓我們來看一下中共「十三大」召開前

的政局。本年初，由於學生風潮的湧起導致了總書記胡耀邦的下台，又由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開展，導致了彭真、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羣等人勢力的膨脹。現在，再由於趙紫陽的脫穎而出，使「保守派」全盤皆輸，這一台台好戲的演出，其創作者絕非「人民」——仍和中國大陸近四十年的情況一樣，「民意」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幾乎等於「零」。它乃是出於一人之手筆——這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如此輕易地搞垮了胡耀邦，又如此輕易地將「新四人幫」整下台去，並逼使元老全部下馬，以他一人之權威，置若干政治勢力於股掌，那麼，我們無論怎樣估價中國大陸政情的「人治」份量，都不為過。

鄧小平在「十三大」上表演了兩個「小節目」：

一、修改黨章。原黨章規定，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是中央常委方可擔任，現鄧小平為了退出中央常委，但又必須任中央軍委主席，此種矛盾，顯然不符合變化了的情況，因情況變化而修改章法，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以「人治」替代「法治」的好例子。

二、鄧小平是否留任中央常委，需代表投

票表決。這看來貌似民主，但在中國大陸的特定的情況下，實際上是演了一台戲。因為鄧小平不任中央常委，是鄧小平的既定方針，出席「十三大」的代表是絕不可能用他們的個人意願去改變這個方針的，所以在表決之下，無非是加強了對鄧小平的頌揚聲，以給他「光光彩彩的退休」增加一點心理上的榮耀感和在人民中的更深刻的印象。鄧小平玩此小技，實在無聊得很，但也表現出他的人格中的封建意向。

鄧小平自此進入「垂簾聽政」的時代，而我覺得現在中國大陸並不像海外報紙所說的，是「鄧小平時代」的結束，而是「鄧小平時代」的強化；通過「十三大」，鄧小平進入了他權力的巔峰，唯一可以制衡他的力量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他的八十三歲的高齡和他身體的實際健康狀態。

「人治」的加強必然帶來「法治」的破壞，一旦一切都無章可循，所有的建樹就將變得沒有意義，任何理論都會淪為領袖的情緒的代名詞。

可惜的是，鄧小平恰恰屬於情緒不穩定並且思想業已僵化的老人，他並非沒有反覆無常的紀錄。

沒有明確定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是「十三大」的最主要的內容，它的目的是「改革派」為了改革的需要，而設法鬆動馬、列、毛主席的固有的教條而建立的理論武器，其用意是要為改革服務，就此而言，說它是「反左的利器」是毫無疑義的。

但問題出在中國大陸不是一個「法治」而是一個「人治」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裏，法規和理論要不形同虛設，要不就是隨人擺佈，它一切都需圍繞著「人治」的運作而變化，為了適應這種變化，當權者經常在「辯證法」的掩蓋下，偷換原有的理論概念，結果是領導者可以在同一理論的口號中「左右逢源」，而人民却無所適從，理論本身就成了一個沒有確定含義的任人解釋的東西。

這樣的例子在中共黨史上俯首可拾。

我們以最簡單的「為人民服務」這一口號（實在說，不能成其為理論）為例，這個口號本身可以說是正確的不能再正確了。要想在這樣的口號下偷換概念、「左右逢源」，恐怕一般人認為是難乎其難的，但中共却可以。比如說，當毛澤東在推行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的時候，就可以改變「為人民服務」的實質。「人民」——絕對不包括地富反壞右及一切牛鬼蛇神，「我們絕對不為牛鬼蛇神」服務，而「文化大革命」、「牛鬼蛇神」遍地都是，「人民」不過是虛有其詞。由於概念的被偷換，就造成實踐的混亂。筆者就親眼看見一個「活雷鋒」式的人物坐了「牛棚」。怎麼回事呢？有一個年輕人，下雨天的時候，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風雨中跋涉，其狀困苦，他出於「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把老太婆背到家中，噓寒問暖。這本來是一台任何人見了都會誇耀的好事，誰知一查，這老太婆是個「地主」，這位「為人民服務」的年輕人却變成了「為地主服務」，他由此而獲罪。這荒唐的事實正是這種偷換理論概念所造成的結果。

再舉一例。胡耀邦在一次中國作協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了「創作自由」，作家們一下子「歡欣鼓舞」，甚至有人寫文章，預測中國的「

文藝復興」即將到來，像曹雪芹那樣的大作家將會湧現。但過了只兩、三個月，上面的精神又下來了，曰：「創作自由並不等於出版自由」，「作家在創作自由的天地裏，必須考慮對社會的責任感」，於是，作家一下子又像洩了氣的皮球。

上述兩例，都是非常明顯地說明中共如何善於玩弄其理論的遊戲，保留了其理論的外殼而隨心所欲地變換理論的實質，進一步改變了實踐的方向。

再說一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該提法出自十二屆三中全會，並且當時在公報裏只是一筆帶過，並不顯目，並且還作了解釋，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不能隨便亂扣」，「不要什麼都說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有敵我矛盾才能解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事情一來，馬上就變，弄得舉國上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變換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反過來還顯得很合理，說：我們早就強調過，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嘛，我們並沒有變呀！

再如「四個堅持」，整個政情趨於緩和的時候，可以把它尺度縮得很小，一旦「龍顏」發怒，「四個堅持」就可以是橫行在大陸上的洪水猛獸，足有把無辜的人民重新再推入災難的深淵的力量。

同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雖然它目前是改革派「反左」的利器，但只要鄧小平高興，也可以偷換其概念，變為「反右」的利器。

遁詞怎麼都能找得出來，比如，他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首先是「社會主義」的嘛，現在有人搞成「資本主義」的了！這不，就變了。

所以，我勸大家都不要高興得太早，這一理論與其說是「反左的利器」，不如說是「左右都可以應用的武器」更為恰當。

如果趙紫陽的報告能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下一個明確的定義，然後用法律的程序固定下來並且消除「人治」的色彩，那才能使它「不變」。

這個定義就是，明確指出：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可惜趙紫陽沒有做到這一點。

趙紫陽目前的「改革」 方案必然失敗

目前趙紫陽的權位可以稱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要這「一人」不變，他的地位就暫不會改變，他在台上推動「改革」，「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理論就會成為「反左的利器」。

但這種狀況絕不會是永久的。

現在，對趙紫陽來說，只能講有一個很好的「基礎」。但他要保住他的地位、他的權威、他的理論，必須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是什麼呢？——就是他拿出他「改革」的政績。

如果他「改革」成功，則鄧小平就可順利地將班交給給他，如「改革」百病叢生或導致失敗，中國政情必發生反覆。而依我看，這反覆還不只是發生在「改革」失敗之後，而是貫穿在「改革」的過程之中。出一點什麼岔子，就有一點什麼反覆，反覆——糾正——反覆，中國大陸將出現左——右——左的膠著循環狀態。

這就是說——趙紫陽已把自己「吊」起來了。

但按目前趙紫陽的設想，「改革」能不能成功呢？我的看法是絕對不會成功的，最多只是有一些微量的變化而已。

毛病出在兩個方面：

一、「政黨分家」解決不了政治上的根本弊病。趙紫陽的報告在政治改革部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儘量縮小黨內官僚體制對經濟的控制權，二是儘量在黨內尋找克制自身腐敗的制衡體，前者是黨政分家，後者是強化監督。但是，我們要看到，這些措施不管如何強硬，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必須在「黨內」進行。也就是說，絕不觸動「一黨專制」這個制度的本身。但近四十年的教訓告訴我們，所謂的官僚主義，所謂的蛻化變質，不是個人為的現象，而恰恰是這個制度運作的結果。制度本身不作根本變革，就像企圖殺死個別癌細胞而無法阻止整個的癌細胞的擴散一樣，趙紫陽開的是治表而不是治本的藥方。當他拒制的東西無法拒制的時候，這些意欲除之的腐朽力量便會作負面集結，同改革一較高下。所以趙紫陽同他的改革計劃隨時都可遭受滅頂之災。

二、「關廣梅現象」和「溫州模式」也不是振興經濟的根本。這些措施，不過就是「化公為私」，和當年的「包產到戶」向出一轍。「化公為私」雖然增加了私有制的成份，但由於「公有制」的存在，將會使它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過去「一包就靈」的「包產到戶」，該形式已經基本上用到了極限，所以糧食產量出現了令人震驚的下降。與之同理，「關廣梅現象」和「溫州模式」可能會帶來一些眼前的好處，但到了一定的時候，它終會成爲經濟發展的羈絆。而且就中國目前的政局來看，這些城市改革的形式還要用得好，否則就可能帶來通貨膨脹、經濟犯罪等負面影響，成爲「保

守派」攻訐的口實。

既然趙紫陽開不出改革的處方，那麼，他怎麼可能會有改革的出色的政績呢？

以我預測：趙紫陽的政治生涯不可能維持長久，他或者會被鄧小平再度廢黜，或者在鄧小平死後不久即失去權力，兩者相較，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除非趙紫陽憑藉權謀，譬如說，利用軍隊或宮廷政變形式，加強本身地位的統治。不靠政績而靠權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屬本文討論範圍。

「改革」將會帶來什麼動盪？

如果按照趙紫陽的報告去執行和推動改革，將會給中國大陸帶來什麼樣的動盪呢？

我認為，在短期之內，趙紫陽推行的「改革」首先會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爲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爲改革所企圖誘發的積極因素不經過一定時期的努力是難以顯現的，更何況這些措施本來就是「治表不治本」，成績就更難讓人注目。而反之，由於社會制度的痼疾所造成的腐敗則隨著改革而沉滓泛起，將會帶來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這些現象是：

一、物價上漲將有增無已。由於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波及到物價，本來就是正常的現象，但因爲生產本身的不景氣，而導致物價的相當程度的失調，不能說不是一個致命的弊害。現在中國大陸物價上漲的程度相當驚人，據我估計，隨時都有失控的可能。物價的上漲必然影響人民的普遍利益，對此不可等閒視之。

二、經濟犯罪會更趨嚴重。經濟犯罪的產生，是由多種因素造成，其主要點，是法制不

健全以及「公有制」的緣故，再加上官僚主義、物價上漲、一切「向錢看」的道德觀念，致使經濟犯罪處處有漏洞可鑽。而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越是「改革」叫得兇的時候，經濟犯罪的現象就越嚴重。

三、利益的不均衡所導致的不滿情緒將可能激化。「改革」並不是能使所有的人的利益都能得到兼顧的，特別是如下幾種人的利益：1. 將失去職務的官僚及政工人員的利益；2. 國家公務人員的利益；3. 一般工人的利益；4. 窮困地區的農民或以農爲主要謀生手段的農民的利益。他們將會從他們自身的角度抨擊改革，假如相當時間內他們得不到好處，矛盾就會激化。

四、道德觀念的急劇變化而帶來的道德淪喪。很明顯，「向錢看」的觀念將比一切空泛的意識形態更有吸引力，由此而會帶來人們道德觀念的急劇變化，但此變化又處在一個集權制崇拜馬列的國家壓力之下，就將向畸型和變態的方向發展，由此而生的貪污、賄賂、盜竊、賈淫、幫會等等犯罪現象，都會像毒菌一樣蔓延叢生。

這是不徹底的「改革」的報應——不廢除一黨專制，不提倡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不斷然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決裂，不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它就只會結出這樣罪惡的果子。

如此亂局，且看趙紫陽怎樣收拾！

我是對改革不抱有幻想的，對中共更不抱有希望，他們長此統治下去，只會毀掉我們偉大的國家和民族。也許我太悲觀了，但四十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只有把事態估計得愈悲觀，就愈符合中國大陸的政情。

啊，苦難的中國!!!

重大突破與遮羞布

——評析中共十三大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胡鵬

歷時八天的中共十三大結束後，引起人們極大關注的，一是中共的人事安排；二是拋出了一個被中共稱為重大突破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個理論修正和否定了中共所崇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突破不能不說是個進步。但是，中共提出此理論實質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官僚體系，維持專制政權，推行現行政策。中共打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旗號，實際上是扯起了一塊遮羞布，這面貼有所謂的「社會主義」標籤的旗幟背後，是一團充溢着封建專制色彩的大雜燴。

中共執政三十八年的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論和所謂的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行不通。尤其是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間，大陸瘋狂地推行極左路線，搞什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追求幼稚可笑的一大二公，使大陸的經濟長期的處於貧困。特別是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基本路線」，那樣的

理論，那樣的路線，給大陸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毛澤東統治大陸的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中共統治大陸的幾十年間逆歷史潮流而動，使人民大眾掙扎在痛苦深淵裡的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馬克思主義產生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特定的地區，這個狹隘的理論，在當時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事隔一百年後怎麼能夠繼續成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這應當是人類文明社會的一個奇恥大辱。

中國社會是個漫長、落後和愚昧的封建社會，這個資本主義從來沒有市場的生產力發展極低的中央帝國，怎麼可能一步躍入馬克思、列寧所空想的那種社會呢？更何況中共是一個農民起義的黨，這又造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先天下不足。這個帶着濃厚封建意識的農民黨根本就沒有能力去實現馬克思的空想社會。

事實證明，這個農民黨正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獨裁專制的理論，把這些

扼殺人性，破壞經濟規律和科學規律的理論奉爲自己鎮壓人民、充當新貴的擋箭牌和聖旨。三十多年來，中共所推行的正是以封建主義爲基礎的思想混合體，這種殘酷的混合體給這個多難的民族帶來了無窮的苦難。

自鄧小平上台，中共推行「改革政策」以來，黨內一直存在着尖銳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衝突。這兩派爲了維護一黨專制，都自覺地死死地抱着過時的、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放。但是，爲了改變大陸遭世人恥笑的貧窮落後的面貌，爲了鞏固當權者的地位，改革派大膽地推行了經濟改革，和正在着手進行有限的政治改革，從這一點上講，改革派遠遠比保守派進步多了。

改革派萬萬沒有料到的是，經濟改革的迅猛發展，衝擊着那暮氣沉沉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空洞教條顯得那樣的蒼白，而且今天正是在共產黨人手中駕駛的改革推土機，推倒了那些騙人的、搖搖欲墜的馬、恩、列、斯、毛的這一座座腐朽的理論大廈。因此，頑固的保守派常常指責改革派離經叛道，而又不時揮舞大棒，改革派在混亂的死潭中，也常常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

實際上，大陸推行經濟改革，資本主義朝氣勃勃地衝擊着這個凍僵了的社會。私有制、股份制、利息分紅、獎勵性收入、計件工資、僱傭工人、買賣土地等等，這些深深打上資本主義烙印的東西統統在大陸四處冒頭。實踐又證明，哪裡推行資本主義得力，哪裡就生機勃勃，興旺發達。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肯定了大陸現階段改革中各種經濟體制合理並存。同時，在關鍵性的市場問題上，趙紫陽特別談到要加強

市場功能，而且將市場體系自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擴展到資金、勞務、技術、房地產和信息方面。市場機制的擴展，必將大大削弱中央計劃的功能，使整個經濟體系的結構與運作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與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是大相徑庭的。

趙紫陽在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和論述中，表示這個階段是從五十年代國有化之後必然要經歷的特別階段，而且估計將起碼要百年時間，才能結束這個階段過渡到「發達的社會主義」。應當講中共玩弄這些時間遊戲是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這僅僅是爲了當前的經濟改革，而不得不掛起一面仍然被稱爲是屬「馬」字號的「社會主義」的旗幟，這樣既免遭保守派的攻擊，同時也防止了資本主義陣營和集團的嘲諷，這一金蟬脫殼實在是妙，使改革派的措施合理化了。這一提法的出現，其目的方面是爲改革派的「資」字摘帽，定性自己仍爲「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則在意識形態上採取主動，使改革勢力重歸馬列正統。

不管趙紫陽在他報告中如何巧妙的解釋，在這個所謂長達一百多年的初級階段中，對資本主義是一個全面性的肯定。大陸正是要借助於這樣的肯定，才能使經濟得以復蘇，擺脫貧困，走向小康。

應該指出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最先提出這個理論的是被革職的中共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他曾因提出這樣的理論而遭到批判，誰會料到被勒令退黨的蘇紹智的創見今天居然成了總書記的綱領性的內容，這太具有諷刺性了。這只能證明大陸的學術自由、政治民主還是多麼的遙遠。執政者爲了維繫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包括檢起持不同政見者投過來的短劍，而作爲自

己的利器，排斥異端，打擊對手，千方百計地鞏固自己的專制朝廷。

經濟的洪流將衝擊那些陳腐的理論，尤其當今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必將衝破那些抱個人野心的束縛、限制。人民大眾會在這自由的經濟海洋中獲得更多的自由，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不管任何政黨提出任何維繫自己的理論，不管任何政黨挖空心思打出何種旗號，只要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違背

●留學生專欄●

還是不回去爲好

(美國)太德

國家教委常務副主任何東昌在美宣佈兩點：一、中國未因年初學潮處分任何學生；二、千人公開信簽名者對國內情況不了解，將不予處分(不言而喻，寫公開信是大錯特錯，只是黨寬大爲懷，暫時不與你輩計較而已)。

雖然黨寬大爲懷，放我等一條生路，但是有人却不識時務，竟敢懷疑黨的英明正確，問曰：「姑且不論楊巍算不算學生，今年以來，各大學因不同理由處理的學生可不少，復旦大學、南開大學、西安交大……，這是爲什麼？」

黨早已成竹在胸，正色答道：「這些學生是由于偷東西，不好好唸書，搞小集團活動，看『中國之春』而被開除的，和遊行一事絕無關係。」

「那爲何大多數被開除的人都是遊行的參與者呢？」有人仍執迷不悟。
黨寬宏大度，微笑答道：「開除逮捕他們

了人民的意願，終將遭到唾棄，歷史是無情的。

我們高興地看到，大陸民衆在經濟開放和發展中，不僅在生產方式上向傳統挑戰，而且更主要的是向傳統的思想挑戰，思想上出現了空前的活躍，那種「一言堂」的時代再也不復存在了，我們應該好好感謝，這是經濟改革的功勞。偉大的詩人歌德說得好：「理論永遠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才是長綠的。」

是因爲其它問題，罪並不在遊行。再說，中國是法治國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雖寬大，也不能因爲他們參加過遊行就終身赦免其刑事犯罪啊！再說，爲什麼參加遊行的人中刑事犯這樣多呢？可見參加遊行的人裡是有壞人了。」

「那麼抓了這些人，學生運動就從此沒有了不成？」我似有所悟。

「當然囉，小平同志不是早就說過嘛，一抓洩露國家機密的(如魏京生等)，學生運動就沒有了。你瞧，小平同志說話邏輯多嚴謹啊！」

黨真偉大，幾句話說得我啞口無言，心悅誠服。

既然何主任講的兩點中其一是真，那其二也就必然會兌現了。

因此，在千人公開信上簽名的我，想想還是不回去爲好，以免成了「刑事犯」。



「十三大」會場

是改進專制制度， 還是建設民主政治？

——評中共十三大報告中關於政治改革的部份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叢大長

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大陸老百姓長期以來關心的一件大事，所以中共十三大報告中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部份格外引人注意。筆者認為，儘管趙紫陽提出了一些大膽的看法和措施，但由於他無法從中共的理論死結裏跳出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途不明朗，也是不容樂觀的。

趙紫陽強調，中國大陸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只是在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基於這樣的認識，趙紫陽認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致力於基本制度的完善。筆者換一個方式來解釋，即中共打算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是要通過改進領導制度與方式來改善以一黨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主要特點的專制政治制度。人們不禁要問，這哪裏會是什麼「民主政治建設」呢？

趙紫陽提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長遠的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筆者認為，長遠目標是一張開到七十年或一百年後的空頭支票。至於「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究竟是什麼樣子，中共現在的高層領導人不願意也沒有能力給老百姓講清楚。另外，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是根本不銜接的。近期目標旨在建立一個在「攝政王」們指導下的「精

英」領導集團，而選擇「精英」的權力是完全落在幾個「攝政王」手中的。與毛澤東相比，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實行的是一種帶協商性質的軟式專制。他們所希望建立的政治制度不是北歐或美國式的民主模式，而是一種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封建盛世型」與現今的「匈牙利開放型」的混合模式。這樣一個混合模式的專制制度要過渡到「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非常不可能的。

中共是不願意改變其基本政治制度的。趙紫陽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決定了就辦，是中國大陸的特點和優勢，決不能失掉。這裏，他所說的「不能失掉」的都是些假民主或不民主的東西。衆所周知，人民代表大會很大程度只是個「橡皮圖章」式的機構。縣、區級以上的人大代表並不是人民選出來的。實際上，連選一個只有小小權力的縣、區級人大代表，老百姓也受到共產黨的約束和干擾。至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更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有一定的獨立性。五十年代初各民主黨派在中共政府中佔有一些席位，但好景不常。五七年反右以後，民主黨派被迫成爲共產黨的應聲蟲，凡是共產黨決定的大事都得舉手贊成。在十三大召開期間，各民主黨派被拉出來歌頌「盛世、盛會、盛事」，成了老百姓的笑料。

趙紫陽提出了改革政治體制的七項措施。關於黨政職能分開，筆者認爲難以實現。共產黨是凌駕一切的，所謂「政」不過是黨管理國家的機構而已。各級政府和基層各個「單位」的領導者幾乎都是共產黨員。筆者認爲，要真正做到「黨政分開」，共產黨必須削弱自己對政府的控

制，並鼓勵和允許非共產黨人士擔任重要職位，力爭先恢復到五十年代初的「聯合政府」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在報告中講了一句大老實話，足以顯示「民主政治」和「黨政分開」的實質。他說，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律程序變成國家意志。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說「黨為重，法、政府次之，民為輕。」

關於下放權力的問題，筆者認為關鍵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權。共產黨如果真想提高地方和基層的效率 and 活力，應該先行撤銷基層的黨組織。實際上，在大學、工廠、醫院、動物園或殯儀館保留一個吃閒飯的黨組織究竟有什麼必要呢？

關於機構改革，趙紫陽提得十分有限，也十分含糊。筆者認為，首先要解決黨的機構凌駕於政府機構之上的問題，比如中宣部就凌駕於文化部之上。還有一件要辦的事是大膽砍去那些無用的機構，如教育部之上的教育委員會以及專門嚇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國家安全部。

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問題關鍵是政務官員由誰來選，業務官員由誰來考。如果人民有權選舉政務官員，且有獨立的公正考核機構來選拔業務官員，那中國大陸的民主就大有希望了。

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無疑也是一種進步，但共產黨必須放鬆對新聞媒介的控制。一九八七年裏被中共勒令停刊的報刊有好幾百家，這決不是促進協商對話的好事情。

趙紫陽提到的第六項措施是改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他強調說，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又是一句空話。人們不難發現，在四項基本原則裏，「人民」連提都沒有提到。

最後一項措施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這還是一句空話，因為在大陸是大於法的。如果共產黨真想健全法制，必須首先實行「黨法分開」，讓司法人員和律師不要受黨的控制和干擾。筆者認為，儘管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竭力想給共產黨樹立一個開明、民主的形象，他提出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和措施是令老百姓失望的。中共的新一代領導人仍無法從一黨專政和四項基本原則裏解脫出來，所以根本不可能把中國大陸引向民主。

大陸的老百姓絕不像共產黨想像的那麼愚昧無知，以致於無法享受民主。實際上，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民主」首。筆者認為，如果中共領導人有誠意、有勇氣建立民主政治，應立即以平等身份與其它政黨一起和平競爭，把選舉政府官員的權力還給老百姓，着手改造人大和政協，並建立一個過渡性的聯合政府為實現民主政治做好準備。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改革派，我們不能無限期地體諒你！」

——與北大大同學談學運 ● 本刊記者 ● 曾明九

【編者按：本刊十月號刊登了北大人所寫的「北大大學生元旦天安門遊行紀實」一文。最近有參加過該次遊行的同學自國內出來，我們派記者前去進行採訪，以下是談話的整理稿。】

問：去年底的全國學運，聽說北大開始得比較晚，對嗎？

答：是的。科技大學的同學十一月底就動起來了，上海同學十二月十九號進行了最大規模的遊行。在北京，清華、師大的同學十二月下旬都出動過，可是，北大就沒動，只是貼了很多大字報，一直拖到元旦才去遊行。

問：為什麼北大學運開始得晚呢？

答：我們開始時聽說科技大學在鬧競選。競選我們在八〇年就鬧過了，選出來的代表後來分配時都沒單位敢要。八四年選舉我們沒鬧競選，不過好多人投了空白票和廢票，弄得第一次都選不出來，後來還是在各系裡設票箱，上面監督着每個人投，才勉強選了些什麼人。去年底學運、鬧民主、鬧競選，那都是我們的老題目了，八五年不還鬧過「九·一八」嗎？老在喊民主，同學們都有些疲了。再說，去年外地鬧事的時候，學校當局對我們學生真是破

天荒地闊懷備至，食堂整頓了一下，又辦了文藝節目，隔三、四天一場，大夥兒還挺高興的，說起來好笑，就在元旦遊行前一天，學校還給加了菜，大家快快樂樂地聚了個餐。不過那時候心裡可就已經有打算了：吃飽了，明兒個上天安門溜躑去！

問：那麼，你認為，北大大學生早沒遊行是因為沒有找到遊行的「藉口」嗎？這樣說來，遊行豈不成了存心搗亂。

答：這個問題倒應該嚴肅地回答一下。遊行並非是要找藉口鬧事，那是一件很嚴肅的政治活動，是大家基於共同政治信念作出的行動，是要冒政治風險的。我們的共同信念便是國家要改革，人民要民主，一黨獨裁、專政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大家才要用遊行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不過，要是有人說我們存心搗亂鬧事，我們也要反問他們一下：幹嘛我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放着好好的書不唸，要上街去搗亂？大學生又不是小流氓。

問：那麼，你如何解釋你們沒有「藉口」便無法遊行的事實呢？

答：那不是一個「藉口」問題，而是遊行的時機問題，首先要肯定，遊行是大家都想去的，民主信念也是為絕大多數同學擁有的。但

是，應該在什麼時候遊行、什麼樣的事件最能夠在同一時刻激起全體遊行者的憤怒和關切，却是個很微妙的問題。比如說五·四運動吧，其實大家早就對軍閥政府恨之入骨，可是為什麼早沒遊行呢？就是因為沒有契機，沒有發生一件像巴黎和會中發生的那種喪權辱國事件，這一事件一下子將人們多年埋藏在心中的情緒引爆了。又如我們親眼見過的天安門事件吧，對「四人幫」不滿還不是早就有的事，幹嘛一定要找悼念總理這個「藉口」？幹嘛一定要找上清明節這一天？顯然，雖則不滿情緒普遍存在，但要找到一個能吸引大家注意、激



一片丹心為報國
——北大大學生整隊待發

勵大家情緒的事件是很重要的。其實，這點共產黨當局比大多數人都明白。合肥、上海學生一鬧事後，他們對北京學生馬上就小心翼翼，恩威並施。去年所以要在十二月中下旬在北大辦「文藝節」，也就是要躲過「一二·九」這個「坎兒」，因為八五年「九·一八」時同學宣佈過「一二·九再見」，結果八五年十二月九日那天校內如臨大敵，沒鬧成事。到八六年「一二·九」時，當局又趕緊陪上小心了。要不，他們怎麼不另選別的什麼日子辦文藝節呢。所以，作為遊行根本原因的政治信念和情緒都是始終存在的，但激起遊行的契機却是偶然的。在北京，就是「十條」的頒佈。

問：按你這麼說，是否民運人士應當尋找適當的時機來激發人民的民主情緒？

答：老實說，由這些人來「激發」，作用不大的。你怎麼去「激發」呢？又不能舉着「民主自由」的牌子坐在北大的三角地自焚。各大學，特別是各名牌大學，學生都有自己的的一套，也都很自負，討厭別人從外面來「指導」他們的行動。不過不用擔心，在「激發」學生民主情緒中最賣勁兒的就是那批共產黨左派大老粗官僚了，他們看着學生鬧事就有氣，總想給這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們一點顏色看看；學生看着他們也有氣，他們一嚙牙，學生就咧嘴，也給他們點顏色瞧瞧。你看，他們哪次不是這麼辦的呢？

問：既然是在爭取民主，那麼為什麼北大同學選打出了一支持小平，擁護改革」的標語？

答：豈止這條！還打出了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呢！後來「北京日報」就為此說我們是「打着紅旗反紅旗」。不過，打出這些口號還是很恰當的。

問：這些口號和你們的遊行目的不好相違背嗎？

答：並非如此。口號本身不能完全說明遊行的目的。我們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我們為什麼要遊行？就大的目標來說，當然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但就具體的目標來說，却是為了爭取遊行自由。本來嘛，我們就是為了要修改限制遊行自由的「十條」才出發去遊行的。

問：那你們豈不是「為遊行而遊行」了嗎？

答：可以說是這樣的。這聽起來似乎荒謬，實則不然。在人們有遊行自由的時候，遊行是爭取某種目標成功的手段；而在人們沒有遊行自由的時候，爭取這一手段的實現便成了目



流水東流難山峻
——湧潮學生遊行

標。這裡牽涉到一個我們國內常常討論的「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在民主制度下，民主是監督政府和社會的手段；而在專制制度下，民主却是人民革命的目的。因此在今天，爭取這些手段的實現便是我們的目的。

問：你的話令我茅塞頓開。這樣看來，你認為遊行本身的實現比遊行所打出的口號更重要嗎？

答：對。其實，共產黨當局對這點是非常明白的。蘇聯有「持不同政見者」的稱號，實際上，中國現今的持不同政見者，用中國式的玩笑來說，是「土八路多極了，遍地都是」。人們都說，現在在中國抓右派可太難了，人人都右，抓誰是好？倒是抓左派容易，就那麼幾個在形影相吊，實在顯眼。但是，當局最頭痛的，並不是「持不同政見」的人，這些人固然可惡，但更可惡的是那些「持不同形式」的人，例如獨立組黨啦，自己辦刊物啦，搞競選啦，組織遊行啦，等等，總之，是「搞資產階級民主那一套」。中共從自己的經驗中深知，缺乏組織的中國人是成不了大氣候的，再不滿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其奈我何？但是，一旦有人開始「持不同形式」，那就表示他有意要在「組織上」另搞一套，這就危險了，要鎮壓了。中國現在的民主思想很普遍，但卻沒有適當的民主形式來保障發展民主思想；而一旦具有了民主形式，即使民主思想一時還不夠發展，不夠充分，也會在民主形式的保護下，在民主生活的鍛鍊中迅速成熟壯大起來的。所以，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爭取民主的形式，亦即民主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形式就是內容。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遊行本身比遊行口號更重要的原因。

問：話說回來，你們爲什麼偏偏要提出「支持小平」呢？難道你們當時不知道鄧小平在對待學運的問題上偏向於保守派嗎？還有，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是出於什麼考慮？

答：正如上面所說的，遊行本身比遊行的口號更具重要性，那麼，只要我們能出去遊行，並且是在壓力重重的情況下出去遊行，這就是勝利。而遊行的口號，除了要適當地表現出我們的民主意願之外，還應當對遊行本身起到保護作用，使當局鎮壓遊行在世人眼中顯得更加蠻橫、無理、目無法紀。我們打出「支持小平，擁護改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總不能說我們是在要「資產階級民主」了吧？難道人民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和平合法地來表示支持官方的政策也應該遭到鎮壓嗎？這樣一來，恰好顯露出他們所仇恨的並非什麼「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近代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整個民主原則本身。這是將了共產黨一軍，也將了鄧小平本人一軍。

問：你們還有別的什麼口號嗎？

答：除了「修改十條」之外，其它口號都是很一般的，比如「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堅持改革，反對倒退」一類。這倒讓我想起了一個技術問題。這次學運中爭取民主、自由的口號過於泛泛，給人的印象不深刻，鼓動性也不夠強。這是因爲遊行組織得太倉促，同學們又經驗不足的緣故。下次遊行，我們就應該像四七年「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的學生那樣，編些通俗而又有力的口號、順口溜，讓人們一看就明白我們要幹什麼。如當時的學生喊的是「蔣總統、李總統，政府都是大飯桶」、「要自由、要民主，鍋裡更要有米煮」等等，多麼形象生動，易於爲一般人民所接受和傳播。還應該有些易學易唱的歌曲來鼓舞士氣，這

次遊行，光唱「國際歌」，太沉悶了。例如，拿「打倒列強」的曲子來填首遊行歌，效果一定會非常之好。

問：說到了易於爲群眾接受，請問這次群眾對學生的態度如何？

答：他們採取的是帶鼓勵的觀望態度。

問：什麼算是「帶鼓勵的觀望態度」呢？

答：這就是說，一般市民群眾雖然沒有加入遊行隊伍，但是他們對學生遊行都抱着一種欣賞的態度，有不少旁觀群眾問學生，你們爲什麼不提物價問題呢？替我們說幾句話也好啊！

問：的確，爲什麼學生遊行不將物價問題提出來？這樣不是能吸引廣大人民關心以至參加學運嗎？

答：問題不那麼簡單。首先，今天的學生經過文革以來多年的「戰鬪洗禮」，在政治上已相當成熟的。在今日中國，物價問題是最敏感的社會經濟問題，不合理的物價上漲直接損害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引起了人民的不滿與憤怒。但是要知道，物價上漲是經濟改革的結果，是改革產生的苦澀副產品。這時候將反對物價上漲作爲遊行的口號提出來，固然會吸引部份市民支持甚至於參加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但遊行示威的性質却會因此改變，由爭取民主自由變成爭取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這會給保守派以打擊改革派的口實，他們會說：瞧，是你們的改革引起了人民的反對！無論我們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獨裁有什麼樣的不滿，但大家都能冷靜地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共產黨是國內唯一強大的、有組織的、掌握政權的政治力量，而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所進行的改革嘗試，也確實爲中國經濟政治帶來了新氣象。因此，不與改革派爲難，在遊行時不提物價問

題來爭取群眾是全體同學的一致意見，不僅北京如此，其它如上海、合肥等地區據我所知也都沒有提物價問題。

問：那麼，是否學生認爲自己爭取的目標與一般市民不一樣，因此不願吸收市民參加示威遊行呢？

答：這亦是個複雜的問題，就遊行者本身而言，當然是參加的人越多，他們的情緒就越高，力量也就越大。但是，讓市民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別看物價問題能激動半天，要是我們真的把物價問題提了出來，雖然能博得更多人的關心注目，但是絕大多數市民肯定照樣還是不敢參加遊行。中國的市民階級是很可憐的。他們中多數人雖然號稱是「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但他們最怕的是失去自己所擁有的那點少得可憐的東西了。

問：你認爲，在未來的民運中市民與學生能夠合作嗎？

答：這就要取決於形勢的發展了。在學生方面，他們是體諒改革派的苦衷和難處的，不願與改革派爲難。但體諒一次、兩次，體諒一年、兩年，總不能無限期地體諒下去吧！如果改革搞得不好，人民生活上得快，社會發展趨於公正，官僚的腐敗無能有所減緩，那麼問題自然好說；如果相反，改革搞失敗了，而且改革派與保守派在政治上聯合起來鎮壓人民的民主要求，那麼學生們便不會再體諒下去了。那時何止是提出物價問題，他們還會列舉出共產黨官僚一系列貪污腐化、魚肉人民、禍國殃民的罪狀，還會大批下去發動人民，甚至還會組織對立的政治團體。那時候，就已經遠遠超出保守改革兩派的問題了。不用說，大家都明白。

問：謝謝你回答我的問題。
答：別客氣，以後請多聯繫。

學潮在繼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奎星

六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喧囂了一天的校園內漸漸平靜了下來，然而天還是那麼熱，北京的夏天真是不好受。座落在北京東郊大北窖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今天上午各系都向本年度的畢業生傳達了分配方案。海外僑胞有所不知，大陸的大學生一畢業就面臨着走向社會去工作的問題，但是政府不允許學生自己去找工作。必需由學院統一分配，這種分配法等於扼住各個畢業生的喉嚨，沒有後門，就算你成績再好，也不會分到好工作的。

凡是學院領導的子女，以及輕工部領導幹部的子女，分的都很不錯。某系一位黨員副主任的兒子分配到北京某大學當教師，某系書記的女兒分到某設計學院搞設計，一位副院長的兒子分配到質促會搞出國展覽設計，等等。而那些沒有門路的同學們不是分到工廠就是分回各省人事局再進行二次分配。更有甚者，有些在學院學習成績很好，但是，平常愛給領導提意見、愛說一些社會上的不平之事、愛議論共產黨的某些作法不正確的學生，是絕不會分到好工作的，他們的畢業鑑定中有這樣的話：「政治上不可靠」等等。

也有些同學在學院四年的學習生活中，彼此產生了感情，在畢業分配時就面臨着分手、分居的情況，他們向系裡領導提出請求，只要分在一起，願意到生活最艱苦的地方去，然而，領導根本不予理睬，一口拒絕。可領導們的孩子，却可以照顧。上級領導的孩子們就更不

用說了，衆所周知，葉帥的兒媳，沒有通過考試就來工藝美術學院進修，二年之後分到北京畫院，在畫院全體畫家不同意的情況下，被上級命名為畫家，其本人繪畫水平之差，恐不及一個中學美術教師。還有，賀龍的侄女，也不用考試走後門入校、深造。黃鎮的兒媳，不但深造，畢業後還留校當教師。

諸如此類，真是舉不勝舉！共產黨的頭頭們天天要求人民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其實他們自己從來就沒有這樣做過一天。

分配方案傳達的當天下午吃晚飯時，就有人公開在學院飯廳內敲飯盆，大聲唱歌，一人唱衆人和，抗議開始了。晚上九時許，突然校園內的男女宿舍樓的燈一下子全熄了，緊跟着男生宿舍樓開始有人敲起了洗臉盆，「噹噹」，「同學們！一個洪亮的男聲開始發表演講，「同學們，我們反對學院當局的這種分配方案，這次分配比任何一次後門都嚴重。據瞭解，自從文革之後一九七七年恢復考試招生以來，我院不僅分配走後門，招生更是走後門，長此下去好的人才進不來，就算進來了，也得不到發揮。因此，我們反對學院當局的分配方案，抗議學院當局的這種做法。現在抗議示威行動開始，如果同學們同意我所說的，就請跟我學。」只聽「匡噹！」一聲，臉盆從樓上扔了下來，接着是「稀里嘩啦」「碎」「叭」，洗臉盆、玻璃杯、暖壺、瓶子、罐子，凡是能響的東西全都向下扔。男生樓一開始，女生那邊

馬上響應，「碎」「嘩啦」，夜深人靜，響聲傳得很遠，馬路上有許多人停下來看個究竟。學院保衛處慌了，連忙給公安局和院領導、輕工部領導打電話，不一會兒學院的頭頭們和公安局的警車都到了，學生們似乎更加有勇氣，不單摔東西，唱聲、吶喊聲、敲擊聲響成一片。難怪院長得借助擴音喇叭與同學們對話，「同學們，不要這樣，有話好好商量，我們——」「嘩啦！」一塊大玻璃落地摔的粉碎，院長的聲音在發抖，她講不下去了，她回頭看看保衛處的頭頭，意思是是否請公安局干預？保衛處長與她耳語了幾句，事後才知道，保衛處長告訴院長，上級指示，不到萬不得已不抓人。院長不知所措了，其它領導誰也不講話，此時此刻這些人都在想什麼？只有他們自己知道。突然，一切都停止了，歌聲沒有了，吶喊聲沒有了，東西摔碎的聲音也沒有了，所有的是寂靜，死一樣的寂靜，在場的所有頭頭們全都呆住了，不知道下一步將要發生什麼事？彷彿時間出現了真空，又彷彿這寂靜也是一種抗議，歷時二個小時的抗議聲浪就這樣停止了，這大概是藝術學院帶有藝術氣質的抗議吧！

我有幸目睹這一切，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有什麼力量能比人民的力量更強大呢？昔日的「文革」，人民的力量被統治階級利用了，那是為了達到他們互相吞食的目的。如今人民漸漸甦醒了，經過痛苦的反思，人民意識到了自己的過錯，開始糾正那些過錯。我想一旦全國人民都覺醒了，那麼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就來到了，人民將拋棄那個愚弄、統治、壓迫、掠奪了他們多年的黨，人民將重新建立一個真正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國家。誠然，這將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與犧牲，是啊，啓明星已在東方發亮，天快亮了。

中國民聯總部

關於魏京生近況傳聞的聲明

美聯社十一月十四日倫敦電訊稱，國際特赦組織據報導，魏京生已在服刑期間死亡。美聯社同日北京電訊稱，中國司法部勞改局副局長王明迪否認上述報導，但是也拒絕提供有關魏京生健康情況和監禁處所。

對這一消息我們表示極度的關切，已通過我們在國內的各種渠道儘快設法證實此一消息的真偽。並發表聲明如下：

一、魏京生自一九七九年三月被關押至今已八年多，幾度傳聞他病重，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到青海勞改等，現在又傳出他死亡的消息。不論這些消息真偽與否，這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北京當局對人權的蔑視，不允許外界探訪魏京生，以至傳聞不斷。

二、北京有關當局應立即允許魏京生家屬及國際特赦組織探訪魏京生。

三、北京有關當局應立即公佈魏京生詳細的健康狀況。如果有病，應允許保外就醫。

四、魏京生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使他在海內外有很大的影響，他的遭遇成了「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指標。中國的台灣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在今年都釋放了許多政治犯。中共也應改善他的人權記錄，考慮釋放魏京生（如果他還健在的話）。並以此為始，逐步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並及早釋放他們。

五、希望海內外廣大同胞，利用自己的最大力量與我們一同關心這件事，為營救中國的民主戰士出力。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從外電傳魏京生死訊所想到的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鄒欣

最近聽到了外電傳魏京生「死亡」的消息，不禁使我想起了幾年以前親自聽到一位中央台記者敘述審判魏京生的情況。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審判魏京生的大會在北京舉行，參加的人員主要為一些公安學校的學生及少部份政府有關人員，還有個別報社、電台及電視台記者。審判氣氛十分緊張，戒備森嚴，但一切程序皆照常進行。魏京生本人的申辯，意正詞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共及鄧小平的弊端，召示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在民主，並喚起全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而奮鬥。

當大會宣判他入獄十五年時，魏京生氣憤的撕開上衣說：「看看我身上被打的傷痕，他們不會讓我活到十五年的！」現在難道真的應驗了他的話？中共不讓他活到出獄，而把他折磨死了嗎？

審判會結束了，但傳來「上級」緊急的重要指示，除了一張官方的照片外，收回全部記者的錄像、錄音、照像底片及一切資料，要審判會情況全部保密不得外傳。所以至今沒有人能看到宣判魏京生的實況，也沒有人聽到魏京生的申辯。

魏京生入獄先在北京，後被送去青海，據講他沒有臣服，在監獄中仍然堅持為民主而鬥爭，但近幾年來他身心被折磨，精神十分不好，曾被送去精神病院。

魏京生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他有什麼

罪？他只不過是表示了一個人應有的言論自由，並鼓吹中國應實施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但被中共強加上了許多莫虛有的罪名，竟然說他透露中國的軍事機密給外國。但捏造這罪名的人沒有想：是誰把軍事機密告訴魏京生的？那人的罪名不是更大嗎？魏京生畢竟只是一名電工。

魏京生爲了中國的明天、爲了自由、民主而獻身，在中國大陸這個集權、專制的國家，又那裡會有人權、自由、民主，甚至人道？

在中國，律師也不是自由施行權意的，他們沒有基本律師的權力，有的律師也因為申張正義而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一個律師親自講，他們一點權力也沒有，相當多的時候出庭是中共當局指派的，而中國的法律不如政策，中共常常根據其所謂「政治」形勢所需而進行所謂從嚴處理，這使多少人入獄，甚至人頭落地，政治犯在中國更是佔犯人很大比例，有些人僅表示反對某一個領導人便被捕入獄，這種例子屢見不鮮。

在中國，中共可以任意指使任何一個人做任何事情。但是我知道全中國人民是多麼渴望人生的起碼權力或自由。他們多麼渴望能生活在一個能自由說話、能自由生活的環境裡。魏京生，他說出了中國人民心裡希望。

魏京生，這個響亮的名字，將永遠不會從人民腦海中抹去！

私有經濟制度的建立，確實是社會走向民主自由的必要條件。當然，並非有了私有經濟制度就必然有民主自由。但是，民主自由確實是離不開私有市場經濟的。這對許多堅信社會主義民主的人來說，是一個痛苦的事實。

通向自由之路

——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實行真正的民主嗎？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李少民

編者按：作者李少民是中國大陸留學生，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修博士學位。李少民同學這篇文章的部份內容，曾在香港（百姓）雜誌上發表過。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民主、自由、人權」，已經成為全人類追求的理想。一九八六年底，在中國大陸出現了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學生運動，其結果導致胡耀邦辭職，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受到批判；今年年初，蘇聯領導人戈巴喬夫倡導政治改革，許諾給予蘇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自由。但人們並不樂觀，歷史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國家爭取民主，絕非易事；多少仁人志士，為此貢獻了一生。海外的許多政治學家也都在探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才能實施民主。但是，當這些學者在試圖構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具體地推動民主進程時，他們忘記了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究竟能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

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兩大類別

縱觀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我們會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衆所周知，社會主義（註一）社會是指一個社會的生產資料是公有的，經濟運行是計劃的。除了社會主義外，現存的經濟制度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以市場機制做調節的。所以，我們可以把全世界的國家按經濟分為兩大類：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二、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同樣，我們也可以大致上把全世界的國家按政治體制分為兩大類：（一）民主政治（註二）的國家；（二）集權政治的國家（即不具備上述由法律保護的公民的基本權利）。那麼，當我們把所有的國家按這兩條政治和經濟的標準分類後，我們將看到什麼呢？

政治—經濟體制分類

	民主	集權
市場經濟 （私有制，不排除少量國有經濟成份）	所有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西歐、日本，……。	大多數不發達國家，包括南韓、智利、中國台灣（正在轉向民主），非洲的許多國家。
計劃經濟 （公有制，不排除少量私有成份）		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許不包括南斯拉夫或匈牙利。

在這個二乘二的表格中，有一個格是空的：在所有國家中，找不出一個國家是計劃經濟，而且同時又有民主政治。這絕不是巧合。我們應當重新考慮，是不是民主政治和公有制計劃經濟互不相容？

是的。經濟學家對此已有答案，只是他們的理論鮮為老百姓所知。本文的目的，是要不厭其煩地講這個道理。

民主、自由和經濟體制 有密切關係

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人類追求民主的過程（起源于西方國家），實際上是要達到自由（LIBERTY）的目的。民主是「對自由事業的奉獻」（「VOWED TO THE CAUSE OF LIBERTY」, BARKER, 1942）。十七世紀的立憲自由主義運動（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包括英國的光榮革命，并非直接要求民主，而是力圖保護人民的自由（LIBERTIES）不受專政的侵犯。只是到了後來，這個運動才開始有了民主的色彩。當時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意識是平民的意識（PLEBEIAN IDEOLOGY），這是一種自由民主思潮（LIBERAL DEMOCRACY）。歷史上的偉大的民主革命，例如美國的和法國的，都把自由——即天賦人權——做為目的，追求不可須臾沒有的人的基本權利：生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對當時的自由民主思想家（如洛克「LOCKE」）來說，第一是要自由，第二才是要民主。什麼是自由，怎樣才能達到自由呢？進一步細細研究，我們就會看出，自由與市場體制緊密相連

。個人自由（PERSONAL LIBERTY）意味着每個人有經營企業、進行貿易的自由（FREEDOM），有處置、保留經營和貿易獲取財富的自由，有不受強權勒索的自由。洛克認為，自由立憲國家的基石是財產所有權。國家的職能是而且僅是保護財產所有權和其他每個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而財產所有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又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因為如果人們不能擁有財產，那麼就根本不可能彼此交換財產。就連馬克思都認識到如果普通工人沒有最起码的自由（MINIMUM LIBERTY），他們就不能成為普通工人（因為他們會是農奴、佃戶）。

西方現今的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哲理之上的。這個民主制度，就是用來保護人們的自由（LIBERTIES）的：自由擁有財產權，自由經辦企業權，自由簽訂契約權，和自由選擇職業權。這個民主制度，就必然與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連在一起。正如MACPHERSON 所說：「自由國家的政府的職能，就是為資本主義市場提供條件。自由國家和市場社會兩者共同的本質，就是競爭，就是每一個有選擇自由的人憑自己的本事來進行的競爭。」人們要實現選擇職業的自由，一個社會就需要有勞動力市場，而不是政府分配工作；人們要實現旅行的自由，一個社會就要讓人們能隨便買車票、買汽車、買汽油，而不是由政府配給和發放通行證；人們要想實現讀書看報的自由，一個社會就要有各種各樣的書籍報刊出售，而政府就不能進行書報檢查。

澄清對西方自由的誤解

在這裏，有必要澄清一些對西方自由的誤解。

——「西方自由是假的。在美國，并非人人可以當總統」。是的，在美國，并非人人可以同時當總統，因為總統只有一位。但是，在美國，當一個人具備某些條件時（如生在美國的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去競選美國總統，還可以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候選人（條件是有足夠的錢，當然，還有其他條件），甚至當選。這些都是自由的，并非強迫的、或政府指派的。而這在集權國家，自由競選——即使一個人有錢——是根本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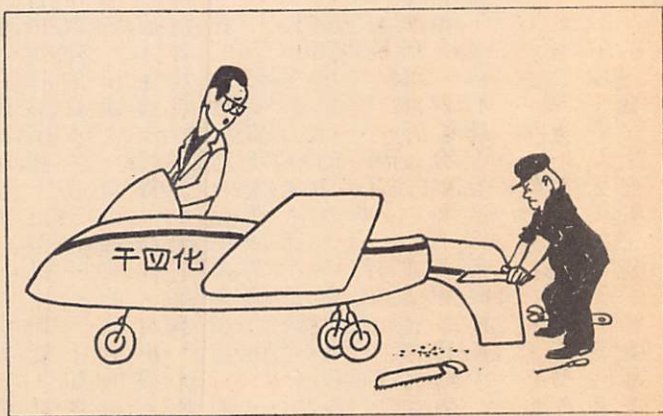
——「西方自由是窮人有餓死、失業的自由。」自由是一種權利，要實現這個權利，一個人需要具備一定條件，例如技能，體力，知識，金錢。每個人的素質不一樣，對自由這個權利的運用也就不一樣，自由競爭的結果也不一樣，這是合理的。如果一個一天縫十件衣服的工人和一個一天只縫一件的工人（他有縫十件的自由）得到同樣的工資，這種「平等」，難道合理嗎？在一個自由社會，每個人有居住在任何地方（城市或鄉村）的自由，但如果一個人沒有錢，那麼他就不能運用他的自由從一個地方如美國紐約搬到另一個地方，可是一旦他有了錢，那麼他就可以自由地搬到另一個地方，而不需要任何通行證、或轉戶口許可證；一個人若沒有適當的教育，那他就不能運用他的自由去做高級技術工作；可是，一旦他具備了必要的教育，他就可以到市場上公平競爭，自由地選擇他所喜歡的公司（當然，公司也可自由選擇是否僱他）。這種自由，比起理想的、隨心所欲的自由王國，確實是有限的。但比起現實中沒有這種自由的社會，要合理得多。

——「西方自由是只有資產階級的自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不對。西方自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反

對西方自由的人忘記了，恰恰是西方自由才使得馬克思的反對資本主義的著作得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版，使得這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的人能夠用馬克思主義（註三）做為武器。

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使民主、自由無法真正兌現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能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同時對消費品的私有制也進行了極大的限制。全民所有，當然不可能真正是由全體人民人人所有（若每個人都分得一份，那又是私有制的一個新起點）。在中國、蘇聯，以及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全民所有實際上成為國家所有，政府所有。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市場的基礎，整個經濟活動，也就不再由市場（價格）來調節了。全國的經濟活動，都要由國家來安排和計劃。什麼是「計劃」的根據呢？「計劃」的理論根據是：公有制消滅了自由競爭的盲目性，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知道全國需要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所以經濟應由國家來統一計劃。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比一般的私人企業家、一般的個體生產者都聰明的，政府要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轉做計劃，這樣經濟才能運轉得更好。這裏包含有兩層意思：第一，計劃是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經濟必須的。因為在國有制下，企業既不是工人的，也不是廠長的，誰的也不是，而是一個抽象的「國家」的。所以從工人到廠長都可以對經營好壞漠不關心。若政府不去儘力從計劃到生產、到銷售去監督、管理，那麼每個企業就會以極低的效率生產，工人會怠工，甚至整個企業的財產被工人們（和廠長一起）分光、拿光



你的尾巴應該改成這樣
——政治不實行現代化將如此「起飛」

；第二，為了使中央計劃得到有效地執行，就必須使全國人民相信中央的政策、理論是最正確的，計劃是最優秀的。因此，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一個龐大的宣傳機構。這個機構一方面宣傳黨的政策、計劃、理論的正確性，一方面進行嚴格的書報檢查，以達到全社會的「輿論一致」（毛澤東語）。這就沒有了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除此之外，還要有強有力的政治保障來推行這個計劃，這就需要強大的專政手段，中央必須有絕對的權威。從本質上講，這是和民主制度相對立的（民主是多數人的政府「GOVERNMENT BY MANY」，是討論的政府「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於是，政治自由就不存在了。

由此可見，民主的政治制度與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是不相容的。歷史上和當代世界上的國家證明了這樣的結合是沒有的。作者強調這一點，並不是說人們不應該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爭取民主。恰恰相反，作者是想告訴人們，在爭取民主時，不要忘記，民主政治的最終實現，是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上的。要爭取民主，就要發展私有制。西方的許多自由派的理論家，十分讚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等，認為這種平等，沒有階級、生產資料公有，是人類的理想境界，而私有制則是萬惡之源。這些理論家是不應被稱為自由派的，因為他們是在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最根本的出發點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沒有看到，按照他們的這種「自由」哲學走下去，恰恰會通到與自由完全相反的方向去。還有許多真正相信共產主義的理論家，包括大陸的一些改革派，也認為公有制是基本前提，在經濟上優于私有制的（本文不準備討論哪一種經濟更有效率）；他們認為如果有公有制，再加上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和民主，那麼社會主義就會戰勝資本主義。本文的討論，以及世界上現有的社會制度，已經表明，這是不可能的：民主不能在公有制下存在。講到這裏，恐怕還有人不相信這個道理，我們不妨先拋開理論，僅舉一兩個事實來看自由與私有制的關係：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由于擁護西方民主（民主本來就產生于西方）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被革職、調走。如果在中國除了公立大學，還有私立大學、私立機關，那麼方勵之可以去私立的大學當副校長（如果他夠格），那麼黨就沒有權力（至少不能那麼輕而易舉地）把他革職、調離。又如：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原來住所裏連電話都沒有，因為電話局是國家控制的，不給他

安電話。後來戈巴喬夫要和他通話，當局才趕緊給他家安電話。若在蘇聯有私立的電話公司，那麼薩哈羅夫就可以自己花錢安一部電話。在中國，還有許多人，一旦被撤職，原來分配給他們的房子也被收走了——因為一切都是黨的。在全民所有制的經濟下，黨簡直無所不管，無處不在，而個人因為沒有獨立的經濟力量，黨可以隨時剝奪一個人的所有東西，包括人本身。

在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下，真正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建立的。因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截然不同。計劃經濟的領導者認為，最優的計劃是找得着的，而且只有共產黨才是唯一能發現這個最正確的計劃的，從而黨是最正確的，當然也就不需要法律規則來約束黨，黨只能在法律之上；而在私有制經濟中，根據自由經濟的理論，一切經濟活動在市場中都是受「看不見的手」所指引的。由於現在經濟活動之複雜，任何人也不可能發現整個社會的最優計劃，整個社會在每個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中達到經濟增長。而民主政府則因為不可能發現最正確的計劃，就要「不斷地對公眾的各種偏好做出反應」(Dahl, 一九七一)。為了保障社會不混亂，保障市場的競爭公平進行，民主社會就需要有一系列法律保護公眾。在這個法律制度下，人人平等。政府也只是一個法人，不能例外。就好像運動場上一樣，一旦訂立了規則，每個運動員都要遵守，都要聽從裁判的評判。而裁判一定要獨立於運動員之外。假如有一個特殊的運動員，他可以身兼裁判，還可以隨時修改規則，那麼比賽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是可笑(有時是可悲)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政府就是兼裁判、修改規則、和運動員三者于一身的。

講到這裏，作者想起一九八五年普林斯頓報紙上的一條消息：一個警察攔截了一輛交通違章的車子，當他在給違章人開罰單之前，覺得違章人可疑，于是他忘記了開罰單，搜查了違章人的車子，發現血衣及機關槍——這人原來是一個殺人逃犯。於是警察把他抓到警察局。這時，這個警察犯了一條法律：不得隨意攔截并搜查行人車輛(假若這個警察以交通違章攔截了這輛車，應先給違章人罰單，然後再搜查，那他就不違法了)。由於這個警察的疏忽，使得這個罪犯不能被控起訴，最後警察局只好將他釋放。這是一個法律的嚴肅性的非常好的例子：一旦訂立了規則(法律)，任何人都要遵守，警察也不例外。這個罪犯被放掉了，肯定是對社會造成危害，可見法律的嚴肅性。寫到這裏，作者又想起幾年前在大陸讀到的相反的事例：某黨委書記在一份判決書上批示(黨委書記批准判決書本身就不法)「判此犯一年」時，由於大意，竟寫成「判此犯十年」。當執法人員來找他改正時，他竟說：「噢，爲了維護黨的聲望，不能隨便改，十年就十年吧。」

在公有制經濟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完全顛倒了。人民并不直接向政府納稅，政府在職工們領取工資之前就已經把稅金抽走了。這種非直接收稅的方式，把最基本的事實——人民(納稅人)養活國家——給扭曲了：好像是黨和政府正在養活人民。在這樣扭曲了的現象下，人民要不斷地感謝黨：是黨又撥款給人民蓋房子了，黨又給人民受教育的機會了。但是，人們仔細想一想，就會反問：黨是從哪裏來的錢？是人民、是納稅人，養活了黨和政府。但是，公有制下的間接稅制，使這個關係被顛倒了。人民不能批評黨和政府，無權過問自己納的稅是如何花掉的。而在私有制經濟下，政府的

稅收是在人們領到工資、分到紅利以後再直接從每個人手中抽取的。人民清楚地看到是他們自己養活了政府。所以人民可以理直氣壯地批評政府，并過問政府的政策和預算開支。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私有經濟制度的建立，確實是社會走向民主自由的必要條件。當然，并非有了私有經濟制度就必然有民主自由。但是，民主自由確實是離不開私有的市場經濟的。這對許多堅信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是一個痛苦的事實(如果承認這個事實的話)。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說服社會主義的改革家們，私有制并非萬惡之源，并不可怕。近幾年來，中國的領導人不是一再說要「向資本主義借鑑」嗎？那麼最應該「借鑑」的，就是私有制度和市場經濟。我們當然不會期望中國一夜之間建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我們應當向這個方向去努力。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改革，少量的私有制經濟已經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這些新興的私有經濟，在作者看來，是改革的希望，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精髓，也是將來中國民主自由的希望。

註：或叫做共產主義社會，因為西方有時稱資本主義福利(Welfare)政策爲「社會主義」。本文所指的不是這種假「社會主義」。

註：這裏是指廣義的民主，是從十七、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開始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其實質是由法律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結社、言論自由；選舉權；被選舉權、政治家爭取選票、爭取贊助的權利；自由、公平的選舉；選民對政府政策的影響權；和多元的信息來源的權利。

註：作者并不反對把馬克思的學說當做思想史中的一個學派來研究；但作者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強迫一個國家的人民必須信奉的政治信條。

關於中國革命

(中國大陸留學生 · 加拿大) 楊基英

由於歷史的誤會，「革命」一詞今天已引起人們的恐慌。從俄國共產黨的殘暴清洗到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從伊朗人的宗教瘋狂到恐怖份子的劫持飛機，「革命」一詞之被濫用已遠超過了「自由」一詞之被濫用。本文的目的，在於為今日的中國革命進行辯解。

一、定義與反對意見

(一) 革命的意義

「革命」是一種推翻專制制度、建立自由社會的群體行動。革命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徵：即暴力性和暫時性。「暴力」指的是在推翻專制政權的過程中，和在推翻這種政權之後建立的臨時政府執政過程中，用暴力對抗專制制度擁護者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暫時」指的是在上述臨時政府執政結束後，即一個自由社會的構架形成後，「革命」即宣告結束。

對「革命」的定義的進一步說明如下：首先，「專制制度」指的是諸如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其特徵是由一人或一群人（中共領導人）管理整個社會。在政治上，表現為這群人總是當權，總是在那裡發號施令，制定「法律」，鎮壓異己，做人民的主人。在經濟上表現為這群人掌握國民經濟命脈，全社會的經濟生活聽命於這群人的指揮調度。在文化教育上，表現為這群人壟斷所有的宣傳、藝術、教育工具、社會的精神生活只有透過這群人的喜怒哀樂才能得到反映。

「自由社會」與專制制度正相反。自由社會的本質是人人管理自己，而且僅僅管自己——當然在今日的世界上未必能找到或實現這樣純自由的社會。在政治上自由社會表現為執政

者由公民普選，短期輪換，且政治權力對經濟、文化等其它生活領域的關係是協調引導而不是壓迫管制。在經濟上自由社會表現為人人管自己，經濟是個人之事。每個人的求職、生產、致富、破產，首先也主要由每個人自己負責，而不是由其他什麼人管制。在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自由社會是個人負責，個人表現，無人統治，偶爾協調。

關於推翻專制制度後建立的臨時政府，它的職能是建立上述自由社會的構架，和壓制專制制度擁護者的暴力反抗。它的存在期限將不超過五至十年——超過特定期限的臨時政府將變為新的專制政權。

本文意在駁辯一些對革命的反對意見。

(二) 反對意見一：

革命導致動亂流血

首先，這是對革命定義的「暴力性」的誤解。推翻專制制度的革命暴力可以有多種不同形式，例如兩軍集結式的長期武裝對抗，速戰速決式的城市起義、非律賓式的「微笑革命」等等。每種形式都可能引起或不引起動亂、流血。而理想的革命暴力是以強大的實力壓迫專制主義者放棄政權，並從此少以暴力反抗。這能否在中國實現，關鍵在於革命者的智慧和能力，大概也有歷史時機的偶合。但不管怎樣說，革命並不一定導致動亂與流血。如果中國過去的革命給人留下了動亂與流血的記憶，那並不能證明中國將來的革命也一定要走那條痛苦（而且是未成功）的老路。

其次，自由要有代價。如果說用革命獲取自由要打破專制制度下的某種安寧的話，中國人應當有為自由付出代價的勇氣。也可能今天的中國人還不願付此代價，但誰能說中國人永

遠不願意呢？中國人不是為推翻罪惡的專制皇朝付出過「動亂與流血」的代價嗎？做為辛亥革命的子孫，這一代中國人不會永遠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偷安。

(三) 反對意見二： 革命不文明

專制不文明。革命即在於推翻不文明的專制，建立文明的自由社會。對革命的這種宗教勸誨式的指責缺乏現世意義。在中國的歷史上與將來的發展中，不實行革命而靠其它手段改變專制社會為自由社會，將永遠是一個不現實的幻想。革命是現實主義者的行動選擇。革命者追求的，首先是目標的實現而不是教義的完美。可以預料，對中國革命的道義指責在將來的自由社會中仍會長期存在。而由於總有人在責備革命不文明，反倒可以使中國的革命者行動自律，避免過火和偏激。

(四) 革命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革命。歷史上的革命不成功不應做為否定未來革命的理由。本世紀初的中國辛亥革命不能說是成功的革命（但也並非完全失敗），但由此沒有必要認為中國從此再也不需要革命。有一種描述中國歷史發展的公式，叫做「專制——革命——專制」，進一步的解釋說這是「惡性循環」。其實如果是一場成功的革命，則專制就將不再出現。上述所謂惡性循環中的革命，應是一種未成功的革命，因而專制在革命失敗之後得以繼續，甚至加強。譬如，中共領導集團對人民群眾精神生活的愚弄與控制，創中國甚至世界專制史之先例。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曾經有過辛亥

革命。革命失敗後的專制並不是革命造成的。相反，革命打斷了專制制度的穩定與持續。從這一點看，革命總比沉默地忍受專制要好。因為即使是失敗了的革命，也為將來的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正像當年的辛亥革命對今日將興起的中國革命的影響那樣。而這場新的中國革命的效果，將為在中國徹底埋葬專制制度，為歷史的發展寫下「專制——革命——自由」的新的一頁。

(五) 革命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

革命的發生沒有必要等待多數人的支持。中國革命可以在具有一定數量的革命者、革命組織和一定時間的準備、醞釀之後發生，它沒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在發生之前就得到大多數（或僅僅是半數）中國百姓的明確支持。革命在發生之後要能夠推翻專制政權、建立自由社會構架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百姓的態度。但只要多數百姓沒有強烈的反對，只要社會上存在着廣泛的同情或僅僅是默認，則由少數革命者發動的革命就可以認為是贏得了民心。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環境裡，說「多數」，說「廣泛」其實都很難具有準確的含義。比較準確的考慮，應該是計算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而將此之外的廣大百姓應劃歸為於中立狀態。這在革命的初期階段，即推翻專制政權的階段，尤應如此。當然在革命的全過程中，革命者應當努力爭取多數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沒有必要因為這種支持沒有達到數量上的一半，即否定革命。

二、歷史的意義



革命軍的南京挺進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合影（前排左四為孫中山）



中國歷史上只有過一次革命，即本世紀初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在於它徹底否定了帝王家族的專制形式，從此中國不再有皇帝，而叫共和國。辛亥革命的不成功，表現在臨時政府的不成功。袁世凱之流本應是革命埋葬的對象，却陰錯陽差地接管了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從此由號稱「總統」或「主席」的專制主義者統治中國。今日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集團，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個革命的組織（這不排除存在抱有革命理想的個別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要推翻舊政權，不是因為舊政權是專制政府，不是因為要建立自由社會，而是因為中共領導人要建立自己的專制政權。中共執政後，基本沿襲了中國歷代專制政權對百姓的壓迫、統治和愚弄，同時還在許多方面有所「創造性的發展」。譬如，對百姓經濟自主權利的剝奪和對知識份子的徹底摧殘。中共從來沒有認為他們的政權是有「臨時性」的。相反，他們爲了共產黨專制的「江山萬代紅」，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清洗、鎮壓與拚殺（最新的幾幕是圍繞着「四個堅持」展開的）。而他們所謂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與其說是理想，不如說是專制達到頂端時的現實。

中國即將來臨的第二次革命，將具有歷史轉折點的意義，即它將扭轉中國歷史數千年來不斷專制的趨勢，使其走向自由民主的一條新道路。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成功，還將在世界歷史上開創先例，即推翻專制獨裁的共產黨政權、建立自由社會的先例。共產黨奪權執政在世界上一是一歷史現實，但它在中國遇到了強烈的反感，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反感。由於中華民族的人口衆多與幅員廣大，中國革命的成功對整個

世界的形勢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一個可以預料的現象是，推翻專制後建立的自由中國社會，將不會輕易加入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雖然自由中國社會將會比較自然地視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爲朋友，她也沒有必要視蘇聯和它的「社會主義」盟國爲敵人。當前的中共政策雖然真真假假地在玩弄着游離於兩大陣營之外的把戲，與蘇聯及盟國重新結盟一直是一種強烈的傾向。只有在不是由一小撮專制統治者主宰社會命運的自由社會，衆多不同利益的妥協與抗衡才可以使中華民族真正地、持久地「不結盟」。

二、革命與改良

不革命而以和平方式改變專制制度爲自由社會叫做改良。

(一) 革命優於改良

首先，革命依靠暴力，因此時間短促（相對來講）。改良需要說服請求，因而緩慢長期。如果在專制制度下生活是一種享受，那麼當然改良爲上策，甚至不改良（更不革命）都可以。問題是中國的專制制度使人生活痛苦，生活痛苦才尋求革命、尋求改良。因此，從行動產生效果看，革命見效快，革命優於改良。如果有人認爲革命過程比改良過程痛苦，或是革命效果不如改良效果等等，則本文第一節已從革命的角度做過論述，在此從改良的角度再加以說明。

改良很痛苦。以中共執政幾十年的歷史爲例，事實是凡有人一提及和平改變中共的制度，中共的暴力鎮壓就接踵而來。爲此而被殺被捕

、被批鬥、被折磨的許許多多中國人，以及這些人的家屬親人或朋友，他們的痛苦就是在中國進行和平改良帶來的痛苦。在這類鎮壓事例仍然不斷發生的今天，中國人不應該忘記這種痛苦。

改良沒有效果。縱觀中共專制幾十年，到底有哪一條改良專制制度的建議曾被他們採納過呢？更不要提全面改變這一專制制度的性質了。對於那些帶根本性質的改變，例如，開放黨禁，幻想共產黨會實行全民普選簡直過於天真。如果改良主義者認爲歷史不足爲訓，今後的改良將會在中共的專制社會產生效果，那麼當然只有等時間才能做最後的裁決。但起碼時至今日，還未曾看到中共政權有接受和平改良的傾向，也未看到改良主義者有保證改良成功的有效手段。

其次，革命的成功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即革命者的能力、智慧、勇氣等等，專制政權是被當作敵人來對待的。革命的敵人是否願意順從革命，一般是不必花時間精力去考慮的。而改良則不然。改良也要依靠改良者的能力、智慧和勇氣，但專制政權到底是敵人還是其它什麼不明瞭。更重要的是，改良是需要專制政權的配合的，即改良的成功（如果可能）有專制政權同意的因素在內。這使改良的成功可能大大低於革命成功的可能。中國的專制制度存在發展了幾千年，其最高統治層的規模是在不斷擴大的，由過去的一人、一家到今天的「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或許還要加上「人大常委會」之類。一群人的專制應比一個人的專制更難和平改變。戊戌變法的組織者還有可能說服一個光緒皇帝，勉強實行了百日維新。今天的改良者即使真能說服一個鄧主席、趙書記，一個主席、一個書記的號令，也未必能像

皇帝的聖旨那樣神通廣大。

(二) 革命不排斥改良

首先，革命與改良的最終目標基本相同，即徹底改變專制制度與建立一個自由社會。革命與改良的不同主要在於實現目標的方法不同。革命是暴力，改良是和平。

其次，革命的過程中不排除採取改良的行動和口號。即使在推翻專制政權的革命階段，請願、簽名、示威、談判等和平手段也可以在

假革命并送了中國的民主前途



某些場合成爲革命政黨策略的一部份。而在推翻專制政權後的臨時政府執政階段，只要專制主義者不以暴力反抗，和平改良顯然是更可行的過渡政策。

再次，改良的行動對革命是有促進作用的。每一次專制政權對和平改良的暴力鎮壓，都會把更多的人推向革命的道路。此外由於改良與革命目標基本一致，改良的口號與行動對喚醒人民大眾認清專制政權的罪惡，從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着巨大的作用。

(三) 革命者與改良派

革命者與改良派不是敵人。在多數情況下，兩者朋友或同志。在革命結束之前，革命者與改良派的聯合、互相轉化是一種自然現象。一般地來說，革命者往往由改良派轉變而來。改良不成而求革命。當然相反的轉變也不是不可能。隨着反專制自由的歷史進程的展開，越來越多的人們將從改良轉向革命，這是一個可以預料的發展趨勢。而在革命結束之後，即在一個自由社會中，革命者與改良派的歷史意義將消失，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將會有新的轉化與組合。

在中國當前的形勢下，還有一種既非革命、又非改良的「改革派」。「改革派」所尋求的，是改變中共執政的某些策略，例如開放言路、黨政分離、引進市場機制等等，而對中共政權的整體不持否定態度。這些「改革派」雖然難以被看作革命的直接友人（他們當中的當權者對革命或改良是用暴力鎮壓的），但也有一種潛在的改良趨向。即當人們認識到專制政權有改變的必要時，從要求改變個別方面過渡到要求改變整個制度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對

一整代成長在中共專制制度下的中年、青年人來說，從要求改革轉向要求改良再轉向要求革命，似乎也是一條合理的認識發展道路。

四、成功的條件

(一) 革命的政黨

這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根本條件。沒有一個或幾個成熟的革命政黨的長期活動，革命難以爆發，爆發了也不易推翻專制政權，推翻了專制政權也不一定能夠過渡到自由社會。

一個成熟的革命政黨起碼應具有如下的特徵：

- (1) 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理論，首先是關於在中國進行革命的綱領和理論；
- (2) 有相當數量的基層組織和黨員群眾；
- (3) 有嚴格的組織原則與活動紀律；
- (4) 有在中國大陸開展活動的牢固基地；
- (5) 有有效的宣傳手段（廣播、印刷、出版等等）；
- (6) 有與專制政權進行暴力對抗的充分準備和力量；
- (7) 有與其它革命或改良政黨、組織聯合行動的誠意和能力；
- (8) 有在推翻專制政權後立即建立臨時政府的準備和能力；
- (9) 有在革命完成後以一個普通政黨存在於自由社會的願望和準備。

中國專制社會的現況決定了任何革命政黨必須處於非公開活動狀態（至少在大陸是如此）。這意味着革命政黨與專制政權的暴力對抗從一開始就難以避免。革命政黨，它的所有成

員對此應有特別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準備。

(二) 歷史的時機

今後的三、五十年內，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將經歷一個由第一代創始人向第二代接班人過渡的時期。接替第一代共產黨人掌管專制政權的，將是一代有技術、有學識的官僚階層。而在他們手下的中國專制社會，也將逐步走上制度化、規範化的道路。這新一代技術官僚專制主義者所關心的，將主要是專制制度的工作效率、產品數量質量、勞動紀律、對外貿易等等，即一個專制社會賴以鞏固發展的物質基礎。而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衝擊和對傳統共產主義專制原則的堅持將趨於減少。在鎮壓反專制主義者的活動方面，也將採取講效果、較文明、較含蓄的現代化手段。在這兩代專制統治者轉接權力的過渡時期，是中國社會發生革命的良好時機。因為在這一時期，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爭吵惡鬥將加劇，人民群眾對這一政權的不理解與不耐煩情緒也將激增。中國的革命者如果不能在專制政權的這一相對脆弱時期推翻它，則將再等待許多漫長的年代，才可能遇到另一個類似的時機。中國歷代專制政權都以在初創與鼎盛過後為衰弱時期，中共政權似乎也例外：它如果不在這動盪的初建時期被推翻，便會進入一個平穩的成熟發展階段。當然那將使任何革命或是改良面臨更為巨大的困難。

(三) 爆發的方式

辛亥革命時期的武昌起義帶有相當的偶然性與孤立性，它不是一種理想的爆發方式。由革命政黨做好周密的準備與安排，在中國大陸

各重要地點同時、全面地爆發革命，將使動亂與流血極少或不發生，將迫使共產黨政權少做垂死的反抗，將使臨時政府迅速地建立。中國革命能否經由這種較理想的方式爆發，對於革命的成功將有決定性的影響。

(四) 革命者的理智

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本文只能舉例來說明。

回顧本世紀初推翻帝制前後的歷史，當時的革命青年激情洋溢。作文章者有如鄭容的「革命軍」，行動者有如陳天華的蹈海赴國難。然而在組織革命政黨、規劃新社會方向，準備發動革命，建立臨時政府等重大革命實踐問題上，則處處表現出中華民族以自由對抗專制時的幼稚與不成熟。在思想理論方面，人們也往往以偏激的態度盲目追求所謂「救國救民」的「真理」。

革命者的理智問題，首先是指觀察事物應全面客觀、避免偏激。革命是要波動激情的。但激情不應做為革命的持久動力。譬如說共產黨專制獨裁，但也不是一無是處；說民主自由美好光明，但也並非沒有缺點短處，包括相對於專制社會的短處。再如說革命需要暴力，但並不是說凡對抗共產黨的暴力都十分合理，等等。充滿激情者（往往是青年）應注意理智的培養，不具激情者同樣可以革命。

革命者的理智問題，還指的是在革命實踐中要冷靜老練、注重實際，不抱幻想。例如在與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對抗中，要時刻做好以暴抗暴的準備，不應有僥倖和平的心理；在號召民眾奮起反專制的過程中，重質量而不必追求規模，不必去幻想，「振臂一呼，萬眾響應」

之類；在政黨活動中，嚴守紀律，保密防捕（防被中共政權綁架逮捕），絕不要天真地拿西方議會民主政治的標準套中國專制社會的現實，等等。

革命者的理智問題，還表現在對待理論的態度上。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定要避免第一次革命前後人們對待理論的幼稚態度。沒有任何一種革命理論，無論是現存的還是待發明的，可以做為解釋或預言革命的唯一真理。而各種反對革命的理論，也不一定都是荒謬絕倫。中國的革命者在理論上要解釋革命的合理、專制的反動、革命的暫時、自由社會的前景等一系列問題，但又不必強求解釋的完美無缺，更不必單以理論基礎的不同划分革命的敵、友。

最後，革命者的理智問題，也表現在對於中國革命民族意義的認識。中國革命的發生與成功與否，不必依賴外國勢力的表態支持。這不僅是因為外國勢力首先考慮的將是本民族而非中華民族的利益，而且因為中國人民有一種自尊自重的傳統情緒。中國共產黨既曾愚蠢地誇大了這種情緒，也曾為這種情緒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中國的革命者應該懂得利用這種歷史的遺產。

五、結論

中國的第一次革命，在勉強推翻帝制後便走向失敗，是一個歷史的悲劇。而在從今算起的三、五十年內，中國將發生第二次革命。導演和參加這場革命的，是成長在共產黨專制制度下的一代青年。中國要麼在革命勝利中迎來自由民主、繁榮富強的新生，要麼在革命失敗後繼續五千年來人盡皆知的老路。中國的命運如何，決定於這一代青年的行動。

從歐共談中國、台灣與世界

(台灣旅美學老) 楊雲

最近在「中國之春」七月號上讀到「歐洲共運和中國民運」一文，以下簡稱「歐文」，覺得很重要，應該更深更廣地來討論這個問題。

「中春」過去幾年來在鼓吹、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方面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近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局變化很大，對於中國未來政治與經濟走向這個大問題，「中春」應逐漸重視這方面的理論性探討。

本文的目的在於討論中共目前的一般情形，歐共思想的激發與檢討，也簡略談談台灣長久受壓抑近年來稍稍抬頭的社會主義思潮，最後對世界性工業化的問題，也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對中國當前情況的幾點看法

鄧小平復出後推展政治經濟改革，起初確有模仿東歐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的傾向，以後逐漸轉向，起伏也比較大，直到鄧小平說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有許多迥異於其它國家的特點與問題，單純的模仿是無法成功的。

十年以來，中國出現以下幾個現象：
一、農村基本上比較活躍，一般來說生活

水平比「四人幫」時期好了很多，雖然在世界性的層次看來，仍然是屬於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二、城市改革則舉步艱難，農村的問題一時之間還主要是解決吃飯問題，有了自己的可耕地，有的還可以買得起拖拉機，有的甚至從事農業運輸，賺了些錢，大體來說，農民們有了發展的空間而較易滿足當前的情形。但是城市改革就衝擊到意識型態，並引起幹部權力鬥爭、社會風氣腐化等等一系列尖銳問題。可以這麼說，這幾年的城市改革政策是要完全否定過去幾十年來中共的作法，而實際上起了動搖中共體制的的作用。

三、國內出現不少嚴肅的經濟理論工作者，但是由於中共過去搞極左的一套，有關正統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十分空泛貧乏。在對歐美、日本開放以後，不可避免地一些在資本主義國家長久使用的經濟運作方法被提出來，有的則在實踐中，提的太早、太急躁，引起紛爭。具體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經濟體系才算社會主義？如果簡單地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那麼還有「所有權」等更複雜的問題，若再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則相信大部分中共的理論家都不能贊成，因為這是一條在世界各地都證明走不通的路子。這個問題也不光是中國目前問

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長久面臨這個抉擇，實在說來，完全的計劃經濟與放任的資本主義都是絕路，當然，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個政治問題。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運作會越來越倚重於新的理論學家們，教條式的經濟作法遲早要被放棄掉。

四、經濟改革由於龐大沉重的官僚體系束縛而困難重重，政治改革的提出，起初只是試圖提高效率，簡化手續，明確法令，杜絕貪污等等行政改革。後來進一步發現，要淘汰大批素質低下的幹部以落實新政策，仍然要觸及體制問題。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極為困難的，每一個國家都如此。真正的推動力量，往往被誤解為幾個英雄式的領導人，但實際上是來自社會的壓力與需要。一般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往往將重點放在所謂的改革派身上，而沒有重視到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真實情形，這不但是倒果為因，而且使改革的困難增大。

五、在中共摸著石頭過河進行改革時，文藝界出現一九四九年以來最興盛的局面，大量文藝作品以小說、詩歌、電影、話劇、繪畫等方式，對四十年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進行反思，人們不免驚呼，原來中國目前普遍存在這樣深重的問題。一個時代的文藝總是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再進一步發展，總是代表了一

個時代人們的心理狀態。當前中國的文藝作品可以看到中國要改變，不是誰的意志、誰領導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要求，而這個要求改變的浪潮將會越來越高。

六、年輕的一代，尚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文革後開始沉思，漸漸覺醒這樣下去，中華民族在生活、藝術與科學方面，有長久淪於世界最低地位之可能，起而要求人民自己作主，不能事事受政府的支配。要求言論、思想、工作自由的呼聲日漸提高。目前不僅在中國大陸、全世界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理解到中國需要民主，而有逐漸團結的趨向。

七、與此同時，另一股更深的寒流在神州大地蔓延，那就是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的虛無主義，完全否定一切。尤其是去年十二月學運被鎮壓以後，大學生們更加失望了，轉向追求享樂，只顧眼前，不管將來。許多優秀的藝術工作者、科學家流向西方後，滯留不歸。現在在中國講愛國、救國、救民族，簡直引不起一般人的興趣，許多年輕人感覺上，尤其和西方國家比，是中國沒救了，整個民族也沒有前途了。這種民族與文化的虛無主義，由上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由下，則是中共所推行的制度與不斷的政治鬭爭所造成的。要改變過來，談何容易？所以說，中國當前的重大問題，不僅是政治經濟改革問題，這只是其中的一環，重要的還有整個民族與文化復興的更深刻的問題。

「歐共」對中國當前情形的啓發

中國到底該怎麼辦？「歐文」雖未點出，但是仍可以理解，「歐共」努力的方向對中國的現狀有啓發性，比較實際。

「歐共」的主張是什麼呢？

「社會主義的前進和建設必須建立在經濟、社會、政治的連續民主化範圍之內，並且保障一切人身自由，以及言論、思想、出版、遊行的種種自由，肯定多黨民主制，強調世界性社會主義的多元化。」

必須承認，「歐共」在馬克斯列寧主義於世界各地實際運作的結果，反省與實踐出這樣的理念是值得讚揚的，在和平、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信條下，理應肯定「歐共」有他們可以發展的空間。而中國從「東歐模式」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今天有人研究「西歐共產黨」的經驗，這無疑是一條歷史上可行的軌跡。然而，問題也不這麼簡單，還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具體而言，實際上，「歐共」本身的前景也不樂觀，西方各國的工人，尤其是馬克斯、恩格斯當年眼中受資本家壓榨，毫無保障的工人，人數一直下降，越來越周全的福利政策使得工人聯合起來支持社會主義革命並不實際。目前西歐許多企業的職工一年可以享受一個月以上的假，平常一週上班五天，休假或週末可以去度假、去滑雪、去游泳，要他們來理解資本主義的「腐敗」與「危機」，相當困難。加上蘇聯的霸權主義、中共的「文革」、東共的殘忍、越共的好戰、古巴、北朝鮮的輸出革命、東歐國家內部不斷發生的反抗運動，還有一群打著馬克斯主義旗號的恐怖份子，實在使人懷疑馬克斯主義的理想性與實踐性。

二、法國左派上台執政，反而使法國經濟趨於困難，近來法國普選，法共得票率慘跌，意共情形相仿，西共更是一蹶不振，這些現象說明，馬克斯主義在作為政治與社會性的批判與反對力量時，是有其地位的，但是要成為民

主社會中的政治主流，則有困難。當然，馬克斯主義者可能辯解說，所以要專政，這又回到問題的另一方面，即馬克斯主義與民主制度並容的問題。

三、「歐共」受困於馬克斯主義的經濟理論，雖然逐漸放棄列寧、斯大林主義，仍然無法有效地管理國家。主要是，現今大家瞭解到，在馬克斯哲學體系中，有關人道主義部份十分突出，對人類思想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他與恩格斯在經濟方面的共同研究，就是在十九世紀的當時也是非科學的。它除了激起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心理外，沒有別的作用。於是國家經濟制度只能在空想的共產主義上由革命成功的職業革命家們去自行想辦法了。

「歐共」從歷史的實踐中勇敢地走出來，放棄階級鬥爭、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却不能再放，因為再放就不能稱做馬克斯主義者了。而中共在走上改革這條路時，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雖然實用主義終將征服教條主義，但是實用主義因為有觀點散漫的危險，而且在實踐過程中必然發生失誤，於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和教條主義者合一便會得到一時的勝利，而使政治運作發生週期性的起伏。當這種起伏過於頻繁時，一切的進展便趨於緩慢，甚至有倒退的時候。

四、「歐共」處於工業力量強大、人文主義精神濃厚的西歐，這些執着馬克斯主義人類理想的共產主義者受到民主制度的保護，學習與實踐民主制度，他們用的是支持他們的選民，而非紅軍與公安部。而東方馬克斯主義的中國，却顛倒過來，社會生產力薄弱，原本中國文化中優秀的人文精神從五四起到文革便被摧毀殆盡，支持中共的是強大的紅軍與公安部，而非選民。歷史的道路無法顛倒，中共要走向

「歐共」，或中國民間再產生類似「歐共」的政黨，都十分困難。因為，一個基本的基礎是大家都不相信、遵守民主制度，與這個制度的內涵——把人當人的人文、人道精神，中國目前這兩者都缺。要把民主制度與人文、人道精神在中國建立起來，便是今後所有關心中國事務的人們的一個重大目標，而這，就超越了意識型態的問題。

五、過去幾年的普選中，「歐共」失去的席位許多由社會民主黨派得去，這是一個重要的跡象。以前社會主義者以馬克斯主義為綱，以工人階級為人類歷史主流，以唯物主義解釋社會發展的現象，已經證明它的狹隘性與必然帶來社會發展困難，甚至大大小小的災難；而且在大部份奪得政權後實行專政的馬克斯主義國家中，所有其它不同看法的社會主義派別都被排擠、鎮壓，冠以叛徒、托派、修正主義的罪名，有的下場之慘甚至超過資產階級花瓶黨派。

根據這種經驗的反思，代之而起的是廣義的社會主義，仍然不贊成資本主義的基本方式，但將社會上大部份階層的人當做對象（事實上，每一個人既有其階級性，亦有其無階級性與超階級性的部份），肯定民主制度運作，反對暴力，呼籲和平，注意生態平衡、環境保護，婦女與少數民族的問題，注意低收入者的福利，而不僅是工人階級而已。德國的綠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社會意識濃厚，以人道主義、自然主義為基礎的政黨是總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經驗的政治團體，是前景樂觀的；馬克斯思想中的人道主義，要求把人從沉重的物質鎖鍊中解放出來的偉大思想，在這樣注重人類生活本質、品質的普遍與細緻實踐下，尚有一部份可以完成的可能。

六、雖然如前所述，中國當前要產生類似「歐共」的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很低，但從長期看來，山不轉路轉，歷史走到盡頭成長久停滯便會自行轉化，我們應有超越性的看法。

一個不拘泥於意識型態的社會民主政黨，結合中國過去的經驗，參考各國實行不同制度的結果，一般的主張是要保障私有產權，鼓勵人民自動積極生產，同時避免資本主義過度擴張，注意環境生態、社會公正問題，肯定民主、尊重人權、保存中國文化中優秀的部份，進而開創一個新的、有生命力的中國文化，將會在可見的未來於中國有相當的吸引力。一個完全謀求生產效率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當前的格局下產生不但更為困難，也不實際。現今許多人才都可以為促成這個政治團體而努力，如方勵之、王若望、王若水、劉賓雁、吳祖光、魏京生、王希哲、嚴家其、劉再復、蘇紹智等，以及國內一大批嚴肅工作的理論家、改革家、青年民主派等等，海外的、香港的、台灣的民主黨派，都是最佳人選，當然整合這批精英有客觀困難，然就純理論而言，是值得探討的。

台灣的一般情形

現在來稍稍談談台灣的情形，國民黨宣佈解嚴，黨禁、報禁即將開放，並且開放大陸探親、觀光等一系列作法，使台灣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並且一切跡象顯示台灣將要開展出一個新的局面，這一切當然不能抹煞黨外與民進黨的貢獻。目前民進黨少數人鼓動「不斷運動」，在短期內掀起一股社會上不安與緊張氣氛，也一時引起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對立，而且解嚴以後，台灣內部發生一些無政府主義的現象。相信這些都是過渡時期，總的

來說，台灣社會還是在穩定的條件下往民主制度發展。目前民進黨的內爭已經表面化，各股人員不斷角力，這是正常的，但是除了向國民黨爭民主、解決台灣長久的老問題，進而打擊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合法性，如中央民意代表、地方自治等外，民進黨今後的政策主張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一是自決，一是政治理念。「自決」的主張使民進黨陷入極大的壓力，終極來說，自決是走向獨立的前一階段，民進黨與海外台獨均不否認這種可能，這使民進黨終將收縮為一個純台灣地區、純台灣省籍、甚至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的政黨，就道理上來說，

台灣民進黨「一大」召開



也並無不可，可是在目前中國海峽兩岸的大格局下，會使這個政黨產生更偏激的性格，並且使反對民進黨的其他人士，未必都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也會產生偏激的對應。第二個是政治理念，訴求民衆的定義問題，民進黨領導人大體上是知識份子，而選票來自中下階層，黨內各勢力的背景不少是實力穩固的中小型企業，於是在政治上既要照顧台灣經濟發展中最大的得利者——中小企業與地主，又要開發廣大農的票源，比重的劃分便成激烈的鬭爭，由是王義雄要另組「工黨」。值得注意的，支持「工黨」的一部份人士中，有一向有社會主義理念傾向的「夏潮系統」，筆者於是要談談這兩年來台灣社會主義思潮的發展情形。

正當大陸上不少人爭著做生意發財的同時，由於國民黨的寬鬆，新左派的理論逐漸流行，讀者如果有興趣、有機會，可以看看台灣這一兩年來的幾份前衛性雜誌，如「當代」、「文星」，一方面對自由主義大師章伯的興起再度進行討論，另一方面對於新左翼，如法蘭克福學派、馬庫色、盧卡其等的思想詳加介紹，並且對六〇年代世界性左的思潮進行補課，當年海外保釣份子也現身說法。其它一些重視社會意識的雜誌，如「人間」、「海峽」、「南方」，則從事社會公正的實際發掘與理論探討。

一些年輕思想家們尚未宣稱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所顧忌的一方面是國民黨既定的反共政策。雖然，事實上，目前廣義的社會主義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卡斯楚、金日成等封建法西斯社會主義更爲抗拒；另一方面，則是中共這幾十年來搞的太差，却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台灣這些有著社會主義觀點的人們，如果簡單的承認他們的看法，肯定會陷入有理想

不清的局面，在前幾年則會有牢獄之災。

國民黨受到這樣多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成立了勞工署，以重新檢定勞工政策，一方面也趕緊成立了討論經年的環保署，由思想開放的航空博士簡又新任第一任署長。民進黨則連忙宣稱他們十分關心勞工的生活，動員中常委勸王義雄歸隊，一下子勞工成了政治爭取的資本。這是有客觀需要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很成功，若非民生主義尚有抑制的作用，結果可能更爲膨脹，可見中國人在經商方面確有長處。可是社會在短期內過度富庶繁榮，造成許多棘手的社會問題，如嚴重的環境污染、色情氾濫、交通紊亂、拜金主義盛行、公共道德淪喪、鄉村人口無節制流入都市、退伍軍人生活困難、山地原住民文化崩解、犯罪率日昇等等，許多辛苦工作的勞工、農民、漁民、軍人、公務員、教員、小職員等並沒有實際上得到社會富庶後應有的利益，大部份利益回到大資本家、中小型企業商人、地主、高級經理人員、少數高幹子弟、及一些投機份子的手中。以社會整體成本計算，中低收入的人民在環境日趨惡劣的情況下，經濟起飛並未使他們受到實質上太多好處，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生活有問題，而是吃的太好，穿的也不錯之餘，生活品質的提高有限。

然而台灣社會雖有諸多問題，却不能用簡單的階級分析、用團結工人鬭爭的共產黨的老辦法解決，而要用民主的程序去做有益社會大眾的立法工作，可以發起反污染、反色情、反貪污、及一黨專政等等社會運動，當然也可以將有志於此類工作的人們集中起來組織政黨，以充份表達他們的理想。

同時也必須談到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的確眼光遠大，以前在學校讀三民主義總覺教條

，現在看來，在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截然不同的體系時，民生主義頗有優越性。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雖然有效，但是主要建立在整體社會富有的基礎上，沒有聽說窮國可以實行有效的福利政策的，國民黨將大企業收歸國有，其它開放民營，政府則徵收營業稅。總的來說，今日台灣有錢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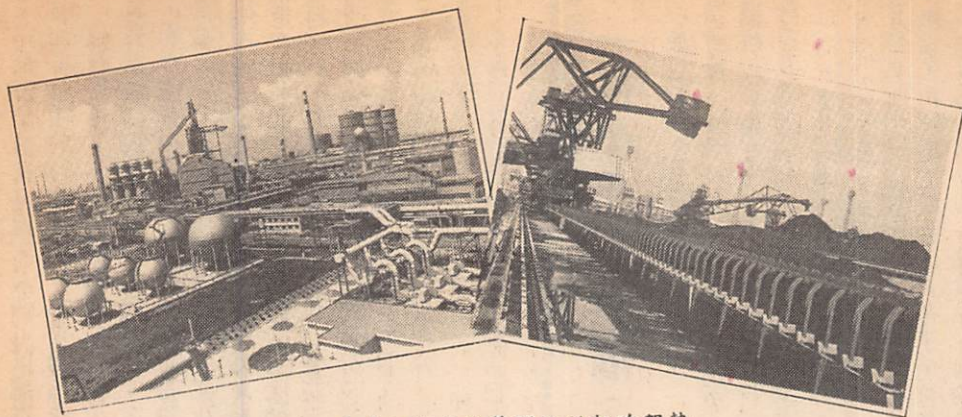
形式上，「歐共」的政策和三民主義十分相像，但是在最基本的原則上仍然不同，孫中山先生顯然不同意經濟發展和平均分配可以用強制的手段達成。然而從世界性的層次來看，理論上民生主義仍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雖然國民黨在執行「平均地權」與「征收累進稅」方面一直不成功。

世界性工業化問題 以及社會自治

今日世上的國家，不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者是以不同比例混合的體系，直到現在爲止，都在追求工業化。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受到體制的束縛，仍然企圖以國家的力量來追求高科技發展與大工業生產，中國與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百多年工業化的結果，在二十世紀末期，人類已經普遍嚐到許多惡果，最嚴重的當然是環境、生態的破壞、自然資源的日漸短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等等。在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如北美、歐洲、日本，大部份的國民已經在工業化後期下生活，如果一旦沒有汽油、電腦、核能、高速公路等等，國家立刻會癱瘓，人們由於脫離自然太久，根本無法生存，成爲脆弱的人種。而無限制工業化下，人的心理也逐漸扭曲變形，人性受到長期損害與物化，「快樂」與「幸福」的意義模糊，吸毒、犯罪

、同性戀、離婚、心理疾病，像流行病般傳開，人們追求成功，而成功以金錢多寡來取決，道德與人性中善良的本質逐漸與人脫帶，人的一生缺乏正義。這並不只是資本主義下獨有的問題，而是工業化的後果，人的異化在工業化下愈發嚴重，只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下有不完全相同的面貌。



中共正做出改革開放的起跑架勢

企圖追趕西方

那些開始具工業化雛型，所謂開發中國家，則拚命追趕，每年以全民平均收入結算成美金數字，年年比較，成為政府或人民誇耀的事蹟，甚至以廉價勞工向先進國家換取第二手、第三手的技術，在先進國家有計劃的技術控制下，這些開發中國家跟在先進國後面亦步亦趨，永無趕上可能，而社會上所產生的環境污染、自然景觀的破壞，比先進國還要厲害，因為先進國家可以用技術、用管理控制，或將有關題的產品工業轉入次級的國家生產。

至於經濟落後的國家，一些第三世界的弱國、窮國，也恥於落伍，攬苗助長，大量向有錢國家借貸，無節制的設立工廠，加上管理的缺失與對世界市場的缺乏瞭解，造成國家破產的有之，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社會瓦解，秩序大亂，左傾右傾，政治力量慘以背後大國支持下不斷傾軋，和平一去不返，社會問題更多。

過去，我們海外、台灣的一些人，對於中國大陸的真實情形瞭解不夠，天真的以為中國的落後反是中國人的福氣，暫時可以免於世界性工業化的惡性競爭。結果，中共開放以後，確立四個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目標，以改革開放的起跑姿勢重新追趕西方，積極參與國際武器軍備交易，沿海大城市人民由於長久過度貧困，欽羨西方人簡直到了極端崇拜的地步，這一切，真是歷史的諷刺。中共當權者內部保守的一些人為了私人的權力慾望與過去五〇年代的夢想，要把人民重新帶入靜態的專制社會；而改革的一些人，則要把人民驅向工業國家已經發生問題的生活方式，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大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脫離世界體系，但是重新檢定適合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更根本的考慮。

為了對抗這種工業化的愈漸深化的危機，

世界各國，除了專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許多學術團體與民間力量結合，組成自發性組織，推動社會工作，保護環境，愛護自然（包括野生動物）反對浪費，反對欺騙性廣告，反對核能，反對國際武器競賽，要求和平，平等對待不同文化與生活方式，鼓吹人的正義追求等等，也有明顯的成就。有些政府，也把這部份工作納入正常行政體系，配合民間一起工作，而議會，更是把這些問題當做經常性題目來討論，檢查政府施行的結果。

相對於工業化下的大型觀念、大政府、大企業、大工廠、大生產、大浪費，開始有人回頭認為「凡小即美」筆者在此介紹與討論對中國人可能有益的一個看法，即是「社區發展與自治」，提倡在少數人口與當地特色為主的標準下，成立小社區，有關地方福祉，如教育、報紙、銀行、體育、娛樂、小型生產、衛生、地方建設等，都由社區自行成立的委員會決定執行，跨社區的計劃，則由社區與社區間討論解決，省政府或州政府僅起協調配合的作用，國家的功能也是在外交、軍事、國際關係、宏觀經濟調整、憲法維護修訂、司法獨立、民主制度運作、超大型計劃推動等等之上，不再是一個龐大的中央指揮體系。

這種小型社區的發展與管理與小型地方議會式政府有許多好處，一是避免中央政府強行規劃而使有些地區利益受損；二是人口少，可以使選出的地方委員的才能與品質受到充份監督，減少官僚主義弊害，高幹子弟為所欲為，更不可能；三是不同地區不同特色，可以發展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產品；四是全國多元化，新的思想將會互相競爭、互相鼓勵而產生；五是地方的意識自然發生，公共道德與住民福祉有直接關係，不必勞煩中央政府日日宣傳如何做

人；六是工作遷徙自由，人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地方居住，打破農村、都市兩極化。

這種制度，不但不是無政府主義，還是具有實質意義的民主運作，也避免大工業化的惡果，和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也是符合的。中國幅員廣大，有些地區的語言、文化、風俗、生產條件彼此差異頗大，派一些革命家去管，管不好是正常，甚至帶給地方很大的傷害。而且中國有些省份之大、人口之多超過世界上許多國家。將目前的省份重新劃分成衆多較小的省至爲必要；事實上，這個題目——省份規劃，早在清末民初就有許多地理學家、行政學家提出討論過。

中國長久實行中央集權，弊害已經很明顯

了，今後朝地方分權，不同地區向不同特色發展，人民管理自己地方事務，在一個全國性民主體系之下，應該有相當光明的前景。至於那些不相信人民可以管理自己的人們，也可以集中在一個地區，實行他們自己喜歡的小型中央集權，只要不要強加他個人的權力慾望於其他人即可。

結論

這篇文章涵蓋幾個不同的子題，主要在於分析海峽兩邊的一般情形，來對比「歐共」的思想。中共的制度和歐共有一部份血緣相通處，台灣的三民主義也和「歐共」有形似處，進

學生專欄 一件小事——「恐懼」是共產國家人民的通病（美國）馬嘉正

最近因爲工作的關係，我到另一個系去做一項實驗。在那個系的實驗室裡，我認識了一位羅馬尼亞博士，他在那個系工作。趁大家喝咖啡時我們閒談起來。從中我瞭解到他來美三年了，在美申請政治庇護，已經獲得批准並取得了永久居留權。還談到了他的家庭子女，談到了羅馬尼亞。我問他，爲什麼申請政治庇護？他說，在羅馬尼亞生活太苦了，每個家庭每月只能分配到很少的一點食品。他講英語不太純正，夾雜着很重的口音。他怕我聽不清，隨手拿起筆在紙上寫着「ONE LITFOIL ONE KILGRAMME SUGAR.....」（一升油，一公斤糖……）。我問：是炒菜的植物油嗎？他說，是的。我又問：有肉吃嗎？回答：根本不供應肉，偶爾一個星期人們可能在自由市場上買到一只雞。商店裡很多日用品，像衣服、鞋子

、手紙都是中國大陸產品。我接着問他：是不是因爲生活苦才要求政治庇護的？他說不是，主要是在羅馬尼亞生活時精神上感到恐懼，人們不能隨便談論。

他拿起筆在紙上又寫下：POLICEMEN 五

五〇%。接着告訴我：自從斯大林時代至今，羅馬尼亞人沒有自由和民主，人們不敢隨便談話表達自己的想法，到處都有人監視。警察不只是穿制服的，警察都穿便服。在一個單位一同工作的同事中有一半人是屬於這類人，平時誰也分不清誰是警察，一旦某人說話不小心，就會有人向當局報告，這個人就倒楣了。我問：是抓進監獄嗎？他說，不是，是失蹤了，或許在回家的路上發生車禍，讓車撞死。

喝咖啡的時間結束了，他很小心地把那張他寫過字的紙揉成一團。我注意到了這一點。

而以廣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兩邊都有開展的餘地，可見其重要性。然後談到世界性工業化問題，希望中國人能超越這個潮流，走我們自己的路子。最後提到「社區發展與自治」，重視品質，避免以一個大的數目與一個單元的標準去壟斷與平均不同地區、不同素質、不同理想的人的發展，進而彰顯人在歷史中的意義，而非抽象「群眾」的強制。

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台灣的新格局正在開展，這是一個良好的時機，讓我們大家一起來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徑促進一個新的中國的復興。回顧過去，我們中國人走過痛苦艱難的路子，但是相信一向有善良夙願的中國人終會走向光明大道。

可是他並沒有扔掉，雖然垃圾桶就在他身邊不遠的桌子旁邊。他把那揉成小團的紙塞進了褲袋裡。我想，他必是回家後再掏出來銷毀吧？他所作的這一小動作故意作的漫不經心，但我却看得一清二楚。雖是一件小事，却引起我的深思和震驚。對一個已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人來講，在美國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在這裡，言論是自由的，人們可以談論任何事情。可是他爲何如此小心謹慎，是爲了他知道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或許羅馬尼亞當局通過中共當局來監視他的？這當然太離奇可笑了。因此他不想留下筆跡。

他簡直不是患有精神過敏症就是一個十足的膽小鬼！然而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這也許是很自然的。一個從共產黨國家出來的人，由於幾十年來形成的保護自己的經驗，自然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我想這也許是生活在共產黨國家廣大人民所患的一種通病——政治恐懼症吧！

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遺產及其代表黃宗羲

(美國) 丁 楚

一、中國民主傳統之辨

長期以來，一種成形的概念頑固地統治着人們的頭腦：一提起中國，人們就會想起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一提起民主，人們就會自然聯想起它和西方的淵源以及它著名的思想家洛克、盧梭、孟德斯鳩。實際上，以上概念與其說是歷史真實的反射還不如說是一種人為加工的結果。

中國人之所以習慣于把民主的概念與西方聯系在一起，其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於西方的民主傳統特別深厚和悠久，而恰恰在於西方成功地實現了民主制度。在實現民主制度的過程中，西方的革命者、改革者以及政治家們把歷史上民主主義思想家的學說當作思想武器，使其在鏗而不舍的宣傳中得到普及，並深入人心，以致造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慣性，一提起民主就認為是「西方的」民主。

相反，人們之所以習慣地把封建專制傳統和中國聯系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也不在於中國沒有民主主義的傳統，而恰恰在於中國至今沒有實現民主制，仍處於專制的統治之下。爲了

維護專制統治，中國今天的統治者自然要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野蠻行徑奉爲「進步和正義」之舉，自然要在人民中間培植對聖主明君的期望以及愚忠情緒。中國的專制統治者當然不會去挖掘中國歷史上民主主義思想家的寶庫，更不用說將其普及並發揚光大了。以致使這些民主主義的學說在中國甚至世界上都鮮爲人知，從而造成了人們的慣性思維，認爲中國只與專制有淵，與民主無緣。

由此可見，所謂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人（尤其是後來的統治者）人爲塑造的。如果漢武帝沒有採取「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如果後來的封建統治者沒有把儒家學說捧到至高無上的地步，孔子不過是歷史上一個終身不得志，默默無聞的潦倒書生而已。同樣，如果不是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將天賦人權、分權制衡的思想作爲反封建的武器的話，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學說也會被淹沒在衆多的學術流派中，絕不會有今天的顯赫地位。正如西方歷史上也不乏王權主義者和專制主義的思想家一樣，中國歷史上同樣也有出色的民主主義思想家，只不過他們被後來的歷史所淹沒，而沒有成爲社會的「傳統」而已。

在中國古代具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思想家中，最傑出的莫過於明末清初的黃宗羲了。黃宗羲誕生于一六一〇年，比被譽爲當代西方民主主義的洛克還早誕生二十二年。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明夷待訪錄》發表在一六六二年，在這部著作中，黃宗羲系統地提出了「主權在民」和「分權制衡」的思想，而這兩個思想被稱爲當代民主制度的兩根最主要的支柱，是民主制度的靈魂和實體。黃宗羲所處的年代使他不能和西方思想界有任何交流，因此，他的思想沒有任何西方的淵源，相反，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遺產，他可以說是這些遺產的一個集大成者。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民主思想並非完全源於西方，中國也有其本身的民主淵源。中國近代的民主先驅康有爲、梁啟超都把黃宗羲當作自己的宗師，同時也大力推崇、宣傳過黃宗羲的思想。可以設想，如果康梁的君主立憲變法成功，或者如果孫中山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能夠實現，中國將成爲繼英、美、法之後第四個進入民主時代的大國，那時焉知黃宗羲不會成爲中國的洛克，焉知中國不會被譽爲另一個世界民主潮流的發源地？歷史並不總像那些只會放「馬後炮

「的一元論唯物主義者想像的那麼規律。

二、黃宗義民主思想之淵源

作為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黃宗義的學說誕生在明末清初並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歷史上民主思想發展和專制制度演變所培養出來的共同之果。

首先，黃宗義的思想是繼承中國古代民主思想遺產的產物。正如西歐曾有過古羅馬的民主傳統一樣，中國在大禹以前的遠古時代也會有過原始的民主之風。相傳中的舜堯的讓賢顯然不是像今天中共的選拔接班人的模式；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順應了民意的推舉。以大禹王為例，他領導治水成功，政績昭然，人民有口皆碑。其王位的繼承與其說是堯讓賢的，還不如說是人民推舉的。這與古羅馬時代公民推舉執政官的制度並無異樣。而且大禹時代為公元前二千一百多年前，足足比古羅馬時代早了兩千年。正如資產階級革命的啓蒙者常常把古羅馬的民主傳統作為自己的武器一樣，中國古代具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們也總是從舜堯禹時代的民主古風中吸取養料。大禹治水，為民盡粹的記載往往是他們提倡民主主義的藍本。例如孟子就提出過「民為重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明初的方孝儒則從君主產生的過程和其職責入手闡述了人民與君主的本末關係：「能均天下者為君，從復兆民者為君。生民之初，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于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故天下主君，所以為民，而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天之意，以為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當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主，因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為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

養民……如使主君無益于民，則于君何取哉！「養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方孝儒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君主之職責，從根本上論證了人民和君主的主僕關係。方孝儒之後的李贄則繼承其思想，指出：「天之主君，所以為民。聖人無中，以民為中」。從孟子的君輕民重，到方孝儒的君為民生，至李贄的以民為中，民本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厚，這就是主權在民思想的萌芽，黃宗義正是繼承了前輩的民本主義思想，並把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其次，黃宗義的民主思想也是中國古代封建專制制度走向極端後的異端產物。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演化史，可以說是一部王權逐漸膨脹並最終走向絕對化的歷史。在這個演化過程中有三個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是大禹傳位于子，開創了血統繼承王位的先例，從而使王權擺脫了民意的制約；第二個里程碑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廢諸侯設郡縣，使王權逐漸擺脫了地方勢力的制約；第三是明太祖廢除宰相，以皇帝直轄六部，使王權擺脫了大臣內閣的制約，從而最終完成了王權走向絕對化的過程。黃宗義誕生於明末，耳聞目睹了皇權走向極端後的社會黑暗和腐敗，這對於其民主思想的萌生和發展無異是個反作用的刺激，如果說他的民本主義思想主要來自繼承前輩思想家的遺產的話，那麼他的「分權制衡」的思想則更多地來自對王權走向極端的弊端的反思。他所提倡的擴張民權（太學祭酒），相權（內閣）和地方權力（方鎮）全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制約王權。

在黃宗義以前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雖然不乏提倡以民為本的思想家，但在他們的中間還沒有一人曾提出過一套切實可行的措施來制

約王權，防止其異化。黃宗義的可貴之處正在于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體制設計，並系統地體現分權制衡的思想。

三、以民權思想為基礎的政治理論

與中國儒家學說以及洛克的政治學說中的人性本善的出發點相反，黃宗義的政治理論是以人性本惡為出發點的。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方孝儒的君為民生的思想，同時又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不謀而合。

在黃宗義的時代，民權的對立面是君權。所以黃是從闡述君權入手來伸張民權的。他在《原君》一篇中寫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與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人之勤勞必千萬倍為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入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上述可見黃宗義認為，君主的職責是為人民謀福利、除弊害的。所以為君者不但得不到什麼利益，而且還要為社會作出更大的犧牲，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操勞。因此，出于好逸惡勞的人類天性，君主一職並非常人所願意並能夠勝任的，難怪許由、務光三思之後而不願為君，舜堯當了君主之後又放棄君位，而大禹不情願為君，而後欲罷不能。黃宗義認為，古人和當代的人性都是一樣的，前者並不見得比後者高尚，由此可見，古代民主社會的君民關係，同樣適用於當時的社會。他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

這裡，客應當作你解，故君應為民僕。

黃宗義認為，當時社會的君民關係是對古代民主社會的異化，他抨擊道：「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享受無窮。」于是乎「今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無地而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盡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始無君，人各得自利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上述可見，黃宗義認為當時的專制制度不但顛倒了君民之間原來的主僕關係，而且扭曲了人類自私自利的天性。如果社會不是一人為天下，而是天下為一人，那麼還不如無君為好，這樣的暴君早已失去當君主的資格，人民有權不承認他，視其為異己（寇仇）。這一觀點，與當時西方的「暴君抗伐說」不謀而合：「人民無服從暴政之義務，因而可訴助于天」。（洛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民權的理論均是從反抗暴政開始的。

黃宗義不但在論述君權本質的過程中從反面闡述了民權原理，同時也從正面論述了人民的權利。這是他超出他之前的思想家的重要之處。

首先，黃宗義認為人民應有議政權和批評權。從後面介紹的政治體制設計我們可以看出黃宗義提倡廣設學校，而學校的作用不僅僅是為了培養人才（養仕）同時也是人才聚集、評論時政之地。而學校的輿論完全獨立于官方輿論：「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逐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學校。」在這裡，黃宗義並沒有限制人們入學校的資格，可見人人均可議政。他所設想的學校頗有點類似于沒有立法權的議政會。黃宗義還舉了東漢三個學士抨擊時政、公卿避其貶議，以及宋朝書生擊鼓朝庭、請用李綱的事例來說明人民評議權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其次黃宗義認為人民應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其選舉罷免的對象是相當于議會的學校首腦：「郡縣學官毋得自由遷除，郡縣公議請名士立之，自布衣以至宰相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請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黃宗義雖然沒有明確地闡明行政官員的罷免權問題。但是他却明確地論證了行政官員權力的來源以及負責的對象不是皇帝而是人民：「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既然行政官員要對人民負責，那麼人民對其不滿，則可以不服從其領導，甚至也以「伏闕追鼓」要求罷免某人，起用某人，這實際上已隱含着對行政官的罷免彈劾權。

第三，黃宗義認為人民應有革命和反抗權。他指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于治亂者也。」在這裡，人民推翻暴政，不是亂而是治，是正義之舉。相反，

暴君即使能平定天下，也不是治而是亂，是非正義的，人民有權反抗它。歷史上，孟子雖然也強調過弔民伐罪的義舉，但他只強調暴君可誅，並且一定要有代表天意的明君出現後方可誅伐暴君，否則人民只能消極等待，這實際上還沒有跳出「一姓之興亡」的框框。而黃宗義超出孟子之處在于他正面闡述了「萬民」的意願和權利，突破了改朝換代的天命說。

黃宗義的政治學說不但主張民權，而且還主張人權平等。其人權平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黃宗義主張法制，他認為每個朝代開國的君主由于需要爭取民心，立法時往往比較多地考慮人民的願望和利益，往往三代之後，繼任君主為了本姓利益，鞏固一家之政權，私改前朝立法，日益違背民本主義的立法精神。所以黃宗義主張無論君主還是臣民，都應受制于三代之法，不得為私利而設法，在前人之法面前人人平等，「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也。」

第二是所有的人參政權平等。首先是君與臣平等。黃宗義把君臣之間的關係比作治理天下的分工，治天下好比拖木頭，為君者只不過是喊號子的領唱而已，為臣者只不過隨前呼而後應：「治天下猶拽大木然。前者唱耶，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拽木之人也。」

第三是官民平等，在學校議政時，地方官照樣在弟子行列恭聽，而且上至退職宰相下至平民布衣均可當選為學校首腦。然後是各階層平等，黃宗義主張學校議政，任何人均可參加，「仕農工商皆可為之」，甚至學長「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雖然黃宗義也認為學校議政的主要成員應是紳和仕，用今天的話說是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但他並沒有嚴格地局限資

格，不是知識份子也可以。最難能可貴的是黃宗義提倡男女平等，他提出：「女學主與男子同等」。也就是說女子也和男子一樣有權進入學校受教育並且議政。當代被譽為民主政體楷模的美國也是在二十世紀中葉就提出女子的參政權，不能不說其思想之先進。

四、在分權制衡原則下的政治體制設計

以民本主義和反專制主義為出發點，黃宗義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政治體制，其核心原則是分權制衡。他把當時全部集中在皇帝手中的權力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是王權，黃宗義仍保留皇帝作為國家元首和行政最高長官自然是出于他本身的歷史的局限性。他所生長的明末清初，正是王權達到頂峰的極盛時期，清襲明制，而且清初的皇帝康熙、雍正，均是能力很強，精力旺盛，而且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可以說當時中國根本不存在可以替代皇權和限制皇權的力量。我們只要回顧一下法國大革命初期，當時法國已有國民議會作為王權鼎足力量的情況下，革命黨人都沒有立即取消王權，當然我們就更不能以中國當時的情況去苛求黃宗義了。不過黃宗義保留王權是有條件的，王權不是無限的，要對它進行分權、並加以限制。

第二是相權。黃宗義研究中國政治體制弊端主要是以明制為藍本。自明太祖取消相權之後，皇帝昏庸，宦官弄權都達到了各朝之顛，這使黃宗義深感有恢復相權的必要性。他認為相權的作用有三；第一是補充王權的缺陷，因為王權是傳子不傳賢，而相權是傳賢不傳子。王權血統繼承，這樣皇帝的品質和能力就帶有

很大的偶然性，而宰相是非血統繼承，要經考試、推舉等程序從民間賢仕中選拔，其賢明的積率就顯然大得多了。這樣一來，皇帝和宰相兩權中至少可以保證有一權賢明。第二是分散皇帝的權力。黃設計所有進宮的文件都要先經丞相過目然後才轉皇帝審批，丞相過目實際上也是一道過濾，不重要的文件就被扣下。這樣使皇帝能集中精力考慮重大的問題，而且天子批不過來的文件，丞相也可以承擔一部份代批。「凡章奏進宮，六科給事中立的，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另外在皇帝無能或年幼時，丞相還可以代為執政。「天子不親政，宰相當理之」。第三是制約王權。在朱熹的理學興起，三綱五常倫理觀念普及之前，中國朝廷中的相權是相當大的。黃宗義認為至少要把相權恢復到漢朝以前的水平，當時的丞相之權確實足以與王權鼎足，以致挾天子而令諸侯的事層出不窮。戰國時期的四大名相：齊孟嘗君，趙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的名望甚至遠在其君王之上。在唐朝之前，凡重大國事，皇帝都需召開以丞相為首的御前內閣會議討論，參加會議者可以各陳己見，反復辯論，甚至可以批評皇帝。著名的「鹽鐵論」就是丞相桑弘羊在一次御前內閣會議上的出色演說詞。有時如果內閣成員一致反對的話，甚至可以否決皇帝的決定，要求皇帝修改聖旨。皇帝在受到內閣這樣的制約之後，顯然不能為所欲為，而且丞相在轉呈過漣呈章奏過程的本身就可以體現自己的意志。

第三是太學祭酒和學校。「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朔日天子臨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

缺失，祭酒直言無諱。」「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胥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于眾。」顯然，黃宗義設計的學校和太學祭酒已類似于議會雛型。太學祭酒則是最高學校的首腦。學校每月舉行一次議政會，一般擇在朔望月日，皇帝、宰相、百官、地方官都要參加，而且不能書面請假，拒不到會者當罰。根據黃宗義的設計，學校在政治體制上有各種功能：首先是借輿論之力繩之天下之是非標準，這實際上是一種準立法功能。黃宗義受儒家學說影響頗深，不重視成文法而偏重于倫理道德的不成文法，這一點從他沒有明確地賦予學校以立法功能上可以看出。既然天下的是非標準不取決于皇帝而取決于學校，而皇帝的決策又必須受社會是非標準的檢驗，其功能則與立法無疑了。其次學校有批評建議的功能。學校首腦可以對皇帝和百官布道論經，批評其政弊。這無疑對各級政府的決策有着決定性的影響。這體現了黃宗義的以學術領導政治的主張，用今天的話說是以理論指導實踐。第三，學校有代表民意參與決策和修改決策的功能，在學校召開的議政會議上，行政官員作為弟子要解釋自己的政策，並要接受眾人的諮詢和答辨，「以疑義相質難」，這一過程本身就增加了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使政策制定更加慎重並更廣泛地代表民意。當議政會議認為政策出現偏差時，「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于眾」，即小錯可以在會議上當場糾偏，大錯則召開民眾會議表決。從以上三種功能中可以看出，學校是制約王權、相權以及所有行政權的有力工具。皇帝、宰相、各級官員在學校中均是平等的弟子身份，其思想要受學校領導

，行動要受學校限制，政績要受學校檢驗。如果說：「恢復相權」的主張還沒有跳出古人的框框的話，那麼提倡學校議政制度則是黃宗義的一項天下創舉了。同時也是他民主思想的最高體現。學校的權力實際上是代表民權，地方學校首腦是民選產生的，而作為學校最高首腦的太學祭酒則是從當代名儒中推擇產生，顯然其產生不是根據皇帝的旨意而是根據民意，實際上也是民選。可以設想，如果黃宗義的學校議政制度能夠得到試行，發展下去必然會向今天的議會制度過渡。

最後是方鎮。方鎮是次于中央一級的地方政權。黃宗義論述方鎮的功能雖然主要是從國家安全和軍事防禦的角度出發，這與當時明朝滅亡的歷史背景有關，但他實際上把方鎮設計成爲一個完全的地方自治體，如果切實實行則與聯邦制無異。方鎮本身有財政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有軍事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有立法權「一切政教張馳，不從中制」，有行政權「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群召，然後名聞。」也就是說，方鎮的政權可以根據當地情況自修法律，而不必遵守中央法律，可以自行收稅聚財，自行財政開支，可以自己供養軍隊，調動軍隊防禦疆土，可以自己任命下屬官員，然後上報備案，方鎮最高首腦採用一長責任制。而方鎮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僅僅是「財政包幹」，每年上繳一定的財貢，同時承認國家形式上的統一，每三年進京開一次會。「一年一貢，三年一朝」。當今最徹底的聯邦制，地方政權除外交和軍事權之外，基本上完全獨立自主。而黃宗義設計的方鎮更甚，連軍事權都交給了地方政府。如果這一設計成爲事實，則王權將會絕大部分被架空。方鎮行政長官「許以嗣世」，可以

自行組閣，皇帝沒有任命權。同時由於地方學校的制約，方鎮政權顯然要向當地居民負責而不向皇帝負責。最重要的一點是方鎮本身擁有軍事實力，一旦皇帝昏庸「各方鎮完全有能力帶兵問罪」改朝易主，這對王權來說是個致命的制約。如果說學校議政制度是對王權的一個軟制約的話，那麼方鎮地方自治的制約則是一個硬制約。黃宗義之所以強調方鎮的軍事權，可謂用心良苦。

按黃宗義的設計，以上四權相互制約關係如下：

1 學校及太學祭酒，可以制約皇帝、宰相、和方鎮地方官員，對其進行指導、批評、監督、評判。

2 宰相及其內閣是皇帝與地方政權聯系的中樞，其一方面可以通過批轉呈文的權力制約地方政權，另一方面可以通御前內閣會議制約皇帝。同時按黃宗義設想，卸職宰相是太學祭酒和各學校首腦的當然候選人，通過其當選，可以制約學校。

3 地方自治權可以擁兵自重，壟斷財源，一方面威脅王權，另一方面抑制相權，對皇帝和宰相是一個制約。

4 皇帝仍爲一個行政最高首腦，有權最終任免宰相，對相權是一制約；同時他又是國家元首，各方鎮在中央政府有難時有義務舉兵勤王，所以皇帝仍有權調集其它方鎮之兵去鎮壓某一方鎮的叛國、分裂或謀反，這對方鎮是個反制約。

五、黃宗義民主思想的局限性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黃宗義的整個政治理論無疑是非常幼稚的，而且很不徹底。和所有的人一樣，黃宗義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其局

限性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他仍舊承認王權的正統和合法地位，這對於他的民權理論無疑是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而且與英、荷、日等國現在實行的君主立憲內閣制不同，黃宗義設計的政治體制仍給皇帝以實權。這樣一來君主爲民服務的職責和他血統繼承的事實就會產生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黃宗義本身陷在這個矛盾裡無法脫身。

第二、黃宗義對於法的觀念比較模糊，因此他雖然原則上贊成法治，但對立法權和司法權沒有詳細論述，而將注意力主要集中於行政權的分散制約，從而顯得他的整個理論體系比較軟弱無力。

第三、黃宗義的政治設計仍比較粗糙，有很多明顯漏洞。例如他設計以賢明的宰相來抵消昏君，可是由於宰相最終任免權在皇帝手裡，所以昏君完全可以任用庸相，這樣的例子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果不能解決王權吞食相權的問題，那麼以相權制約王權就是一個空想。另外，黃宗義的學校議政制度也有很多想當然之處，集會、議政、選舉等程序都是泛泛而論，沒有進一步闡明，而且由於沒有法的強制力，整個設計頗有烏托邦的氣息。再者，黃宗義設計的方鎮很容易恢復封建割據制，而且軍隊涉政，危害甚多，黃只舉其利而未思其害，這也是其理論一大缺陷。顯然，由於有諸多漏洞，黃宗義的這套政治設計即使付諸現實，也未必行得通。

然而，我們絕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去苛求歷史人物，黃宗義的思想儘管有種種缺陷，但這絲毫不能抹殺他的光輝之處。後人總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的，沒有黃宗義就不會有康有爲、而沒有康有爲就不會有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在一個專制制度最完善、最強大的

國度裡，而且是在它的鼎盛時期就提出民權主義和分權制衡的思想，已足以為後人所欽佩了。

而且我們在研究黃宗義的思想遺產時，不但要考慮他主觀認識水平的局限性，而且也要考慮客觀上對他的言論限制的局限性。黃宗義生活在一個大興文字獄的年代，明清兩朝，文

●大陸專欄●

中共牢不可破嗎？

(香港) 關金城

認識了一些大陸留學生和香港新移民，發覺他們雖然由大陸來卻未必知大陸事。主要是長期缺乏知的基本權利，一出生就受一面倒宣傳的洗腦。在我認識的朋友之中，有一半以上堅持說：「因為中國在戰場上打敗美國，所以每個總統都來北京朝見我們的領導人。」他們認為中共陸軍舉世無匹，黨的組織又比蘇聯嚴密，所以要推翻暴政是不可能的。

要醫治這種恐共症，中國之春責無旁貸。中國之春應該是一本儘量以事實去教育大家的群衆性雜誌，不要動不動就長篇理論。三四十年来共產黨把人民的口封住，現在大家出來吸到自由空氣，都會有表達意見的慾望，中國之春就應該成爲大家自由討論的園地了。例如應該讓參與援朝和援越的人們用自己的經歷去向大家說明人不如蟻的人海戰術慘劇。

讀了中國之春第四十八期兩篇有關中共以勞動教養去踐踏人權的文章，我覺得這是中國之春的長處。作者簡單地把自己的見聞寫出來，思想明瞭，見解清晰。這種做法是值得提倡

字獄數百年不絕。孟子因有「民貴君輕」的言論而被明太祖毀掉孔廟裡的牌位；方孝儒因頂撞明成祖而被凌遲處死，李贄被朝廷以「左道惑衆」爲罪名逮捕入獄自殺而死。而黃宗義的思想對專制主義的威脅已遠遠超過前者諸人，所以不排除他爲了保存生命並傳書於後世而用一些隱晦的語言或含糊的概念的可能性。如果

的，一位香港資本家曾經帶淚向我講出他三十年前的不幸遭遇，他解放以後一直就是青年團的幹部，五五年大學畢業就分配到一個重點建設的單位，而且被評爲模範青年工程師。不幸他有一次在私事上和黨支書有所爭執，黨支書竟然公報私仇，在反右運動中指控他攻擊黨的農村政策，第二天上班時突然被公安幹部逮捕，被判勞動教養。由於青年氣盛，而且相信黨不會冤枉好人，他恃著自己有好的檔案，竟然在公安局大吵大鬧，結果以後不再談他的政治問題，僅僅集中說他態度不好就在勞改營中吃了十幾年苦。在文革中他趁混亂逃走，本來打算殺黨支書報仇，但仇人已被紅衛兵闖死，于是他偷偷渡來港，腿上現在還滿是鯊魚牙痕。這種「態度犯」在大陸多到數不清。我們香港人劉山青最初只是去安慰民運份子的家人，後來被捕就因爲態度不好而關在牢裏長期受刑。

事實的眞面目是愈辯愈明的。只要大家對比中共的過去和現在，就會打破中共日益強大的神話。例如五十年前中共在延安已經整風，

當時黃宗義完全否認王權，他的書很可能不會流傳至今。這一苦衷，只會有當事人明白，而對後人來說，則永遠是個迷。

參考書：

1. 反專制主義的大師黃梨洲、高淮
大漢出版社

2.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義

整到今天還每年元旦在報紙上都強調「今年應是整風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年年如是。到了五十年後的今天，中共的歪風是減少了還是十倍百倍地惡化？中共在五七年迫害知識份子時絕不心慈手軟，一打入牛棚就磨折二十年以上，而且株連九族。這樣嚴厲的鎮壓應該早就使「右派言論」滅絕了。但事實又怎樣呢？今天如果你在大陸和老百姓談話，他們的言論比三十年前不知右了多少倍，如果五七年要靠硬性指標才打出一百萬右派份子，現在的總和起碼有八億之多，那就是番了八百倍。事實證明：是鎗桿子決定一切，還是人民的力量大呢？

中國之春的讀者都是比較開明的知識份子，可是部份文章仍充滿「只有老子才了解大陸一切，你們都在胡說八道」的專橫心態。這些人一旦有權，還不是做鄧小平第二？要搞民主，中國之春應該由自己做起，如果一味堅持「理論建設」和「思想教育」，這和海外的「一本小紅旗」又有什麼不同呢？中國之春應該主動組織不同看法的稿件，例如中國領事館反對留學生讀中國之春，你們可以公開向他們徵文，讓他們列舉出中國之春的「毒素」。除了在社論說明民聯的觀點外，中國之春應該廣設自由論壇，讓不同的意見百花齊放。留學生習慣了容忍不同的意見，回到中國就有作爲了。

自由、民主、和解、創新

——評美國聯邦憲法的制定者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微言

今年是美國聯邦憲法制定二百週年紀念日。美國學者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各個角度，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無疑，聯邦憲法在美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它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一起並稱美國立國的法律經典。二百年來，美國的這部聯邦憲法雖歷經多次修正，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六條憲法修正案，但其所體現的民主、自由、和解、創新的基本精神，其所創立的分權、制衡的基本原則，則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發揚光大，日趨完善。物換星移，今天的美國早已從當年草創不久的區區小國發展成世界頭號強國，但是二百年前制訂的這部聯邦憲法，依然作為「全國最高法律文件」，在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這就難怪不少人都把一七八七年出席費城制憲會議，參與制訂憲法的政治家們奉若神明，認為當今的從政者和他們比起來不過是一抔黃土，而當年的憲法制訂者們則是聳入雲天的高山。

憲法制訂者們是人不是神

其實，當年的聯邦憲法制訂者雖然制定了

一部偉大的憲法，對美利堅合眾國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作為個人，他們和今天的政治家們並無天壤之別。雖然他們具備各種各樣的優良品質，但是他們身上同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性固有的各種缺點，他們的思維、行動同樣受着時代背景、個人偏好、家庭出身、經濟地位、知識素養、社會經歷等影響和局限。

首先，聯邦憲法的制訂者身上同樣帶着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和文化的產物。他們信奉的是托馬斯·霍布斯哲學學說和基督教原罪論。他們似乎把人看成必須加以約束的天生的叛逆者。儘管憲法制訂者們不相信自己，但是他們認為一種好的政治制度可以約束人的行為，用他們的話說：「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麼也就不需要政府了；而如果是人是由天使來管轄，那麼無論從內部或外部對政府加以制約都是多此一舉。」

但問題是，人既不是天使，管轄人的政府也不是由天使組成的。因此，憲法制訂者們認為，「在組織一個管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莫過於如何處理好這樣一個進退維谷的難題，一來必須使政府能夠管束被管理者，二來你必

須使政府能夠約束它自己。」這段話可說是揭示了民主政治的一條重要原則，作為管理機構的政府不但要管轄民衆，而且它還要約束它自己並接受被管理者的監督。

但是從這段話也可看出憲法制訂者們對人，不論是被管理者還是管理者的不信任。他們認為，人是有缺陷的，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因此，不能讓任何個人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一位憲法制訂者在講到執法者時指出，「如果給行政首腦的權力過小，立法機構便會篡奪他的權力，而如果給行政首腦的權力過大，此公又會篡奪立法機構的權力。」因此，憲法制訂者們認為，在設計政府時，着眼不是如何改善人，而是如何去管束人，不管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在制訂憲法時，都千方百計地要創立這樣一個理想的政府。他們設計出分權、制衡、兩院等一系列制度去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但是他們並沒有試圖去改變人性，以使人去適應制度。

對財產權的重視

第二，憲法制訂者們都是有產者，除少數人外，費城制憲會議的參加者均擁有一定的財產，他們對財產權的重視程度決不亞於他們對自由的珍視。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經濟財富是通向政治權力的門磚。約翰·杰伊 (JOHN JAY) 稱之為：「擁有這個國家的人必須治理這個國家。」查爾斯·賓克尼 (CHARLES PINCKNEY) 更提出，當總統的必要條件之一必須擁有十萬美元以上的財產。總的來說，憲法制訂者們均同意將擁有的財產作為代表權的基本條件。

儘管憲法制訂者們在不少問題上意見分歧，他們代表着各個州不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但是在財產權這一點上他們却是統一的。由於他們均有財產需要保護，因此他們都贊成財產權不容侵犯。正是以財產權不容侵犯為基礎，與會者之間方能取得和解，並順利簽署憲法。為保護私人財產，憲法制訂者建立了一個權力有限的政府。按照他們的設想，該政府的目的和手段均是有限的，它不僅要保護私人財產權將來不致被正在出現的無產階級所破壞，而且要約束它自己，使其不得侵犯私人財產權。

注重現實

第三，憲法制訂者們是注重現實的政治家。一方面他們認為全部真理都在他們自己手中，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則是錯誤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能夠容忍不同意見，甚至與之妥協。他們既全力爭取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又放棄一些他們可以放棄的東西以求得和解。如果他們不是堅信自己觀點正確並為之奮鬥，那麼憲法會議上便不會出現這麼多爭吵辯論，而倘若他們不能傾聽別人的意見並設法求得和解，那麼聯邦憲法最終也簽署不了。

正因為憲法制訂者們是經驗豐富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他們知道政治的局限性，知道他們和人民和他們自己的局限性。他們幾乎沒有試圖去突破這些局限。憲法制訂者屢屢把自己比作古希臘的著名政治改革家——梭倫，梭倫雖然沒有給予雅典人一個他認為最好的政府，但是他却給予雅典人一個雅典人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政府。用憲法制訂者自己的話來說，他們來參加會議的目的不是要闡述他們自己的觀點，而是為了轉達選派他們來開會的人民的意見。他們

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他們認為最好的政府，而是要建立一個他們的選民授權他們設計的並能為選民們所能接受並批准的政府。

最後，憲法制訂者們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改革者。一七八七年正是美利堅合眾國前途未卜的時候，憲法制訂者們面臨的很多問題在當時看來都是無法解決的。但是他們知難而進，大膽創新，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設計出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府。例如，他們沒有盲目相信孟德斯鳩關於龐大政府的弊病的名言，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政府，他們沒有囿於主權不可分割的理論，而把主權行使分別劃為聯邦政府和州政府。

總之，為了維護自己國家的正義、和平和繁榮，憲法制訂者創造性地制訂了一部聯邦憲法。儘管這部憲法本身還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之處，但是迄今為止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憲法。

那麼憲法制訂者眼中的人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財產權在憲法中又起着什麼樣的作用呢？憲法制訂者們又是怎樣求得和解的呢？他們留給人們的遺產又是什麼呢？本文擬就這些問題談談看法。

憲法制訂者關於人的

哲學觀點

制憲會議的最顯著特點是憲法制訂者們對人類的悲觀看法。按照他們的觀點，完美無缺的人是不存在的。像同時代的大多數哲學家一樣，憲法制訂者們也往往看到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對他們來講，人的本性是自私和好爭鬪的，人雖生命有限但却慾望無窮。就本性來說，人和人的關係就像狼和狼一樣，同類之間血腥殘殺。只是為了維護個人利益，人們才建立了

政府。

關於基督教流傳並受同時代歐洲思想家的影響，憲法制訂者們認為，人易行惡，人所創造的政府是不能信賴的。用富蘭克林的話說，強烈影響人類行為的激情有兩種，一是野心和貪婪，二是對權力和金錢的迷戀。

對人的不信任首先是對民主的不信任，這恰好說明為什麼在制憲會議上充滿反民主的情緒。剛剛渡過謝恩起義（Shay's Rebellion）的衝擊，又目睹聯邦政府在處理全國性事務上的無能，一七八七年制憲會議的與會者們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擴大民主，而是如何約束民主。

憲法制訂者當中有不少人認為，過度民主將會帶來混亂。連詹姆士·麥迪遜這位忠誠身民主的鬥士和制憲會議的靈魂人物也寫道：「濫用自由與濫用權力一樣，都會損害人的自由，而在美國，更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濫用自由而不是濫用權力。」

這股制止過度民主的情緒強烈地影響了聯邦憲法的制訂。有人認為，原先制定的聯邦條例目的是要防止中央政府侵犯各州權利，而一七八七年憲法的目的旨在限制州權和民主。這種比較難說失之於簡單化，但是却勾劃出兩份文件的根本分歧。

憲法對政府的制約

憲法對中央政府本身也是一種制約。憲法制訂者們深受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影響，他們傾向於運用經典物理學的觀察方法考察人類社會，他們認為，既然自然界各物體之間的制衡保持了自然界的合理秩序，那麼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制衡則可以維護人類社會的合理秩序。重要的是如何巧妙地設立幾種政



自由的象徵——紐約港自由女神像

府機構，並使之相互之間保持平衡。麥迪遜認為，一個好的政府必須由幾個不同部分組成，幾個部分之間的相互制衡可以使每個部門各就其位，各司其職。一個設計良好的政府，可以用野心來制約野心，以這一派別制約另一派別，以惡行來制約惡行。

另一位主要的憲法起草者——漢密爾頓——認為，由於沒有終身利益，共和國官員比國王更容易受賄，從而出賣人們對他的信任，因為國家安危涉及到國王的個人利益。「國王的世襲利益和他的國家的存亡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外來強國很難給一位國王什麼東西，足以彌補他出賣國家而給他帶來的損失。」

再者，共和制國家的權力分配也存在着一個重要問題。如果將全部權力交給多數人，那麼這多數人便會壓制少數人；同樣，如果將全部權力給予少數人，他們便會壓制多數人。因此，必須使多數和少數兩部分人都具有一定的權力，「讓他們都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另一部分人的壓制。」有鑒於此，聯邦憲法制訂者們設想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管理被統治者，同時使統治者受到一定的約束，從而在多種力量和政府各部門之間保持平衡。

憲法制訂者的第一個設想是分權。根據憲法，政府必須由行政、立法、司法三個相互獨立的部分組成。為避免政府某一部分的權力過分膨脹，憲法制訂者們設計了一整套制衡機構。為避免行政首腦搞獨裁，憲法制訂者設計了兩項制約辦法。一是任期制，使行政首腦定期接受選民檢查；二是彈劾，使行政首腦不能實行擅權。為避免立法機構專權，憲法規定對議員也實行定期選舉，並賦予行政首腦以行政否決權，使其可以否決議會的法案。同時憲法規定憲法的解釋權由聯邦最高法院行使，使其可以同時監察行政和立法機構。

憲法制訂者的第二個設想是在議會實行兩院制。鑒於立法機構攫取一切權力的自然趨勢和歷史上立法機構專權的大量史實，憲法制訂者們決定在議會實行兩院制，每一院行使一部分立法權，同時制約另一院的立法活動。實際上，行政首腦的行政否決權與其說是對國會的制約，毋寧說是行政首腦防止侵犯其權力的自我保護措施。對立法機構專權趨向的真正制約正在於國會的兩院制。

第三個設想是在聯邦和州政府之間劃分主權。麥迪遜指出，費城憲法既不是一部全國憲法，也不是一部聯邦憲法，「而是兩者的結合

。」就其基礎來說，這部憲法是聯邦憲法而不是全國憲法；就其權力的運用來說，它是全國憲法而不是聯邦憲法；就其權限來說，這部憲法是聯邦而不是全國憲法；但是就其修正程序的授權來說，它既不是純粹的聯邦憲法也不是純粹的全國憲法。

憲法制訂者的產權觀念

私有財產權不僅是費城制憲會議的推動力量，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是聯邦憲法的基本精髓。憲法制訂者們大多擁有一定的財產，有些人甚至還擁有奴隸。他們並不認為需要抑制自己的慾望，他們也不自許為利他主義者。相反，他們認為，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是保護私有權，人在財產上的不平等是天然合理的。

他們認為，從智力上講，所有人生來是不平等的，因為人們所具備的能力千差萬別，所以人們所應獲得的財產也必然是不相等的。因此，保護私有財產權可以使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這樣一來，財產權便和公民自由緊密聯繫在一起了。破壞財產權便會不可避免地損害公民自由，而只有保護財產權才能夠保護公民自由，反之亦然。

從理論上講，謀求財產平等有兩種方法。一是利用政府權力重新分配財富；二是訴諸於無限制的民主。極權社會經常以第一種方式重新分配財產，而民衆暴亂則採取第二種方式。但是通過上述兩種方式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均損害社會正義和公民自由。

因此，針對上述兩種重新分配財富的方式，維護財產權可以採取下列兩種方法：一是建立一個權力有限的政府，使其不致強大到足以

危害其公民自由的程度；二是對民主加以一定的限制。

憲法制訂者們同時使用這兩種來維護私有財產權。他們既建立了一個權力有限的政府，並且對民主加以一定的限制。憲法制訂者們懂得，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可用暴力攫取他們的財產，一種無限制的民主同樣可用通過投票來剝奪他們的財產。因此憲法制訂者當中的相當一部份人認為，如果把投票權給予沒有財產的人，這些人便會把選票賣給有錢收買選票的人。結果，無限制民主很可能以大衆政治開始，却以暴君篡權統治告終。因此，憲法會議參加者當中有人建議，應該通過一項法律，只允許擁有財產的人參加投票。

麥迪遜雖然承認集團政治的首要原因和穩固基礎是財產分配不平等，但是他並沒有設法消除財產分配不平等。相反，麥迪遜發明了「少數人權利」這一概念，他知道，雖然在憲法會議上有產者居多數，但是他們很快便會以多數變成少數。麥迪遜看到財產權和少數人權利的間存在着的天然聯系，因此他不遺餘力宣傳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使其免受多數人的侵犯。因為，麥迪遜認為，沒有財產的多數人可能會由於處境相同而聯合在一起，指望他們來維護財產權和公衆自由，不過是一廂情願，而是沒有財產的多數人很可能充當財富和野心的工具，從而危及少數人的利益。

借助於保護少數人的利益維護財產權，最簡單的辦法是消除引起集團政治的原因，取消公民自由，以避免出現多數人聯合起來的局面。但是麥迪遜認為，這樣做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使情況更糟。那麼如何妥善地解決集團政治問題呢？經驗證明，僅憑正直是不可能的，光靠良心更不保險，而宗教則不但制止不了集

團政治，反而可能造成各社會集團間的相互迫害與壓制。

結果，在考察了所有這些解決辦法之後，麥迪遜最後認定，「在一個共和國裏，倘若多數人聯合在一起，他們總有機會去壓制少數人」，因此，防止集團政治的「唯一辦法是擴大國家疆域，與此同時，把社區分割成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團和黨派，從而首先使得多數人無法形成完全脫離全體人民或少數人的共同利益；其次，即使多數人能夠找到這樣的利益，也使他們不易團結起來追求他們的共同利益。」

多元化

麥迪遜所提出的這種辦法是政治學當中時常提到的一條重要原則——多元化。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麥迪遜曾經指出過的，對公民自由的保證，並非來自制訂憲法，祈求和諧，而是來自自由經濟帶來的「利益多元化」。任何其它國家均可以制訂一部比美國憲法更好的憲法，但是倘若該國人民並不遵守憲法，或者該國本身並不具備政治、經濟多元化的基礎，再好的憲法也不過是拿來充充門面而已。

因此，憲法制訂者們並沒有去解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問題。他們認為，對國家某一地區、某一部分有利的事情便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每個州都是它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定者，因此，他們拒絕越過南部各州解放黑奴。以維護公民自由為由，憲法制訂者們拒絕接受經濟平等的概念，他們未採取措施去消除社會中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他們把這兩個難題都留給後人去

解決了。

但是，憲法制訂者們欣然接受了多數人統治和少數人權利的問題。儘管他們之間在別的許多問題上意見紛紜，可是對這兩項原則他們却一致贊同，憲法制訂者們之所以接受多數人統治的原則，不僅僅因為他們憎恨寡頭統治，而且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聯邦條例所規定的一致同意原則實際上根本行不通。憲法制訂者贊成維護少數人的權利，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都屬於「少數人」，倘若實行純粹民主，他們當中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作為有產者，他們預見到，一個無產業階級的出現，這一階級將來會構成人口的多數，而他們自己將會變成人口中的少數。

作為各州代表，憲法制訂者不管來自南方還是來自北方，來自大州還是小州，按照不同的劃分方法，他們在會議上都以不同形式作為「少數」出現。以代表人數來論，北部八州是多數派，他們在參議院以八票對五票，在眾議院以三十六票對二十九票超過南部五州。但若以人口來論，南部各州比較北部各州，占據較大的優勢。維琴尼亞、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州三個大州比之十個小州在合衆國裏是少數，但是三個大州的人口却比十個小州的人口加在一起多得多。如果考慮到這些情況，那麼在制憲會議上少數人權受到普遍贊同便不足為怪了。

無疑，對於憲法制訂者們來說，財產一詞含義很廣，甚至包括人在其中。如果根據一七八七年憲法，「獨立宣言」應該改寫為「除黑奴外的一切人生來平等」，因為一七八七年制憲會議規定每個奴隸按五分之二三人的比例計算選票。這一說明與其說是南方奴隸主的發明，倒不如說是不擁有奴隸的北方代表的創造。來

自蓄奴州的制憲會議代表，爲了增加他們在擬議中的立法機構裏的代表權，希望把黑奴也計算爲一人一票，但是北方各州代表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爲，這樣計算會引起非蓄奴州的極大不滿。」

分權·制衡的有限政府

憲法制訂人在努力維護財產權的過程中，創建了一個分權、制衡的有限政府。該政府的任務是管理被統治者並約束其自身，說該政府是有限政府，主要因爲該政府在下列幾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一，該政府的目的有限的。與其它國家不同，憲法制訂者們設想的這個政府並沒有想到改造人或實現經濟平等。該政府認爲財產私有在自由社會裏是天經地義的，它也不想以經濟平等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公正。

第二，該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儘管這個政府強大足以約束人們，但是它並沒有強大到侵犯公民權利，其中包括人權和財產權。即使這個政府企圖侵犯私有財產權或其它人權，但是根據一七八七年憲法規定，一旦發生此種侵權行爲，此政府便喪失其執政的合法性。

第三，相對於其它國家的政府來講，憲法制訂者設想的聯邦政府的手段是有限的，與蘇聯那樣的極權國家恰成鮮明對照。美國政府是有產者創立的，而蘇聯是無產者創立的，因此，前者的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而後者的目的旨在剝奪私有財產，前者自行限制了自己的統治手段，而後者則最大限度地擴張了自己的統治手段。

和解 (COMPROMISE)

作爲政治活動家，憲法制訂者分屬不同的學派。儘管憲法制訂者們都珍視自由與財產，但是他們的政治信仰却大相逕庭。狄更生 (DICKENSON) 推崇有節制的君主制，漢密爾頓則認爲君主立憲制的英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這種君主立憲政府最適合美國的需要，而任何其它形式的政府在美國都是行不通的。威爾遜則認爲，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全國政府，而麥迪遜認爲，美國所要建立的理想政府必須是一個幅員遼闊，植根於聯邦主義的共和政府。

儘管憲法制訂者們有如此不同的政治信仰，費城制憲會議上仍然充滿偉大的和解精神。憲法制訂者深深懂得，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在政治上沒有比用劍與火逼迫他人改變主意更愚蠢的事情了。但是憲法制訂者們很少走這種極端。在辯論時有些代表也會怒不可遏，甚至威脅使用武力。威爾遜震怒時就曾經大聲叫喊過：「這個國家必須聯合起來，假如說理不能讓這個國家團結起來，刀劍必能使它團結起來。」但是這只是例外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會議辯論過程中貫穿着一種和解精神。

憲法制訂人知道，如果他們強求他們所企望的一切，到頭來他們可能一無所獲，因此他們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十分謹慎。比如富蘭克林便說過，「我們是來協商的而不是來吵架的。」和解使得會議取得成功。一七八七年七月十六日，支持建立強有力的全國政府的代表與反對建立一個這樣政府的人達成和解，或者說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之間達成了和解。這一和解被認爲是大州向小州作出的讓步，這一和解爲達成其它和解提供了條件。

一七八七年，無論是聯邦黨人還是非聯邦黨人都在尋求比聯邦更完善的聯合形式。但是

，對於他們來說，聯合意味着不同的東西。聯邦黨人所設想的聯合與其反對者所追求的聯合大相逕庭，而最終達成的聯合，與兩者的理想模式都相距甚遠。

反聯邦主義者認爲，全國政府和個人自由是天生一對矛盾，而聯邦主義者則認爲全國政府可以保障個人自由。對於聯邦黨人來說，聯合不僅是使國家免受外來支配的最好辦法，而且是美國繁榮富強的基礎。對於反聯邦黨人來說，聯邦並沒有這麼重要，聯邦只是一個歷史事實，一條聯結各州人民的紐帶，有些反聯邦黨人甚至否認建立聯邦是反對外來侵略的必要手段。



憲法保障人民集會的自由

聯邦黨人主要關心的是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而反聯邦黨人的首要考慮是州權和公民權。雙方的主張都是合理的，在這種意義上講，雙方都是政治現實主義者而不是烏托邦主義者。通過和解，聯邦黨人得到了眾議院而反聯邦主義者得到了參議院。從長遠來講，聯邦黨人贏得了憲法，而反聯邦黨人最終得到了人權條款。

因此，不論是聯邦黨人還是反聯邦黨人都為美國的締造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的貢獻相輔相成。倘若沒有反聯邦黨人的反對，聯邦黨人可能會建立一個過於強大的全國政府，剝奪各州的權力，從而無法滿足各州的利益。而倘若沒有聯邦黨人的堅持，擁有主權的各州可能陷於無休止的內部衝突，美利堅作爲一個國家早已壽終正寢了。

聯邦黨人較佔上風

但是總的來說，聯邦黨人表現出比他們的對手更具有政治家的風度。因此，人們普遍認爲一七八七年憲法是聯邦黨人的勝利。聯邦黨人之所以能贏得勝利，不僅因爲他們來自大州，勢力雄厚，而且因爲他們的辯論技巧比反聯邦黨人更高一籌。

在一七八七年，不論是聯邦黨人還是他們的對手均面臨進退兩難境地；一方面，聯邦權力過分膨脹反而會危及聯邦，另一方面，如果過於拘泥於聯邦原則政府權力過小，聯邦也不能持久。但是聯邦黨人拒絕承認這一點。他們只強調建立一個強大政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不理會可能會出現的另一種情況。

但是反聯邦黨人却未能擺脫這一困境，作爲理論哲學家，反聯邦黨人認爲，一個強大的

聯邦必然會產生一個全國政府，而一個全國政府必然會毀滅美國。然而作爲實際政治家，他們知道聯邦解體會消弱美國，成爲外來強國的獵物，或各州爭鬥的犧牲品。這樣他們發現自己進退兩難，他們既不能全盤否定又無法全盤接受憲法的主要原則。他們既想得到一個大美國堅聯邦又想保持各個自治的社區；他們既想得到個人利益又想得到公共利益。這種猶豫不決使得他們無法採取前後一貫、協調一致的行動。

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反聯邦黨人爲什麼在憲法辯論中遭到失敗。反聯邦黨人不僅敗於他們論據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前後一致的立場觀點。聯邦黨人對自己的觀點堅信不疑，他們從不猶豫徬徨；而聯邦黨人却總是懷疑自己的觀點是否正確。同時，反聯邦黨人拿不出什麼靈丹妙藥使國家擺脫困境。憲法會議上提出來的三個方案沒有一個是反聯邦黨人提出來的，而聯邦黨人爲美國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選擇的方案。

經驗比理論更重要

如果說聯邦憲法制訂人在很多問題上意見分歧，但是他們在人性 and 政治的目的這樣一些基本問題上意見却是一致的。他們既不是利他主義者，也不是烏托邦主義者。作爲有經驗的政治家，他們知道自己的限度，他們時常意識到他們所代表的人民。

自始至終，在憲法會議上，經驗比理論更起作用。制訂者們充分懂得人類理性之不完善。他們熟知政治藝術，他們似乎自然而然地懷疑理論推理而堅信經驗之作用。狄克生當時曾經說過：「我們必須服從經驗，因爲理性會使我

們誤入歧途。」在劃分行政和立法的權限時，代表們提出了幾個相互矛盾的建議。如果按照理性處理，根本無法判定這些建議的優劣，因爲每個建議對某一地區來說都是再合適不過了，但是對另一地區來說却是不合理的，所以代表們只好憑經驗取舍。

憲法制訂者們比害怕君主制還害怕立法專權。專制制度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現於人類社會，有時候是行政首腦集大權於一身，有時候是立法部門專權。古羅馬歷史證明，作爲個人，議員們是溫文有禮的，但是作爲一個集體，他們是可怕的。不管此論公允與否，事實表明，君主制固然可怕，但立法專權更令人無法容忍。因此，人們有趨向君主制的強烈傾向。人們寧屬有一個暴君而不願有五百個暴君。在國王治下，起碼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再者，侍候一個人總比侍候一群人容易些。

因此，憲法會議拒絕了行政多元化的建議。另外，代表們也考慮到行政效率的問題。他們認爲，行政部門的效率與其組成人員的人數成反比，正如掌舵的人越多，船越容易翻。但是，當問題涉及到立法機構時，情況剛好相反，行政機構需要的是效率，立法機構需要的是智慧。對行政機構來說，政出一門是重要的，而對立法機關來講，多元化是必須的。與行政機構相反，立法機關的作用與其組成人員的人數幾乎成正比。如果有五百位總統，則一事無成；但如果由五百位聰明人組成議會，則可以制訂出更好的法律。

最後，憲法制訂者們並非聖賢，因此他們的想法也不免有自相矛盾處，他們認爲人是天生的叛逆者，但是他們又力求使人擺脫專制政府的壓迫。他們認爲人易趨作惡，但是他們又希望人人能有道德。他們知道人是貪婪的，但

是他們並不反對人擁有財產並獲得更多的財富。總之，他們認為人性有壞的一面，因此必須有政府管轄人們，但是他們同時認為人性也有好的一面，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個民選政府。但是如果人真的不過是禽獸而已，則任何形式的政府也無法拯救他們。

結 論

綜上所述，在導致一七八七年憲法取得成功的因素當中，有三個因素舉足輕重，它們是會議成功的關鍵。

制憲會議取得成功的第一個關鍵因素是憲法制訂人對人性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他們看到人需要約束，同時他們更看到需要約束管理的人。因此他們設計了一套制衡政府的機制。事實上，憲法制訂者在制訂憲法時，花了大量時間討論如何約束那些大權在握的人。正是基於他們的周密設計，美國政府才能夠成爲世界上迄今爲止最穩定、對人民壓制最少的政府。

制憲會議取得成功的第二個要素是合衆國草創時期的社會經濟條件，一七八七年，美國社會基本上由三個階級組成，即土地階級、商人階級和工匠階級，但相對於土地階級來說，其餘兩個階級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甚小，而且這三個階級均有產階級。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費城制憲會議的參加者們能夠求同存異，在關鍵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並把維護私有財產權作爲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對於他們來講，自由並不是和民主相聯繫的，而是同財產與秩序相關聯。他們認爲，在一個自由社會裡，沒有節制的民主弊大於利，沒有節制的民主不但妨礙人們自由發揮自己的天賦

，而且侵犯人們的天賦權利。

憲法制訂成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是制訂者們本身的素質。就我們所知，費城會議的參加人大部分都很年輕。五十五名與會者的平均年齡爲四十三歲，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年齡在三十歲左右，憲法的主要起草人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當時都不過三十歲出頭。作爲年輕的政治活動家，憲法制訂人大都聰明練達，富有創新精神。而且，憲法制訂者們顯示了相當強的和解精神，他們並不糾纏於一般的枝節問題。誠然，和解本身並不能解決當時要解決的一切棘手問題，但是，通過求同存異，把那些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留給後人去解決，却使他們能夠提出一套當時能夠行得通的辦法。

回顧美國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在許多方面，憲法制訂者們都受到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局限。今天，很少有人相信人性是一成不變的，而經濟平等業已成現代美國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在憲法制訂者們留下的政治遺產之中，人們往往只看到聯邦主義，政治多元化和憲政主義，但是這並不是他們留下的全部政治遺產。他們所提出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觀點，他們對憲法的反對意見，他們尋求和解的辦法，他們的容忍精神同樣是他們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

正如富蘭克林在其憲法會議的最後一篇講話中所說，憲法制訂人爲了公衆的利益而拋棄了他們個人之間的意見分歧，這種偉大的和解精神不僅導致憲法制訂人們成功地制訂了美國憲法，而且業已成爲美國政治傳統的一個重要內容，並在當今美國社會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VIP 名人

VIP
ORIENTAL
INC.
旅遊公司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FLUSHING, NY. 11354

特廉機票

↔上海
紐約 ↔北京
↔廣州

美國付錢
中國國內取票

台北·香港·北京·上海

※美國國內各種廉價票，電腦訂位。
※代辦各國簽證，機場接送。

- 巴士旅行團，華盛頓DC，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大西洋城，天天出發。
- 佛州迪斯奈樂園，三天二夜旅行團。

紐約市區遊覽 ● 紐約近郊遊覽

得隴望蜀 好夢終成畫餅
批亢搗虛 謹防捲土重來

一場改革派「初勝」的拳擊賽

——「十三大」傳來的內部新聞

(國內) 曉波

中共的「十三大」落幕了，毫無疑問，在這場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拳擊賽中，改革派取得了「初勝」的戰績。本人通過許多不同的但是消息靈通的可靠渠道，獲得了一些內部新聞，現公諸於衆。

「名落孫山」的鄧力群

鄧力群，是中共的著名「秀才」和「馬列主義權威」，一直負責中共的意識形態工作。他和胡喬木等人，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曾在中國大陸掀起臭名昭著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尤其後者其勢猖獗，導致總書記胡耀邦被黜。保守派元老一直對鄧力群非常賞識，在北戴河會議時，陳雲就主張延期召開「十三大」，並伙同彭真、薄一波、王震、胡喬木，竭力推舉鄧力群進政治局，甚至還有意想讓他當總書記。據說，彭真還單獨找他談過一次話，這次談話的中心，

是告誡鄧力群，在「十三大」前工作要穩，話要少講，並注意和趙紫陽、萬里搞好關係。所以，鄧力群自持有元老的撐腰，進政治局就是鐵定的了。

但沒想到會議一開始就遇到了倒霉事。據一位接近黨代會的秘書處的朋友講：四川宜賓地區有一名來自農村的婦女代表，非要見一見鄧力群。一次小組討論會上，恰巧遇到鄧力群也來參加，這位婦女代表說：「你就是鄧力群？」鄧點點頭。婦女代表爽直地道：「來北京之前，不少人要我不投你的票。」鄧力群頓時顯得非常尷尬，半天才強打笑臉，說：「你是代表，選不選是你的權力。不過做什麼事情要自己判斷，不能受別人的意志左右。」最後，鄧力群又譏笑地問：「你是來自農村的代表吧？」這位婦女代表說：「不錯。但中國有十億人口八億是農民，我要選我們農民信任的人。」鄧說：「你只是你那個選區的代表，不是八億農民的代表。」說完，怕再講下去對己不利

，匆匆離開了。據說自此，鄧力群的情緒一直很低落，並且懷疑是趙紫陽通過四川組搞他的鬼（趙曾任四川省委書記）。事後，四川省代表都對這位婦女的勇敢反應熱烈。這位婦女說：「怕什麼？大不了開除我黨籍，總不會叫我不當農民。」

是否真是趙紫陽做了一些「釜底抽薪」的手腳，筆者沒有確證，但反正是鄧力群落選了。據說這次選舉很有意思，選票最多的是胡耀邦，僅失票十四張，次之才是趙紫陽，失票五十餘張，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對鄧力群投不信任票，胡喬木失票二分之一。當宣佈選舉結果時，全場掌聲雷動。

鄧力群幾乎是最後一分鐘才明白他會落選的，據接近他的人告訴我，他當時臉色很不好看。選舉那天他顯得坐臥不安，一杯茶一杯茶喝個沒完，結果公佈後，他同胡喬木站起來，只是很勉強地把兩隻手掌合了一下，不像其他代表，拍出了熱烈的掌聲。

那時元老們的反應是：陳雲——目光呆定，嘴巴緊閉，始終沒有作聲。

彭真——半天說出一句話：看來，這次黨代表的成份太複雜了！
胡喬木——一臉陰雲，險些兒擠出幾滴眼淚來。

薄一波——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態，他還安慰了鄧力群幾句：不進中央委員會，照樣可以為黨工作嘛！

當年舊景又重現

「新四人幫」——彭真、薄一波、胡喬木

、鄧力群下台的消息，頓時使中國大陸人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自發地放起鞭炮進行慶祝，北京海澱區西洼路科委宿舍鞭炮徹夜未息。其盛況使人想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的情景，在這片慶祝聲中，又一次體現了人民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厭棄的心理。

鄧力群、胡喬木等人的落選，使各地飯館生意猛增。北京市珠市西口的晉陽飯店就分外熱鬧，聚集了很多北京大專院校的教師和新聞界人士，猜拳行令，舉杯歡慶。他們都從自身的遭遇傾訴「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他們的迫害。其中，有一位「人民日報」原編輯部副主任，筆者就親自聽他講過他的事：他曾對「清除精神污染」提出異議



「十三大」結束時鄧小平趾高氣昂

陳雲却垂頭喪氣

，被鄧力群親自定了性，黨內嚴重警告，還被撤消了職務。後來他不服，向上告狀，材料又轉到鄧力群、胡喬木手裡，胡喬木的批示是：「他這樣上竄下跳，無非是要黨組織把他清除！」鄧力群批「同意」，還說：「對這種人不能手軟，爲了純潔黨的組織，有多少清除多少，不然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最後是薄一波一筆定案：「從材料看此人立場反動，有意和黨唱對台戲，等到運動後期嚴肅處理。」這位新聞界名人說：「誰知運動還未到後期，他們就先倒台了，幸甚！幸甚！」

北師大一任年過半百的黨史、哲學老講師，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把兩瓶茅台酒，從五樓窗口灑了下來，一面灑，一面泣不成聲地說：「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原來，他也在「清污」和「反資」中受到衝擊，多次被鄧力群點名。鄧力群說：「北師大有一位講師，利用共產黨的講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人怎麼辦，我說好辦，把他趕下講台就行了嘛。」使這位老講師從一九八三年下半年開始，就沒有講課，被安排在圖書館整理過期報紙。現在得到鄧力群下台的消息，怎麼不欣喜欲狂，他向被邀的客人高舉酒杯，大喊：「來，乾一杯！乾一杯！」

于光遠開門納客

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是這次「反資」被衝擊的主要對象，他的許多新觀點、新理論，對於衝擊僵化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條，都起了不少的作用。胡喬木、鄧力群對他恨之入骨，派人搜集整理了他的黑材料，不僅企圖將他擠出中顧委（他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甚至還準備將他開除出黨。從今

年二月開始，家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八號的于光遠，就閉門拒客，不見任何人了。但于光遠並沒有屈服，他多次在中顧委的生活會上質問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提倡的那些東西，你有沒有認真研究過，要讓他們走，黨就要垮台！」

今年七、八月份，薄、胡、鄧將于光遠的材料報到了北戴河的會議上，意在對他組織處理。幸遇趙紫陽擋駕。趙說：「儘管黨內對于光遠的看法有分歧，但他對理論問題是有研究的，我們應該善於聽取黨內持不同觀點的同志的意見。」據說鄧小平也點了頭，鄧小平選擇了話：「有人向我匯報說，于光遠很硬。不要把理論問題都往政治路綫上扯，于光遠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敢於提出新觀點。」

後來有人說是鄧小平保了于光遠，于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如果你的觀點不正確，經不住實踐考驗和歷史檢驗，任何人說話，也是保不住的。據說這話又讓打了小報告，薄一波氣急敗壞地說：「我就不信中顧委管不了于光遠了，黨內管不了于光遠了！」

現在，胡喬木、鄧力群落選了，于光遠萬分興奮，他對秘書胡冀燕說：「點亮屋內所有的燈，打開大門，我要接待來訪的客人！」

胡績偉為海外報刊說話

被胡喬木、鄧力群陷害而丟了職務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曾對幾位知己說：「我個人認爲『倒胡』（指胡耀邦）不得人心，而『倒胡鄧』（指胡喬木、鄧力群）大得人心。」他還說：「我準備向中央提個建議，對海外報刊要有正確分析，即使像『爭鳴』這樣的雜誌，也不能只罵他反動。不是常有人講：

小罵大幫忙，大罵小幫忙嘛，有些罵，實際上是在幫大忙。我們黨應該什麼意見都能聽，這說明我們黨成熟了。這一次『倒胡倒鄧』，我看海外報刊就幫了大忙。」

趙紫陽話中有玄機

胡喬木、鄧力群落選後，趙紫陽有一講話，他說：鄧力群同志在書記處工作期間，也做了大量工作，把問題都記在鄧力群同志賬上，是不對的。

但趙紫陽沒有解釋，鄧力群做的大量工作，是有益的工作，還是有害的工作。但後面的話很玄妙，把問題不能記在鄧力群身上，就是說，書記處工作有問題，而鄧力群又做了大量工作，他怎麼能逃咎責呢？說出這樣深含玄機的話，真不愧是總書記！

彭真火急攻心

十一月二日下午，趙紫陽會見中外記者。有記者問：鄧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員會，決定重大事情你是否和他商量。趙說：我會向他請教，我認為現在中國領導人中，無論是在職的、退休的，政治經驗和智慧，還沒有一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這話傳到彭真耳裡，他頓時火急攻心，顛簸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講：「我們黨吃個人迷信的虧是有教訓的，一個人的政治經驗和智慧與整個黨是不能比的。」末了，又對工作人員說：「你們把我的話，轉給趙紫陽。」

彭真對「十三大」怨聲連天，多次藉故缺席，躺在家裡唉聲嘆氣。他看了趙紫陽的「講話」，第一個反應是從安樂椅上蹦起來，口吐

髒話：「捧臭腳，捧得真是點上！沒有千百萬人的奮鬥犧牲，他鄧小平一人能打天下？！神話！鬼話！屁話！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還不是軟骨頭！」

不知為什麼，彭真還罵了楊尚昆，說楊尚昆這人不老實，不是個好東西，有奶就是娘！他越說越氣，搞得秘書、警衛都紛紛過來勸他。彭真這才又半閉著眼睛，躺在安樂椅上，嘴裡還不停地叨咕什麼。

沒想到，一個多小時以後，他的這段精彩的牢騷，被一貼身工作人員傳到大會秘書處，大家聽了只是一笑，其中一位熟悉彭真脾氣的人說：彭老爺子就是這脾氣，一覺醒了，氣就消了。這陣他心裡也有他的煩處。……這段趣話不知怎麼讓一位在秘書處採訪的××報青年記者記下來了，才使此段「秘史」得以流傳。

拳擊賽並未結束

我個人的看法，此次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惡鬥，改革派只是「初勝」，真正的終場還未結束。鹿死誰手亦難預料。

保守派的幹將雖然大都下台了，但在這「垂簾聽政」的形勢下，他們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更何況他們已在新生代裡找到了他們的代理人，令人刻意注目的便是未來的總理——李鵬，這一伏筆將可能會造成下一回合的更兇狠的內鬥，我們不妨提高警惕，注目觀察。

正是：
得隴望蜀 好夢終成畫餅
批亢搗虛 謹防捲土重來。



鄭宏惠 醫師

HUNG-HUI CHENG C.A.

Certified Acupuncturist & Herbalist

經歷：文化大學教授，中國醫藥學院教授
中國針灸協會理事及秘書長，行醫四十年

主治內、婦、傷科各種疑難雜症尤對急慢性腰背肌勞損、風濕病、過敏性鼻炎、陽萎、月經不調、子宮肌瘤、乳房腫塊、經痛、更年期綜合症、各種頭痛、面神經癱瘓、胸背腰腿膝疼痛麻痺癱瘓、車禍後遺症、高血壓、胃腸潰瘍等有顯著療效。收費低廉，接受醫療保險

●留學生憑學生証
半價優待
●接收藍十字保險卡
●近BART車站
接受政府醫療卡

天心針灸診所

760 MARKET ST. #718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 788-7866
MON. to SAT.
8:00-9:30AM 6:30-8:00PM

明生堂漢藥房

581 ELLIS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 474-3442
MON. WED. FRI. 10:00AM-6:00PM TUE. THU. SAT. 10:00AM-3:00PM

黃隆參茸藥行

1635 CLEMENT STREET Between 17th & 18th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415) 752-5755 TUE. THU. SAT. 3:30PM-6:00PM



GEORGE REALTY

3825 DEL AMO BLVD., #100
TORRANCE, CA 90503

●豪華住宅
●高級雅房
●合作公寓
●二家庭

- 您將到洛杉磯購屋、買產嗎？
- 您需要熱心負責、誠實、可靠的經紀人嗎？
- 您有親友正要購屋或賣房子嗎？
- 您希望買個物美價廉的新房子嗎？

請找 Kitty 213-679-1105(H)
213-370-8737(O)

天天電腦工作介紹中心

- 您快要獲得電腦學位嗎？
- 您對目前電腦工作待遇不滿嗎？
- 您天天煩惱找不到工作嗎？
- 您希望找個能辦綠卡的工作嗎？

請寄 Resume 到

P.O. BOX 4249 N.J. 08904

TEL. 201-819-7172

中共沒有放棄

武裝攻台的野心

(國內) 許肇時

從這份內部情報可以看出，中共一面大談「一國兩制」，一面却積極籌劃武裝攻台，文一面，武一面，陰一面，陽一面，台灣同胞也

不要天真了……

兩年多前，我在「中國之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號刊登了一篇「近年來鄧小平為封鎖台海所做的武器部署」的文章，報導了中共為攻台所作的各項軍事準備特別是武器方面的準備，後來，我很高興見到中共領導階層並沒有將攻台計劃付諸實施，這當然主要歸功於近年來中共改革派的措施較得民心，國際局勢也較為穩定，使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以及軍頭們無法混水摸魚，將攻台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擋箭牌。但由於去年底國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來，保守派和軍頭們又有逐漸聯合之趨向，因此攻台的事又成為他們的重點議題。

事實上，在中共軍頭看來，攻台只是時間問題，而非實行與否的問題。即使是改革派，他們擔心的也只是攻台行動是否會影響「四化」的進程。長期以來，他們從未放棄過武裝攻台的野心，因此，我以為，現在又到了重新估量中共對攻台作武力準備的時候了。

這兩、三年內，由於經濟開放政策和從西方獲得了不少軍工科技及產品，使中國大陸的軍事工業有了新的發展，而這一發展，依我看來，着重點是為攻台，事實上，據有關方面

的情報，攻台的最新方案業已完成，而近幾年來，解放軍所做的武裝演習，無一不是針對攻台的目標而設計的，如機場攻擊，空權爭奪、登陸、空降、佈雷／掃雷、潛艦攻擊、導彈攻防、空中加油等等。

我在兩年多前的那篇文章裡，談到了中共對武器的外購、仿製和自製的情況，現在再看有何發展：

一、外購武器方面：殲八的改良型將加上新購買的美製電子裝備，此舉已成爲人盡皆知的事實。據說，美方曾經「嚴肅地」告知中共，這一批(五十架)改良型的殲八機只能佈防於中國東北，以對付蘇聯。但美國可能疏忽了，却沒有特別說明不准許該有美製電子設備的飛機駐紮在對岸，再加上殲八改良型與殲八並無明顯區別，這就給了中共以可趁之機，現在誰能確定台海對岸各空軍基地的三百架殲八機裡，沒有混入改良型的殲八機呢？(雖然中共官方稱殲八改良型一九九二年正式服役)

二、武器的自製方面。航空部曾於八四年指令瀋陽發動機廠研製一種新產品——渦噴發動機，並於八八年投產，用來改裝殲七、殲八戰

鬥機。屆時，這二種型號的飛機的兩個主要問題——電子設備及發動機，均將解決。中國大陸的空軍實力將大大加強。

至於第四代殲擊機的發展規劃現正積極進行。原「獺」型飛機的計劃已胎死腹中。該計劃因和以色列合作而宣告破產。其原因是怕與以色列來往過密而招致阿拉伯國家的不悅。

三、武器的仿製方面。我前文曾提到中共由巴基斯坦處獲得法製飛魚飛彈，現該飛彈已大量投入生產。仿製飛魚飛彈被稱爲「八〇一」型飛彈，分爲艦對艦、空對艦及潛對艦多種，尤以潛對艦最令中共軍頭滿意，它於八五年十月在青島水域試射成功，新華社還特別向外發表了消息，昭告世界「中共有了封鎖台灣海峽的利器：水下發射的巡弋導彈」，八六年「八·一」建軍節時，電視上還特別播出了該導彈發射實況的剪輯錄影。

而兵器部試製的紅箭反坦克導彈，則是仿製米蘭，哈特導彈和美式陶式導彈，起初爲少量生產，曾出現過試射時導引線折斷的問題，後來解決了此難點，現已大量生產。

此外，仿製的武器中，還有法國魔術型空對空導彈，穿甲炸彈(見圖1)、蘇式BZ-7運兵車，以及美式M16步槍(見圖2)、美式蜂型無人駕駛飛機(見圖3)以及法式超黃蜂大型運兵直升機(直八)。(過去，我曾誤報直八生產計劃被取消，後來又獲知是因爲該機的生產品被轉移到江西山區，但目前該機還未大批量生產)。

除了以上提到的這些武器經過證實之外，新發展的武器還有：

一、爲了對付台灣海軍兩艘先進潛艇，中共在美國的協助下，加強了反潛設備，如哈爾濱的水轟機上，將裝備美製魚雷、電子設備及

改良型發動機。在直八上裝備法製電子設備。在武漢、葫蘆島製造的潛水艦上，裝備美、意或英國的電子設備。同時，所有水面艦隻的反彈能力亦將加強，如美式反彈火箭已仿製成功，八八年投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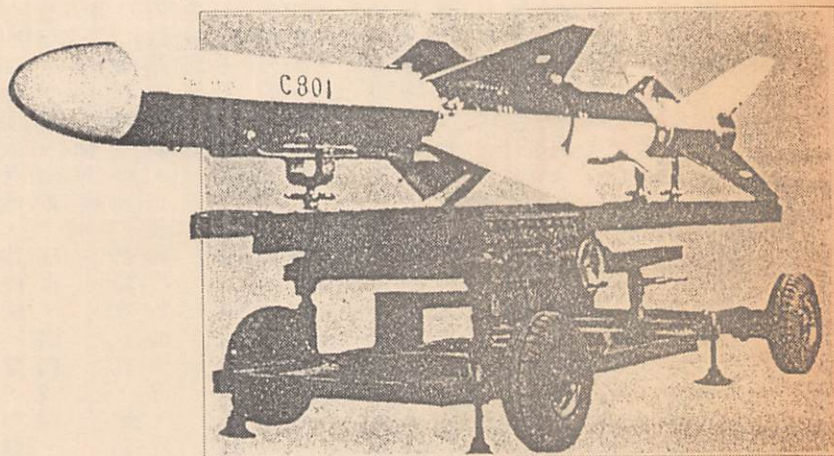
二、爲了對付台灣海軍可能進行的反封鎖作戰，已進一步發展了七〇年代初爲越南海防掃雷而製造的遙控掃雷艇。同時，被當時掃雷獲得的磁性及音響水雷亦被仿製成功，將作爲用飛機式潛艇佈雷的主要武器。

三、爲防範台灣海、空軍可能實施之艦對艦式艦導彈的攻擊，從英國進口了由轟五拖帶之快速靶機，以訓練海軍艦艇的反應速度。初步應用結果，海軍發現預警是存在的主要問題，而且各部門總體合戰能力太差，現正在積極改進中。

四、爲了爭取攻台時空降攻擊前的制空權，目前大陸空軍的練兵比武，都要圍繞此項要求展開。一些殲七的飛行員告訴我，過去粗枝大葉的訓練行不通了。而且指戰員發現，只要飛行員水平相差不多，飛機性能對空戰結果的影響比飛機數目的影響要小得多，這對於未來台海空戰是有重要啓示的。

五、爲了建成突襲台灣軍事、交通設施的目的，強五將加裝英製空中受油設備，由轟六加油。方案之一是由強五在加油之後在台灣東北或西南方向集結，以密集編隊的飛行方式，模倣民航機的船迹，飛到目標後再分散攻擊，如果以關掉一台發動機的情況下飛行，則可省下的油料更多，將保證飛回福建機場降落。

同時外型介於美製鬼怪式與蘇製蘇廿五式之間的新型轟七飛機，亦由西安飛機公司研究成功，預計八八年開始小量生產。該機航程較遠，高低空性能好，適於各種形式的作戰，如



中共仿製法國的飛魚飛彈，改稱C—801型

此飛彈將大大增強封鎖台灣的實力

再裝上電視、激光制導炸彈和雷達、導航系統，其攻擊能力比之轟六并不差。

另外空軍亦由美國進口了三架有測視雷達的噴射飛機，這對從空中偵察台灣海峽活動方便了不少，但中共仍然希望獲得更加先進的預警飛機，據測，加拿大可能是最理想的供應者。

六、爲了訓練更好的殲擊機與直升機飛行員，南昌飛機廠與哈爾濱直升機廠分別被指定在最短時間內借用外國產品研製教練／攻擊兩用載具，一是借用美製的練八噴氣教練機，一是借用法國的羚羊直升機，預計一九九〇年左右開始定型投產。

七、爲了順利達成登陸台灣以及輸送大批

物資人員上岸的任務，中國造船總公司正在研製一種中型氣墊登陸艇，可載兵員兩排人。而且一些新建的集裝箱及滾裝船均在應急時改爲軍用。至於上海、武漢新造的導彈驅逐艦，更有較完備的武裝，另如法製火炮、英製通訊、美製動力，均是勝過台灣現有的海軍軍艦的。而且根據新消息，台灣下一代的海軍驅逐艦將仿製美國海軍在波斯灣被伊拉克發射的飛魚導彈擊中的那種船，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巧合了。

八、爲了給台灣致命的一擊，解放軍的主力陸軍，也毫不落後地向「國防現代化」的路子邁進。首先士兵的步槍將改爲美制小口徑，採用以色列火炮的新坦克，加上仿製或改良的蘇製裝甲車輛、自走火炮，一個機動性較高的野戰軍已初步形成。另外，支援陸軍的中程戰略火箭部隊也試驗成功了由潛艇導彈改型過來的固態火箭，不過因爲導航系統的限制，這些火箭目前尚不精確。

所以從武器發展的情況來看，中共對台灣一直都是磨刀霍霍的。

台灣和大陸的對立，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解開這個死結的唯一辦法，是兩邊政府都應放棄專制獨裁的政體，而用一種開明、擁有民意的政體取代——這就是真正實行民主、自由、人權、多元，只有這樣，才可望使雙方矛盾歸於解化。

目前台灣已開始向這個方向邁進了，大陸也理應如此。希望能引起雙方、特別是中共一方的深思。

我衷心祈望中共領導人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爲重，不要再把中國推向自相殘殺的萬劫不復的深淵，萬一武裝攻台計劃發生，他們將會成爲中國和世界的千古罪人。

中國大陸軍火出口

「一枝獨秀」

(國內) 許擎時

中國大陸在「改革」舉步維艱，外貿換匯生意蕭條冷落之際，唯軍火出口「一枝獨秀」，從而刺激了軍火工業的生產，使它比之其它部門，頗顯得有些「春光獨佔」的味道，爲什麼會造成這種狀況呢？

無疑的，軍火工業滿足了中共的幾個需要，即：

- 一、鞏固政權的需要；
- 二、武裝攻台的需要；
- 三、防備蘇美的需要；
- 四、賺取外匯的需要。

現在又增加了一個需要：比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國在武器出口方面的觀念已經全然改變了，那時的宗旨是「支援世界革命」，以極低的價格甚至無償地送給一些國家自稱毛派（馬列）的共產黨武裝組織，如緬共、菲共等等。而現在，他們已早置這些窮朋友而不顧了。中共的武器出口目前中心是圍繞一個「錢」字，誰出「錢」就賣給誰，至於這些武器出口的結果，他們是置之不顧的。

早已爲人所知的是波斯灣兩交戰國的武器出售，尤以對伊朗的蠶式導彈的出售，使波斯灣的局勢變得更加緊張，爲此已嚴重影響到中

國大陸和美國的關係，目前美國派國務院次卿訪問中國大陸，專就蠶式導彈進行協商，但中國大陸政府仍和過去一樣，堅口否認出售武器給伊朗，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無賴行徑，真是貽笑大方了。

據我所知，伊朗軍售的大門是楊得志之子楊國兵、楊國軍打開的，他們在高幹子女中就到處宣揚過，說他們有先見之明，在一九八三年他們就和伊朗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利用波斯灣局勢搞軍售，使中共賺取了上百億人民幣的外匯，而參與軍售的牽頭人物（多係高幹子弟），也從中撈取了不少的「油水」。伊朗把中國大陸看成武器供應的唯一和可靠的伙伴，據說現在又將有一批交易，即伊朗提供過去美國賣給他們的先進裝備，交換中共的先進武器，即以伊朗的美製反潛飛機、戰鬥機、氣熱船來交換中國大陸的水雷、導彈和坦克。

除此以外，中國大陸目前還向阿根廷出口飛魚飛彈零件，向阿富汗穆斯林游擊隊出口單人對空、對地小武器，向以色列出口蘇製武器零件，向埃及出口潛水艇、驅逐艦及殲擊機，向孟加拉和斯里蘭卡出口快艇，向巴基斯坦出口殲擊機、坦克、軍火工廠、維修廠、導彈及原子彈技術，即使是南非這樣種族主義極端嚴

重的國家，向中共購買鈾提煉技術，中共也毫不拒絕。

中國大陸的軍火出口就是在中共領導層，也是有爭議的，有一些頗有遠見的人，認爲用軍火賺取外匯是萬不得已的做法，不能長期這樣下去，否則，一是會造成國際上的反感，二是洩露了國家的實力，這對日後武裝攻台或防備蘇美均爲不利。

但可惜的是「錢」的誘惑終究更大，中共的軍火商們，嘗到了一次甜頭，就像染上鴉片嗜好一樣，已變得一發不可收了。

中國的軍火出口還將更加「生機勃勃」地向前發展。



伊朗使用中共坦克修理車

民主縱橫談之八：

醫生難治自身病

——從援助尼游案看制衡原則

王炳章

放射科甲醫生，天天都給病人照X光，看別人的肺部有沒有問題。一天，甲醫生帶領醫學生實習，自己站到了螢光屏後面，做爲「模特兒」，讓學生們觀看自己「正常」的肺部。他的一位放射科同事乙醫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螢光屏上顯現的，並不是「正常」的肺臟，而是一個生有癌瘤的肺臟。乙醫生摸了摸甲醫生的頸部，發現淋巴結已經腫大，說明腫瘤已經轉移，到了晚期。

外科丙醫生，平時喜歡逞能。他不信「醫生不要給自己治病」的「教條」，有病打針時，他不求女護士，總是自己給自己扎。一次，挖防空洞時（大陸人民曾「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挖防空洞），腳部被砸了一個大裂口，骨頭外露，鮮血直流，需要緊急清創縫合。這種小手術，平常對丙醫生來說，簡直就像一碟小菜。女護士激他：「我給你打麻藥，當下手，你自己做自己的手術吧，你不是喜歡逞能嗎？」可是，這回，丙醫生服輸了，他請急診室醫生替他處理了傷口。他不是不會處理，而是面對自己血淋淋的傷口，他下不了刀子和剪子。上面第一個故事說明，自己身上的病，往往自己察覺不到。其實，這是常理：臉上有髒，衣扣沒有扣上，走路姿勢不好看……，往往都是別人、而且是好心人指出的。

第二個故事說明，即使你發覺了自己身上有病，也難以自己去醫治。因爲，你下不了手，儘管你知道非下手不可。

這兩個故事表明了一個道理：自己的問題通常是靠他人發現，他人糾正的。這是監督和制衡的一種表現形式。

今年，監督與制衡原理在美國政治上的最佳體現，是援助尼加拉瓜游擊隊案的處理。

里根政府的官員在該案中觸犯了法律：他們挪用了軍售伊朗獲得的利潤，把它撥給了尼加拉瓜游擊隊。這與一九八四年國會波蘭德修正案相抵觸，該修正案規定，在兩年之內，美國官方不得向尼游提供此類援助。

在這裡，我並不想考證里根總統本人及其政府官員在該案中的涉入程度，我只想比較一下司法部、國會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對調查該案的態度及對調查結果的評估，藉以說明監督與制衡的功用。

對於該案，里根政府的司法部曾經主持一項調查。國會反對黨議員抨擊司法部的調查乃有意爲里根總統保駕。因米斯的調查拖拖拉拉，使得國安會官員諾斯和他的秘書贏得充分時間銷燬文件。憑心而論，司法部長米斯這種態度是易於理解的。米斯是里根總統任命的內閣官員，如果米斯觸犯了老板的根本利益，他可能落得炒魷魚的下場。

在以井上參議員（民主黨）爲首的國會「伊朗—尼游事件調查委員會」發表正式報告的前一天，該委員會共和黨議員發佈了一份文件，爲里根開脫責任，以維持總統形象。國會雖然在政治上是獨立於白宮的機構，但其共和黨

議員與里根却屬同一黨派，從維護本黨的利益出發，共和黨議員維護里根形象是自然的。

最後，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民主黨參議員井上，代表國會調查委員會，發佈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除清楚地指明里根政府官員觸犯了法律外，還指出，里根總統犯了失職的錯誤，未克盡憲法的職責。井上參議員屬於民主黨，他主持調查，較少顧及顏面和個人利害，從而可對里根的行政機構起到真正的監督、制衡作用。

里根的共和黨做爲一個機體，對其自身的毛病（下級官方違法）未能及時察覺，事發之後，也難以毫不留情地予以糾正和檢討。此乃「醫生難治自身病」也。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及時的「一刀」，對里根政府來說，雖有點疼，但祛除了里根政府的病患。這「一刀」，於己、於彼、於國、於民，都是有利的。

我們中國人應當慚愧地承認，在政治上，在治理國家上，我們尚未理解和學會監督與制衡的原理。

就拿北京政府設立國家監察部來說吧，它是不能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的。監察部長由國務院總理提名，人大常委會批准。試問：如果國務院總理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違法亂紀，監察部長將採取如何態度呢？例如，彭真訪日時挪用公款辦了很多私事，對此，國家監察部就毫無監察功能。

因此，如果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的司法權力、沒有新聞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監督與制衡。

中共十三大通過了所謂政治改革方案，非常失望的是，該方案對政治制衡原理緘口不提。共產黨清除不了自己的瘡癩，又拒絕別人給它醫治，結局只能是向膏肓潰爛下去。

在溫馨懷抱的背後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梁堅

有關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一事，現在成了國內的熱門話題，圍繞這一中心，大陸報刊每日都有熱情洋溢的文章，電台常常播出娓娓動聽的廣播，政府也頒佈了各項優待的規定……使人感到，那片令人神往的大地，正伸開她溫馨的懷抱，急切地期盼着台灣骨肉同胞的歸來。

仲秋時節，筆者由海外去大陸探親旅遊，有幸分別會晤了「台聯」和「中旅社」任職的兩位至交好友，話題自然離不開關於台胞歸鄉探親的事。未曾料到，在他們這些「知情者」口中，却得悉了許多與官方宣傳消息完全相違的一些「珍聞」。筆者本着「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的精神，將這些談話內容整理成文字，公諸於衆，以期世人能對情況有個較全面的瞭解。

台胞探親 困難重重

儘管大陸官方一再聲稱，熱烈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探親，千方百計為台胞創造有利條件，但實際上一切準備工作並不充分。自十月初以來，統戰部門和有關業務部門、旅遊部門等

單位，一再開會，統一思想，研究方案，制定措施，但始終難以清除消極的情緒。

例如：國家規定台胞到大陸探親，一律享受「內賓」待遇，所以，一些收慣了「外賓」高額外匯的飯店、旅遊店都紛紛表示「沒有力量」或乾脆拒絕接待台胞。十月中旬，北京旅遊局曾召開北京市所屬飯店經理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有關接待台胞的指示精神。過去以接待香港同胞為重點的宣武門飯店當場表示：沒有力量接待台灣來客，如果一定要接待，就必須收取外匯價格。地處西珠市口的惠中飯店，也表示拒絕接待台灣同胞。此外，上海、南京、鄭州、西安和青島等地的大部份賓館、飯店都以種種藉口為由，提出不能接待台胞。目前，只有地處台灣海峽沿岸的福建省、廣東省消極反映低些，因為中央對這些省份有專門的指示精神，一旦踏上大陸之後，不一定會如想像中的那樣一帆風順吧。

抵觸情緒 遍及城鄉

十月十九日，新華社一份「內參」轉發了國家旅遊局的有關「情況綜述」。「綜述」舉

例分析了產生消極抵觸情緒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對中央目前的對台政策不理解。認

為中央擺出的架勢是討好蔣經國、討好台灣同胞。北京市惠中飯店一位業務經理就說：「我過去在福建當兵，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五十年代是用大炮轟，六十年代是用煙酒攻（指向金、馬、台澎空飄煙酒宣傳品），七十年代講「三通」，八十年代開門歡迎。過去有台灣關係的，算是階級異己份子，如今成了爺爺。老百姓看，鄧小平比蔣經國至少矮三層！」河北省邯鄲地區大名縣河壩堤鄉，有一個民兵連長，看到過去被他「專政」過的一位台屬，近日來喜氣洋洋，縣、鄉的領導又是登門拜訪，又是送禮，所以心裡十分不舒服，於是他尋衅挑事。國慶節下午，他藉着幾杯酒遮臉，突然揸着槍，帶着民兵，闖進那位台屬家中，威脅說：「你不要高興太早了，老子只要不死，早晚有一天還要給你戴高帽，牽着你遊街！」

其二，內地基層領導和群眾普遍存在自卑感。認為這些年台灣經濟發展了，大陸落後於台灣，與其讓台灣人回來看，不如不讓回來，免得面上無光。河南省鄭州郊區有一位年近八十歲的老人，歷來是村裡的照顧戶，生活相當貧困。他有兩個親弟弟和一位堂弟在台灣，最近接到弟弟來信，提出要回家看看。這位老人接信後，找到市統戰部門和對台辦公室，他說：「我不見他們，人家在外面混的像個人似的，我這算啥？別讓我現眼了！」市裡怎麼做工作，老人硬是不願意，他恐怕弟弟真回來，索性躲到嫁到平頂山市的閩女家去了。

其三，「綜述」分析，儘管天天講統一，講三通，但上面說破嘴，而基層工作却沒有做好，基層幹部和群眾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有不少縣城和農村的牆壁上，至今還寫着「我們

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大標語。中央統戰部和對台辦最近電話通知各地，組成領導小組突擊進行檢查，各地區，特別是偏僻鄉鎮，要立即清除這些過時標語，換上「熱烈歡迎台胞歸來！」等口號。

乘機撈肥 橫敲竹槓

由於接待台胞，對台工作現在成了一項重要任務，所以，不少基層幹部以至地縣幹部，都認為對台工作是件美差，爭着往裡鑽。過去縣級對台辦公室一般只設正、副主任一名和一名幹事。現在由於工作需要，縣和地區對台辦紛紛增加編制。爲了擠進對台辦，許多人走「後門」，送禮；而更多的是縣長或縣委書記兼任對台辦公室主任。洛陽地區有一個縣，經過擴編的縣對台辦公室，主任由縣長兼任、副主任由原縣婦聯主任（縣委書記的夫人）兼任，增加的五名幹事全部是副縣長、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縣政協主席的三親六故。爲了擠進縣對台辦，一名縣的團委副書記，寧可丟官，而去縣對台辦當了打字員。這個縣還做出規定，從十月份開始，縣對台辦的工作人員，每人每天補助夜餐費六角、交通磨損費三角、筆、紙消耗費一角，巧立名目共計每人每天獲得補助費一元人民幣。儘管洛陽市委對這個縣的做法提出了通報批評，但此種現象不僅在基層十分普遍，而且尚有擴大的趨勢。

山東省煙台地區有一個縣，曾以辦學習班爲名，招待全縣台屬大喝五天，全縣所有機關全部停止辦公，人員都參加了學習班。縣委書記、縣長的親友也冒名參加學習班，陪同大吃大喝並每人分到一份厚禮。當地群眾反映說：「現在真是牛鬼蛇神鬧翻天了，台灣份子有什

麼了不起！」造成了對立情緒。

中秋節時，北京市對台辦，爲部份台屬舉行一次中秋招待會，出席招待會的各界台屬代表共五十五名，但工作人員却有七十多人，招待會準備的可口可樂飲料多達一百五十箱，而實際消費不足五十箱，剩餘的一百多箱全被工作人員私分了，僅對台辦副主任一個人就搬回家六箱。

目前，各級對台辦和統戰部門，利用「對台工作」這塊招牌，營私舞弊、損公肥己、貪污盜竊的不法行爲，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現在，只要一說：「這是對台工作的需要。」要錢批錢，要物有物，誰敢阻攔，就可能被扣上「干擾對台工作」的大帽子。使得一些基層領導在對台工作方面產生了爲難情緒，以致使不少單位用於對台工作的開支都是一筆糊塗帳。北京市東城區進行財務大檢查時，發現該區用於對台工作的開支大大超支。對台辦以「對台工作性質特殊」爲由與檢查組發生爭執。最後主管對台工作的副區長和一名副書記，出來爲對台辦打圓場，說：「支出是超了些，可肥水也沒外流，台胞、台屬多吃一些，多喝一些，有利於統一大業，有什麼問題區委承擔了。」

「情況綜述」還講到，河南、河北、山東等地一些縣委領導，片面理解中央有關精神，借「對台工作」爲名，紛紛提出擴建招待所，要求購置小轎車。僅河南省開封地區，各縣提出要車總數就達一百四十五輛之多，比全地區現有小轎車的總數還高兩倍。

更爲有趣的是，內地有少數基層幹部和台屬，竟想借台胞歸來探親之機，橫敲竹槓，舉例道來，不禁令人可嘆。河北省邢台縣爲全縣台屬提出經濟指標：凡有自台灣探親回來者，必須向鄉政府和縣政府各捐款五百元和一千元

人民幣，美其名爲資助家鄉教育事業。如果超額完成任務者，每增捐一百元，台屬可提成百分之二十，這樣的「捐款承包」土政策，真使人哭笑不得。

還有的未待台灣親人歸來，家中聞訊便發生爭吵，鬧分家甚至出現動武的情況。河南省開封地區大柳樹村，哥三個由於準備接待從台灣回家探親的父親，牽涉到可能面臨的財物分配問題，言語不和，竟大打出手。老二被老大毆傷住了院，老三將老大的房子放了一把火（所幸發現及時，火被撲滅），年邁的母親被氣

台胞們一窩蜂地返鄉探親
是否會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得昏死過去，醒來以後哭着說：「我就只當他（指在台的老伴）死在外頭了，回來幹啥？還沒回來哥三就鬧翻了，往後我這日子可怎麼過。」據說此類現象在一些貧困鄉村時有發生。

台屬身價 日增百倍

隨着台胞歸鄉探親信息的傳來，以及對台工作的重視與加強，中國大陸台屬的地位、身價也與日俱增。

河北省豐寧地區有一戶台屬，由於過去被列為階級異己份子，打成牛鬼蛇神，全家在村裡低聲下氣，兩個兒子，小的都已四十多歲，一直沒有成親。最近，地區通報他家有三位親屬在台灣。並且有一位在台南市頗有實力，被列為重點統戰對象。於是，這戶台屬頓時地位大變，身價倍增。整日出入這家的人絡繹不絕，縣婦聯主任、鄉長都紛紛登門為兩個兒子說媒。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最近親自帶着自己的三個女兒（最小的僅十九歲），登門求親，請這家隨便挑，相中哪個嫁哪個。當地群眾對此舉非常反感，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乘坐的小麪包車停在村頭，不知被誰給推翻到溝裡，縣公安局以破壞治安為名，連夜派出刑警隊到該鄉進行調查，拘捕了六人。憤怒的農民第二天衝進縣委大院，又衝進縣公安局要求放人，地區怕事態擴大，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至今沒有結果。

山東省煙台地區某縣，在宴請台屬的招待會上，有一位台屬去找縣長，要求縣裡幫他蓋房，如果不答應他的要求，等他侄子回來就不為縣裡說好話。縣長顧慮後果和影響，馬上派人送料為他蓋新房。

笑臉背後 寒氣森森

知情的朋友告訴筆者：儘管官方的宣傳，天天在報導歡迎台胞歸來探親的消息，並做出與台灣當局言和的姿態，但最近發到軍隊基層連隊的宣傳材料，仍然是大講「提高警惕，不忘備戰，解放台灣」。總政宣傳部最近編發的一份時事政治宣傳材料中寫道：「台灣同胞掙扎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苦難中，解放台灣是每一個子弟兵的光榮戰鬥任務，台灣反動當局越是搞什麼解禁、放寬把戲，革命戰士越是要緊緊牢握手中槍。」不是知情者的透露，真讓人難以相信，如今在迎向台胞笑臉的背後，竟然保留着那副五、六十年代寒氣森森的老面孔。

最近，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分別提出：要嚴防國民黨特務。動員全民防奸防特。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局，對全區台屬做了分類排除，對重點可疑戶，要求居民委員會予以特別注意。凡經常有較多外匯收入者，郵政局都定期向公安局通報，以便監視。

家住北京西城區白塔寺附近的一位徐姓中年知識份子台屬，晚間經常收聽台灣廣播，被居委會的「事兒媽」向派出所報告了。於是徐某便三番五次被傳訊，公安方面一定要他交待是一個人聽，還是有意組織其他人共同聽。當他第四次被傳訊時，他把八波段短波收音機搬到派出所，說：「這是去年單位評我先進工作者時發的獎品，今天我送給你們了！」說完端起來，咔嚓一聲摔在地上。此後，徐某每晚八點鐘都要打開錄音機，專門播放「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歌曲。由於聲音太大，吵得四鄰不得休息。當居委會登門提出意見時，徐說：「這可是革命歌曲，誰不願聽，是立場、態度問題。我就是有意讓大家聽，除非公安局再傳訊我！」



又一家

China D'Lite Restaurant

環境清靜 · 交通便利 · 免費停車

14107 ST. GERMAINE DR.
CENTERVILLE, VA
TEL: (703) 830-6565

誠徵：週末兼職打雜工近馬大
意者請電 953-8766

14005 LEE JACKSON HIGHWAY
CHANTILY VA
TEL: (703) 631-4512

14252 BALTIMORE AVENUE
LAUREL LAKES CENTRE
LAUREL, MD 20707
(NEXT TO CINEMA 8)
TEL: (301) 490-8111
OR (301) 490-8112

「義士」何必曰利

(台灣留學生·美國) 郭斌

駕機赴台的中共空軍飛行員劉志遠



據聞，十一月十九日，又一架由中共空軍飛行員劉志遠駕駛的米格十九戰機，趁執行飛行任務之機，調轉機頭，飛往台灣，向國民黨政府投誠。這是中共空軍飛行員駕機投奔台灣的第十三次，直接飛抵台灣的第六次，餘者七次都是先達韓國，而輾轉來台。

按台灣政府的有關規定，劉志遠將會得到五千兩黃金(約合美金二百萬元)的獎賞。

對此，我倒有一番感慨。
誠如劉志遠本人所說的：這次他駕機冒着生命危險投奔自由，沒有其他企圖，也不是追求私人利益，唯一的動機是對中共政權的腐敗和黑暗徹底絕望。

劉志遠所言極是。確實，中共自據大陸近四十年，天災人禍，內鬪不休，將人民推進了水深火熱的深淵，自鄧小平掌權以來，雖竭力挽大廈之將傾，搞所謂的「改革」，但由於共產黨本身的性質所決定，使他不得不受縛於「四個堅持」，致使「改革」成效不彰，百病叢生。可以說，現在的大陸，不僅是一般百姓，就連軍隊、幹部、乃至高幹，都對共產黨發生了程度不同的「信心危機」，劉志遠的來投就是證明。從這一點講，劉志遠稱為「義士」是當之無愧的。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無論是台灣政府或是中共政權，為了引誘、瓦解對方的軍力，對雙方的飛行員都採取了「重金贖買」的政策，一架飛機過來了，都一律賞以黃金。這種「誘以利」的辦法，我認為極為不妥。

義士投奔，乃出於拯救國家拯救民族的正義感，為此即便捨身成仁，也在所不辭，其高風亮節，必定永垂青史，傳誦古今。但如果蒙

上一層黃金色彩，就很難讓人區分，此士到底是為「財」而來，還是為「義」而來，如孟子所說：「義，何必曰利」，一旦摻雜了「利」的成分，「義」就要打折扣了，無形當中，也就失去了「義士」的光彩。

更何況此次劉志遠來奔的前後，先後發生了兩樁事件：一是台灣政府拒絕簽發梁文茜之女兒梁文茜的奔喪入境的簽證；二是一些原國民黨老兵衣食無著，向政府示威抗議。更何況自大陸探親開放以來，因貧困而無力籌集經費的老兵大有人在，為此，台灣政府却不聞不問。

以梁文茜比之劉志遠，梁文茜奔喪更有符合人道之理由；以老兵比之劉志遠，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老兵都更有功於國民黨，但梁文茜和老兵均受到冷落，而唯獨對劉志遠慷慨解囊，動則五千兩黃金，這種不公平，不能不讓身為台灣公民的我深感痛心。

為何台灣政府對劉志遠分外垂青呢？說到底，還是那架飛機，假如劉志遠隻身來投，我相信台灣政府絕對不會讓他入境，正如前段時間，一位大陸梧州市文工團的演員，搭乘香港輪船來投台灣一樣，台灣也把他趕走了。

說到底，還是個「利」。——台灣政府是一個以「利」取人的政府。

這一點，台灣政府是不是應該反省一下，而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加以改進呢？

溫元凱打出一張「牌」

(大陸留學生·美國) 莊夢蝶

●兩岸風雲●

最近，中國大陸著名學者、教授和改革家溫元凱，投書香港「新報」，公開向中國大陸政府與台灣政府遞交了一份申請書，該申請書稱

：「本人叔父溫祖培，去台四十年，未曾見過一面……雙方思念之苦，實難為外人知。他本可以回大陸探親，但對一個七十歲高齡的老人

而言，又不忍見他舟車勞頓之苦。所以，我作爲一個晚輩應該去探望他。」同時，作爲一個教授，溫元凱也希望到台灣大學講學。溫元凱並作了如下保證：「我將以作一個中國人的原則去講應該講的話，我不會因爲終要回大陸而諸多顧忌，也不會在台搞統戰，重視科學，關心社會才是我的本份。」並聲明「我必須回大陸，也一定會回來。」

確實，大陸和台灣隔絕已近四十年，兩黨

●兩岸風雲●

文學大師梁實秋病逝台北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王秀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上午，文學大師梁實秋先生因心肌梗塞症病逝台北，終年八十六歲，可稱高壽。

梁實秋先生著作終身，其文學生涯包括文學批評、散文、翻譯、編纂字典和編教科書等領域。梁實秋先生的文學地位，早已爲海內外學人所公認。

然在中國大陸所出版的各種新文學史上，梁實秋並未得到與其文學成就相稱的評價。在大陸高校的新文學史料中，梁實秋這個名字或被隱去不提，或以一二句話帶過；原因無它，蓋源於三十年代初期的那一場著名論戰。

當時，由於反對「文學的階級性」和「硬譯」，梁實秋等新月派作家與魯迅展開論戰，從而成爲左翼作家的公敵。他本人並被雜文大師魯迅斥之爲「乏走狗」（而且是「喪家的」！）。

如此，當魯迅在新中國的官方宣傳中被捧

之爭，造成無數家庭被拆散，人民飽受別離之苦，這是一件非常不人道而且悲慘的事情。現在台灣政府棋先一着，主動開放了台灣人民向大陸的探親，「來而不往，非禮也！」大陸人民對向台灣的探親也應該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

我衷心希望溫元凱教授的申請能得到大陸政府和台灣政府的批准。

「台灣結」和「大陸結」的打開，首先是

上九霄的時候，梁實秋便很自然地被打入了冷宮。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隨同國府去台灣，更是被順理成章地歸入「反動文人」一類。在政治第一的標準下，梁實秋先生被忽略了幾近三十年。

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大陸的文藝政策出現了鬆動。而後隨着對台統戰攻勢的不斷高漲，梁實秋的作品也和其「新月派」文友胡適之、徐志摩等人的著作一道解禁。尤有諷刺意味的是，梁著「雅舍小品選」一書，竟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出版，真可謂世道大變。

順便說說，與此同時，原先神聖不可侵犯的「僅次於上帝的人」——魯迅，則遭到若干後生小子的亂箭攻擊，其洋洋大觀的著作亦被貶稱爲「魯貨」了。

梁實秋先生畢生耕耘於文圃，曾以獨到之譯筆將「莎士比亞全集」譯爲中文，造福於莎

「通」，只有「通」，才有瞭解，才有對比，才有選擇，我想兩邊政府都不應阻擋這一潮流，做真正的「促通派」。

溫元凱現在打出了一張牌，這張牌不是「中共牌」，也不是「統戰牌」，而是「人民牌」，一張牌代表了十億多中國人民的心願，現在，且讓我們拭目以待，看大陸政府和台灣政府如何爲之？

學研究者和廣大讀者。同時，他還寫下了大量內容形式兩皆出色的散文，膾炙人口。「雅舍小品」自一九四九年初版至今，已行銷了近五十版，可見其受到讀者歡迎之程度。

由於政治原因，台海阻隔了兩岸文化界的交流，以致文革期間，梁實秋誤信了謝冰心、吳文藻夫婦不堪紅衛兵迫害服毒自殺的謠言，在「傳記文學」上發表了「憶冰心」的悼文。事後，梁實秋得知冰心夫婦尚在人間，不禁啞然失笑。

而今，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梁實秋先生若不是走得匆促，亦可前往潤別三十八年的故地探親（其長女尚在大陸）、訪友、講學。然死神破壞了美好的事情，梁實秋先生雖享高年，仍是死非其時！

梁實秋先生之死還用給了台灣當局一個政治難題——其長女梁文茜要求自大陸赴台奔喪。當此台灣居民扶老携幼前往大陸探親之際，梁文茜的合理要求如蒙批准，將是大陸居民赴台辦理私人事務的第一例。但最後台灣當局寧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人道主義原則，而拒絕了梁文茜的申請。使人不得不爲台灣當局這種腐朽、昏庸、殘忍的作法大搖其頭。

要文鬥·不要武鬥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劉小梅

據台灣「自立晚報」報導，台灣民主進步黨二全大會於十一月九日中午爆發激烈衝突。

二全大會召開至十二點十五分，進行報告事項討論時，因會場有人散發「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書，導致朱高正的不滿，他當場大聲抗議，要求黨務維持中立。

朱高正表示，如果開會時有人任意散發傳單，開會秩序將受破壞。主席江鵬堅因而請秩



朱高正是會議爭執的焦點人物

序組維持秩序，將散發刊物收回。

此時，鄭南榕突與朱高正發生衝突。鄭行至朱面前重擱其一記耳光，而朱高正則用椅子還擊，砸到鄭的頭部，當場血流滿面。在場人員立即將兩人隔開，並將鄭南榕送往醫院。

看到這則消息，我深為民進黨的兩位武鬥勇士感到遺憾。

朱高正這位留德博士，近期在立法院頻頻大出風頭，成為搶佔要聞版的新聞人物，並非由於其對於國勢時局的灼見真知，而是因其挑起武鬥的本領。

須知，這位朱高正博士年方三十二歲，較之立法院內那些七老八十的朽翁來，自然在拳頭和膂力方面穩居上風。他只動一動手，便令國民黨老翁吃不消……況且，這朱博士還是文武全才，雖然沒有三寸不爛之舌，却是罵娘的好手！看看他那娘天娘地的演講稿，真令豬八戒也要汗顏！

然而，強中更有強中手。在立法院以拳腳打出八面威風的朱高正，在本黨會議上受到強硬的挑戰——被鄭南榕先生重擱一記耳光！

原先，人們以為朱高正博士之所以愛「民拳」勝過「民權」，是出於對國民黨統治的刻骨仇恨。現在看來未必如此——他們習以為常地運用武鬥手段來解決黨外糾紛、黨內爭執：

當時間老人已把我們帶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朱高正博士等人却還慣於使用拳擊家、角

力師的辦法來從事政治鬭爭，這未免太使人失望了。

另據報導，在民主進步黨第二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黨主席江鵬堅先生致詞勉勵全黨同志「習於養氣，善於用氣」，他指的是政治人物所應具有的決決正氣。此外，民進黨中評委主任委員郭吉仁在報告中指出，該黨建黨至今處理兩件黨員違紀案件，計有八人受停權處分，八人受公開譴責處分。

郭吉仁認為，民進黨的黨紀要求應較歐洲政黨嚴格，藉其道德形象與對社會之前瞻性藍圖提示社會動員能力、強化黨員抗議意志。

我覺得上述江、郭二位先生所言極是。盼請江主席以諄諄之言告誡朱高正、鄭南榕之流，若彼輩不肯循規蹈矩，則繩之以黨紀也！



寶慶大飯店 THREE PALM

CHINESE RESTAURANT
"Authentic Polynesian Cuisine"

2500 Columbia Pike
Arlington, Virginia 22204
(703) 920-2661



三友大飯店

(301)
662-6171

177A THOMAS JOHNSON DR., FREDERICK, MD 21701

編者按：這是一篇由藏族同胞所寫的、難得一見的文章。文中平實的敘述了漢藏兩族人民的歷史和現在。作者悲天憫人的胸懷在文中表露無遺。
 本文原載於美洲中報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及三十一日。讀者們看了此文有何感想，請來信編輯部討論。

西藏暴亂的背後！

阿沛·晉美
 (Jigme Ngagpo)

✓ 作者是西藏人，現為留美學生，他在本文中透露西藏一些從未為外界所知的內幕。

最近，西藏發生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遊行、示威和流血衝突，引起了世人的矚目。現在，事態雖未見繼續擴大，但是看來並未完全結束。

外界對西藏在這個時候發生「反對中國佔領」和「爭取西藏獨立」的示威遊行感到意外，許多人還斷言這是一九五九年以來的頭一次大規模「反華行動」。海外華僑和美籍華人也一定會對此感到吃驚，因為在很多人看來，中國政府雖然有過許許多多不可寬恕的缺點錯誤甚至「罪行」，如「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但唯獨在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是清白的，是正確的，是頗有政績的，外界所熟知的文革中對西藏的破壞只是文革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非專門針對西藏。例如前些日子「中報」刊登的一位女作家陳若曦的談話，說在對待西藏問題上，「中共政權是中國歷代政權中『最天真』的一個」。還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在議論，「要搞獨立？就得狠狠地鎮壓！」

不能再開殺戒高壓

筆者是個西藏人，但是在北京等地學習和工作多年，是個典型的「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在「祖國的懷抱裡，喝著共產黨的奶水」長大的新一代西藏人。我本來不願意公開在報刊上發表看法，考慮到個人的前途、背景、家庭（我的父母親都是西藏的「著名愛國人士」），尤其不願意在國外報刊上公開發表不同於中國政府立場的觀點和看法。但是最近的事件同樣震動了我，尤其是在中國政府開始驅逐外國記者和普通旅客，以及中國領導人開始談論「嚴厲法辦」、「深挖內部根子」時，使我感覺到這是一種危險的信號。

作為一個西藏人，我有責任向廣大讀者，尤其是向海外華僑、美籍華人、中國留學生（包括大陸、台灣）等介紹一些我所瞭解的有關西藏的實際情況和背景材料，至少是讓讀者多

聽到一種不同意見。同時，我也真誠地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冷靜、克制，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耐心、認真地多聽一聽各種不同的意見，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必須首先做到一條：再也不能大開殺戒，再也不能實行高壓政策了。

今年以來，西藏在世界政治事務中屢次引起人們的注意。

首先，今年年初，在中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著名作家劉心武因在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家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受到停職檢查的處分。這篇小說據說因為「侮辱藏族同胞」而受到在北京學習的西藏學生的反對。

四月份，美國作家約翰·艾夫登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譴責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在西藏實行近乎「種族滅絕」的政策，聲稱西藏人直接地死於中國的「佔領」、「監禁」、「勞改」，包括自殺、餓死、凍死者共高

達一百萬。現在，隨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政策，又在西藏實行一項新的「最後解決辦法」——大量移民，實行漢化。

五月份，美國國會衆院召開有關西藏人權問題的意見聽證會；六月份，美國國會衆院通過兩項修正案，其中一項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的議案，這一舉動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

六月份，美國前總統卡特訪問西藏，在拉薩會見班禪喇嘛，並邀請他訪問美國，卡特從西藏返回北京後，和鄧小平主任討論西藏問題。

七月份，西德總理科爾訪問西藏，在拉薩提出西德要幫助西藏進行經濟建設。科爾的訪問在聯邦德國引起一陣議論，有人對他訪問西藏是否明智提出疑問，因為這樣做就等於「默許中國在西藏的所做所爲」。他的訪問同時引起西德要在西藏貯存核廢料的傳聞。

今年整個夏季，中印兩國在西藏內外增兵、演習，雙方對立局勢逐步升級，一時間邊境形勢極爲緊張，大規模的邊界衝突似有一觸即發之勢，後因兩國領導人的克制，才未釀成又一次大規模的邊境衝突。

九月份，達賴喇嘛訪問美國，在美國會人權問題小組上發表講話，並提出一項「五點建議」。

九月廿七日，拉薩爆發小規模的「爭取西藏獨立」的示威遊行，遊行者被逮捕，導致隨後的一系列大規模抗議示威和流血、傷亡事件；

十月六日美國參院以九十八比〇的壓倒優勢一致通過了譴責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的決議案，此舉招致中國政府的極其強烈的抗議。

從上述事件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兩個結

論：一、西藏再也不是與世隔絕的「香格里拉」，世界在注視着西藏，西藏也必須面對世界；二、所謂的「西藏問題」並未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它仍然存在，而且一有機會就要爆發出來，每次爆發，又都是以暴力的形式，結局也是以大規模的暴力鎮壓而告一段落，每一次大規模鎮壓的結果，是表面上控制了局勢，平熄了叛亂，實際上又加深了民族矛盾，擴大了中國政府與西藏人民之間的距離。

一九六九年曾有大叛亂

一九五九年以來，西藏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大規模的對抗，甚至「反叛」行動。一九六九年就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叛亂。兩次叛亂發生在文革期間，起初是以「革命造反」的形式出現，逐步演變成反對當時強制推行的人民公社化及其他一系列政策，進而發展到武裝暴動，開始攻打各地基層政權、駐軍、運輸車隊等，並公開打出「獨立」的旗號，和「達賴反動集團」遙相呼應。當時最著名的一個暴動領袖是拉薩西郊尼木縣的一個尼姑，她率領上千人攻打尼木縣委、縣政府武裝部、公安局等，又襲擊解放軍駐軍，鎮壓「積極份子」。後當局調動正規部隊前來鎮壓，才把暴動平熄下去。暴動失敗以後，尼姑帶領少數人上山「打游擊」，又被解放軍擊潰，尼姑一伙被解放軍活捉，帶到拉薩公審、槍斃。當時拉薩流傳着一個謠言，說尼姑只是游擊隊的副司令，正司令並未捉住，而是神不知鬼不覺地逃脫了……

根據當時西藏自治區的官方統計，全面參與叛亂的「參叛縣」就有十八、九個（準確數字記不清了，大概不會相差太遠），部份「參叛縣」大概就更多了。西藏自治區全區有六十



血腥的一九五九年——達賴的流亡生涯自此開始

多個縣，「參叛縣」幾乎佔三分之一。這次叛亂因迅速調動解放軍正規部隊鎮壓，才平熄下去。隨着叛亂的平熄，開始了大規模的逮捕、監禁、勞改、公審、槍斃，各地監獄、勞改營裡人滿爲患。有人估計，這次事件後被槍決、監禁、勞改的人不少於一九五九年那一次，那麼到底有多少人被槍決、勞改、監禁？也許永遠是個謎。當時拉薩動不動就召開公審、槍斃大會，一斃就是幾十人。那年在拉薩轟動一時

的有一起「少年反革命叛亂集團案」其成員全是十幾歲的未成年孩子。當這些孩子被公審完畢，綁赴刑場槍決時，早已被解放軍打得半死不活，奄奄一息。筆者的一個堂兄便是其中的一個。

幾乎每家都被波及

六九年這次事件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在西藏人民心中又罩上了一層深深的陰影，更為嚴重的是，外部世界對這次事件幾乎無人知曉，甚至在中國內地，也鮮為人知，可以這麼說，五九年和六九年這兩次事件以後，全西藏大多數的家庭，包括甘肅、青海、四川、雲南的藏區，不管是貴族還是農奴，喇嘛還是平民，幾乎沒有哪一家沒有一、二個甚至更多的家庭成員，如父母、兒女、兄弟姊妹、夫妻、祖孫、叔伯、姨姑等，或者被殺、關、管，或者逃亡國外，成爲難民，如果加上文化革命中因各種「冤、假、錯」案而受連累者，那麼可能每一個家庭都要攤上好幾個。

又過了十年，一九七九年，中國已經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一年中國政府開始和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對話，達賴喇嘛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前往西藏進行實地考察。代表團先到達了青海、甘肅的西藏區，結果出乎意料地受到當地藏人的完全自發的極其熱烈的歡迎，成千上萬的人前來歡迎、祈禱、甚至哭訴，請求達賴喇嘛前來給他們解難。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了解到這尷尬的情況後，立即訊問西藏自治區的領導人（因代表團隨即就要前往自治區考察訪問），甘、青出了這種情況，你們怎麼辦？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領導人答稱：西藏的百萬翻身農奴階級覺悟高，況且他們過

去深受達賴爲代表的三大領主的直接壓迫和剝削，因此決不會有此種事情發生（大意）。中央這才吃了個定心丸。

達賴代表團受自發性歡迎

誰知道代表團到達自治區境內以後，受到了藏人更加狂熱的歡迎。在群眾自發的歡迎會上，有人高呼「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萬歲」的口號，呼口號人被政府逮捕，一時間，西藏的形勢又驟然緊張起來，而這時的藏人，似乎覺得他們不再是完全孤立的，便有點有恃無恐。當時誰也說不上這種情形持續一段時間後，究竟會不會再次發生大規模的暴亂。這些情況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無疑是個極大的震動：西藏自治區及青、甘、川的藏區解放卅年，平叛廿年，批判達賴反動集團廿年，可是到了現在，那裡的人心向背問題都沒有解決，那裡的人們還在期待着達賴，而不能不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就會在一次會議上說：藏族人民有冤屈，不來找我們共產黨申訴，而要去找達賴的人申訴，這說明什麼問題？（大意）這一事件便是胡耀邦、萬里等中國領導人前往西藏視察工作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大受震動

胡耀邦和萬里到達西藏後，首先看到的一個最突出、最觸目驚心的現實是：窮。中國經營西藏卅年，花了幾十億元，西藏人民仍然是一貧如洗，西藏仍然是一窮二白。當時拉薩城裡連一個像樣的現代建築都沒有。難怪胡耀邦驚呼：「中央在西藏花了幾十億元，你們把錢

都用到那裡了？都扔到雅魯藏布江裡去了嗎？」這一事實與當時官方宣佈的「西藏跨越幾個世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西藏人民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的那幅美好圖景相差十萬八千里。當看到西藏的經濟從過去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走到另一個極端，成爲完全依賴中國內地，靠內地輸入一切消費品，甚至糧食都不能自給，需要從內地輸入，而西藏只好靠輸出點礦產品、藥材、木材等維持，只要內地的供應一切斷，西藏的經濟就要立即癱瘓、解體、崩潰，胡耀邦等人說出了一句在中國從來沒有人敢說的話：「這簡直是殖民地的作法！」（大意）

他們注意到的另一個突出的現實是，西藏遭受到巨大的破壞，西藏各階層僧俗人民受到的巨大創傷以及藏漢關係的緊張，於是，胡耀邦走到哪裡都要嚴肅地批評漢族幹部，而高度贊揚西藏的「悠久的歷史」，「高度的文明」，「燦爛的文化」，「勤勞、勇敢、智慧的人民」。

胡耀邦推動休養生息

胡耀邦一行在結束視察時，宣佈了幾條新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條：

- (一) 西藏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三年內農、牧民不繳稅；
- (二) 百分之八十五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回（不包括軍隊）；
- (三) 擴大西藏自治區的自治權力，中央政策、決定不符合西藏實際時，西藏可以拒絕執行，或變通執行。

胡耀邦在西藏的所作所爲和他所制定的一些政策，受到當時在西藏的許多漢族幹部的反

對，不少人公開大罵胡耀邦，還有人寫信給中央告他的狀。其實，依筆者的看法，正是因為胡耀邦的開明、豁達、坦率、誠懇認錯的態度以及他的這幾項新政策，才緩和了又一個新的不斷激化的矛盾，避免了一場新的可能的大規模民族衝突。如果從中國自身的長遠的根本利益着想，胡耀邦的政策才是真正最厲害的政策。

撤退漢族幹部被反對

不過，話又說回來，撤退百分之八十五的漢族幹部的政策，從一開始就遭到反對，胡耀邦返回北京後，就很少提及這一政策了，最後便取銷了這一政策。現在漢族幹部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在大大增加，還以各種各樣優厚的政治、經濟待遇鼓勵漢族幹部去西藏工作。大門敞開後，內地的包工隊、單幹戶、農村剩餘勞力大量湧入西藏城鄉各地，不僅西藏的居民比例迅速改變，西藏本地的手工業者、技術人員、集體戶、個體戶競爭不過技術嫻熟的內地人員，因而停業、失業的情況屢屢發生，又造成了新的矛盾。

擴大自治權的政策執行得也很成功。這幾年提拔了不少藏族幹部，但是「藏族幹部當家，漢族幹部作主」的狀況沒有太大的改變，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變，因為說句不客氣的話，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本身，就是徒有虛名，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與內地的某一個省沒有任何實質的區別，西藏的自治權力，大概還不及廈門特區的「自治」權力大，更別提深圳、蛇口的「自治」權力了。致於說到對中央政策實行「否決權」的問題，我懷疑當時胡耀邦是信口開河，誰敢呢？最後，實行休養生息，但基本



中共仍在奴役西藏人民

上執行下來了，三年到期後，根據人民的要求，又延長了兩年，老百姓終於緩了一口氣。但是由於過去底子太薄，三、五年之內不易馬上富起來，除了不收稅之外，還應有其它一系列的相應措施跟上來，這些看來還差得遠。西藏仍然是貧窮的地方，人均收入大概連內地的一半都不到，教育、衛生、公共設施以及整個發展水平都大低於中國內地。胡耀邦所說的那種殖民地經濟，仍然沒有改變。西藏和中國內地之間的差距，我懷疑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

劉心武事件的荒謬

今年二月份，在中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中，忽然出現了一個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人民文學」因發表侮辱藏族同胞的小說受到嚴肅批評，其主編著名作家劉心武也受到停職檢查處分。當時，筆者對這件事情的反映是矛盾的，複雜的。開始，大有揚眉吐氣之感，對中國政府終於主持公道，為受到侮辱的藏胞鳴不平而感到振奮、鼓舞。稍後，讀到「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又覺得有點沮喪，因該文把這件事情說成是「這幾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其他錯誤文藝思潮泛濫的必然結果」，從而將它納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軌道，並以此擴大、深入反資產運動。看來，這件事情的要害不在於「侮辱藏胞」而在於「資產階級自由化」。

藏人形象被扭曲

馬建的那篇小說，我後來在一家香港雜誌上看到過，令人作嘔。他用真真假假、道聽途說、一知半解、主觀臆想編織出一幅醜惡的圖畫。但是，這篇小說並不是第一個侮辱藏胞的作品，只不過是解放以來，準確地說是平叛、民主改革以來所出現的許許多多侮辱藏胞的小說、電影、戲劇中最新的一個，不同的是，馬建是因「侮辱藏胞」而受到批判的唯一的一個作家。

凡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人都可以回想一下，從一九五九年以來，中國出的有關西藏的文藝作品，幾乎可以說貫穿着一條粗粗的主題：即反映西藏的野蠻、落後、黑暗、殘酷，不是挖眼睛、就是剝人皮，不是砍手、就是砍腳，不是將小孩活埋在寺廟的牆腳下，就是「不准出生的人」，不是父親姦污女兒，就是舅舅姦污

甥女，要不就是母親和兒子同居，總之，凡是人所能想像得出來的人間最醜惡東西，都要加到西藏人的頭上。這些作品，在中國人民中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今天只要問一問任何一個成年的大陸人，他（她）對西藏和西藏人的印象是什麼，儘管他們可能沒有去過西藏，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西藏人，他們的回答大概十有八九會是：野蠻、落後。

當年有個電影叫「農奴」，將舊西藏描繪得極其陰森可怖，很多人都說一聽到西藏寺廟的低音大長號吹奏，就想起「農奴」，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慄。聽說大陸有些地方拿「農奴」的男主角強巴嚇唬小孩，誰家的孩子不聽話，大人就要嚇唬：「你再哭，就去叫強巴來！」

不幸的是，文學藝術作品中對西藏的這些描寫，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當時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宣傳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五九年以後，中國政府對舊西藏有一個正式的評定：最野蠻、最落後、最黑暗、最殘酷。有人說這是毛主席對西藏舊社會所下的科學定義，有人說這是周總理對主席思想的創造性發揮，不管是誰說的，反正這四個「最」出籠以後，宣傳口、文藝界便開始有計劃地圍繞着這個「綱」大作文章，炮製出一個又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這四個「最」，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對西藏舊社會的批判，事實上，它不僅不符合舊西藏的實際情況，而且它的影響早已超出對舊社會的批判，它是對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文明的全面、徹底的否定，由此而背上黑鍋的正是西藏人民，受侮辱的是整個西藏民族。

西藏人中流傳着一個笑話：某西藏人到上海學習，一個上海同學聽說他是西藏人，便好奇地向他打聽：「你們西藏解放前有沒有太陽

？」這只是個笑話，誰也不知道究竟發生過這種事情沒有，不過，如果真有這種事情發生，我也不會感到奇怪，這就是宣傳四個「最」的最突出的效果。西藏人民因這四個「最」，而變得灰溜溜的無地自容，而解放後，漢族幹部、領導却處處以解放者、救世主自居。這時，藏族人民已不再是主人公，而是被解放者，他們永遠該感恩戴德，在這種狀況下，還能談得上什麼民族平等、民主自治？

藏族抬不起頭來

說句實話，筆者在中國時，作爲一個西藏人、一個藏族同胞，從來沒有感覺到驕傲、自豪，作爲一個藏族同胞，我感到臉上無光，抬不起頭來，我的言行舉止，處處要做的不像個西藏人。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反而覺得作爲一個西藏人可以挺胸抬頭，昂首闊步，因而走到哪裡，我都要宣稱：我是西藏人！前幾個月，鄧小平主任在和卡特前總統談到西藏的情況時說：「中國的政策真正立足於民族平等，從建國以來中國沒有出現過民族歧視現象。」聽了這一席話，真不知該說什麼好。

四個「最」，自八〇年胡耀邦、萬里等中國領導人視察西藏後他再也沒有提過，雖然沒有宣佈正式「摘帽」，但是西藏人民總算是悄悄地扔掉了這口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鍋。不過其深遠的影響，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消除的，馬建的作品便是一個明證。

西藏留學生只有四人

談到平等，很多人大概就要爭論說，藏族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佔有完全的平等地位，在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佔有很大的比例，甚至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中藏族代表都佔有很大的比例，這也正是鄧小平主任對卡特所說的話。的確，藏族在各級人大、政協代表中佔有很大的比例，筆者手頭有一個統計數字，根據八二年中國發表的人口統計數字，藏人大約有三百四、五十萬，約佔中國總人口的〇·三三%，也就是說每一萬個中國人中，便有卅三個藏人，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六屆五次會議上，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主席團成員（相當於人大常委）一百五十七人中，竟有七名藏族代表，約佔全體成員的四·四六%，是總人口比例的一四九倍！同一時期召開的全國政協，藏族委員的比例也與全國人大相差不多。

雖然大家心裡都明白中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究竟意味着什麼，但是如此重視藏族代表，使其比例遠遠超過人口比例，畢竟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情。問題在於，除了這些禮儀性的「代表」、「委員」以外，在其他實質性的、利害相關的、硬碰硬的安排中，中國政府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藏族的人口比例。舉一個例子，近十年來，中國留美學生、訪問學者據說約有三萬多人，加上其他國家的留學生，總也有四、五萬人。那麼其中有多少個藏族學生？加上筆者在內，共有四人！還不到萬分之一，其中三人是在北京工作的藏族，直接從西藏來的只有一人。四人中的二個人還是先到第三國探親，再從第三國轉來到美國讀書，四人都是自費，沒有一個公費，沒有一個是交換學生。

說句大實話，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去當擺設，做花瓶，而是貨真價實的平等，實實在在的當家作主的權利。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了一系列新

政策，做了不少好事，取得了不少成績，這些成就，就不僅使西藏人民感到高興、滿意，在國際上也是有目共睹，受到贊賞的。同時必須承認，過去的問題並不是全都得到了解決，而且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還有一些基本問題，大概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得到較完善的解決。如果把今天的西藏說成是「

雄偉壯麗的布達拉宮仍然炫耀著宗教的威力



到處驚歌燕舞」的「一派大好形勢」，不僅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是有害的。

羌人並非藏族

幾個歷史問題

(一) 西藏民族的族源

西藏民族的發源地在何方，其先祖為何人，雖仍有爭議，但現在已基本弄清楚。根據古代西藏史料的記載和民間的傳說，藏民族的發祥地在今雅魯藏布江流域的中段，從這裡逐步發展到整個西藏高原。也就是說，西藏民族，並非某個外來的遠古民族的後裔，這個民族就是在西藏高原上土生土長的一個民族，在她的發展過程中，還吸收了不少鄰近民族的成份，逐步發展壯大。但是，發源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雅魯」古先民，始終是藏民族的主體，對藏民族的發展起着主導作用。這一點是所有地區的藏人都共認的。卅年來，藏漢學者所進行的一系列深入細緻的歷史研究、科學考察、考古發掘都已經證實上述論說的準確性、科學性，這一論說已為今日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科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所承認。

此外，有些西藏古籍中記載着某個屬高等種姓的古印度王子降臨西藏，被未開化的藏人擁戴為王，西藏的文明史由此開始，更有人因此而下結論認為西藏民族就是古印度王子的後裔。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說法也有相似之處，如「唐書」上所說的，吐蕃的先民是鮮卑族的拓拔氏，他們聚眾進入青海，逐步繁衍成爲當時的吐蕃人，即今之藏人；還有人認爲中國古代傳說中的「放三苗於三危」，這三危之一即今之西藏高原，三苗之一便是藏人的祖先，上述這些傳統說法都過於牽強附會，缺乏確鑿的歷史

、文化、語言、地理、考古等方面的證據。

前兩天一位美國某大學的教授在「中報」上撰文，認爲中國古代的氐和羌就是藏族，甚至斷言打了泔水之戰的符堅和他的前秦王朝便是藏族。這其實是誤解，是中國傳統說法的一種引伸。氐和羌不是藏族，前秦王朝也不是藏族建立的，「五胡亂華」時期藏族沒有參與「五胡」的「亂華」活動，那個時候，藏族還沒有衝出西藏高原呢！中國古代所說的「羌」人，有時所指範圍極其廣泛，幾乎可以把西方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內，因此談到「羌」人時要甚爲謹慎，絕不可張冠李戴。

氐、羌這些民族後來都在歷史上消亡，他們的後裔，大多數可能吸收到漢族中去了，一部份很可能被藏族吸收了。今天，在漢藏交界的某些地方，仍有一些居民的民族性有待鑑別，有些學者認爲這些居民可能就是氐人和羌人的「直系後代」。唐代的吐谷渾和黨項，也都不是藏族，但是後來均被吐蕃佔領，其居民多被藏族同化，成爲藏族的一部份。今青海的土族，有人認爲就是吐谷渾人的「遺孤」。宋代建立了強大政權的黨項族的西夏，和當時已經四分五裂，內戰不絕藏民族的一些邊遠部落有密切的來往，但是他們不是藏族，西夏在藏語中稱爲「彌娘」。蒙古滅西夏後，西夏部份居民南遷，定居在藏族地區，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附近的藏人，便自稱「彌娘」，這一帶地方因而得名「彌娘」，他們很可能是被藏化了的西夏人的後裔。

西藏歷史地位爭論多

(二) 西藏的歷史地位

西藏到底是何時納入中國版圖的？對這一

問題，且不談藏人自己是怎麼說的，在中國，漢族學者對這一問題是有爭論的。

首先，民國時期的一些歷史著作中認為西藏是在清朝初期正式納入大清版圖，從而順理成章地成爲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的證據是，第五世達賴喇嘛和第四世班禪喇嘛建立西藏甘丹頗章王朝以後，合同蒙古親王固始汗致書清太宗皇帝，表示歸順清朝。後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幾次在西藏用兵，正式奠定清朝的主權。自雍正年間起，便在西藏派有駐藏大臣，直至大清帝國滅亡，西藏人趕走駐藏大臣和清兵，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佈西藏獨立爲止。

解放以後，對這個問題提出新的看法，認爲西藏納入中國版圖不是在清代，而是在元朝，時間提早了差不多四百多年。這種說法認爲，蒙古人把西藏併入大元帝國的版圖，這是西藏和中國的悠久的歷史關係的自然發展和必然產物，用他們的話說，叫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種「元朝說」是今天中國政府的正式官方口徑，這個口徑據說是周恩來總理在五十年代親自訂立的。這種說法有一個缺陷，當年蒙古人征服的不光是一個西藏，歐亞大陸的大半都被他們征服，征服的過程也遠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是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當年，誰要是不臣服蒙古帝國，蒙古騎兵的鐵蹄就要踏遍你的土地。這也就是當年代表西藏到涼州投降蒙古帝國的薩迦班智達寫信給西藏各界領袖時所說的一句勸降話。

以後又有人提出一個新的說法。西藏納入中國版圖，不是在元代，而是早在唐朝就已經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時間又提早了六百多年。提出這一說法的人認爲，唐蕃雙方和親，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吐蕃贊普（即國王）稱他們與唐朝皇帝的關係是甥舅關係（娶了唐朝的

公主，公主的娘家就成了舅舅），由此可以斷定那個時候唐蕃就已經成了一家人。這種說法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當年松贊干布娶的不光是唐朝的文成公主，他還娶了一位尼泊爾的尺尊公主，這位尼泊爾公主的地位比文成公主還高，照上述推理，如果今天尼泊爾人聲稱西藏自那時候起就是尼泊爾的一部分，該如何是好？

最後一種說法是「自古以來」說。持這一說的學者認爲，過去對西藏納入中國版圖的問題劃定時限，認爲或者是在清代，或者是元代，或者是唐代，這種作法使我們自己陷入很不利的被動局面，如果有外人問，西藏在元代或唐代納入中國版圖，那麼在元代或唐代以前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就不好回答了。因此主張不限定特定的時間，而籠統地稱爲「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說法主要考慮的是現實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尊重歷史。

歷史關係是政治問題

藏人自己對西藏和中國的歷史關係有一種傳統說法，叫作「施主與福田」關係。這是一種宗教關係，即西藏作爲一個宗教國家，像當今的梵蒂岡一樣，對中國的皇帝、皇室提供宗教上的指導，而中國的皇帝、皇室作爲信徒，給西藏提供供養和保護。他們承認這種關係始自元代，以後時緊時鬆，時斷時續，直至現代。筆者認爲，這種說法是一廂情願，未免過於天真。西藏過去與中國的元、明、清三代的確有過很緊密的宗教關係，但是如果因此而認爲西藏和中國只有宗教上的關係，否認有任何政治上的關係，那麼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太小看了中國的皇帝。

不管如何，以上各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正確

，是可以爭論的。在學術領域裡有各種不同的見解，理應是一件好事。但是今天在中國，西藏和中國的歷史關係問題，已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件極其敏感的政治問題，已經不容有自由討論和爭論的餘地，因此只見一些漢族學者提出一些調門越來越高的新見解，西藏族學者儘管私下有許多不同看法，但從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表示不同意見，原因很簡單，如果對這個問題提出不同意見，便有「分裂祖國，破壞統一」之嫌，誰都怕扣上這麼一個大帽子。

變

(三)國共兩黨的民族政策、對藏政策及其演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一方面主張中國統一，同時承認民族自決權，主張西藏等地自願加入實行自由聯邦制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但是要承認西藏等地的自決權。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決議中都有類似的主張（一大沒有發表宣言）。一九二七年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案中宣佈的「中國革命十大綱領」中的第三條就是：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到江西中華蘇維埃時期，也就是紅軍時期，對民族政策又有新的解釋。如一九三〇年五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大會更認爲，國民黨反動派的所謂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號完全是欺人的鬼話，現在國內各少數民族一樣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如日本在內蒙，英國在西藏），受到漢族地主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束縛，而大會一致通過：承認國內各少數民族有各自分立及自由聯合的完全自決權，贊成其反帝、反漢族地主、反封建勢力的民族解放鬥爭。」同一時期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說：「承認中國境內

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主席發表了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在當時發表的「論聯合政府」的「具體綱領」一項內，有這樣一條：「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但是在解放後出版的「毛選四卷」中的「論聯合政府」一文裡，「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一句改成了「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

國共對藏政策的演變

大陸解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就再也沒有提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與漢族建立自由聯邦國家的主張，却反而主張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反對採取聯邦制國家。五十年代曾有人主張在中國實行蘇聯式的民族自治共和國，這一主張在一九五七年青島民族工作會議上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批評，持這一意見的人後來均被打成「地方民族主義者」。

國民黨初期的民族政策與共產黨早期的主張頗為近似，如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個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戰爭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一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宣言中亦有：「

幫助國內少數民族（蒙古、西藏等）的自決與解放」等字樣。

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先生在台灣發表聲明，聲援「西藏同胞的反抗暴鬥爭」，並表示將來反攻復國大業完成後，將給予西藏同胞民族自決的權利。最近幾年，只見到經常提及聲援西藏同胞的「反抗暴鬥爭」，而不見提及「承認民族之自決權和成立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的主張。

不要再鮮血寫歷史

四結尾

最後，講一個歷史故事作為本文的結尾。西藏史書記載，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大元帝國以後，對中原一帶的漢族人民實行了一項大規模的集體屠殺政策，每年都把成千上萬的漢人趕到江河裡活活地淹死。西藏古籍「薩迦世系」在形容這一極其悲慘的事件時說道：漢人的鮮血映紅了東方的天際，漢人的屍骨，漂滿了遠方的江河大海。忽必烈稱帝後，請當時西藏薩迦教派的高僧八思巴做他的上師，並三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頂。第一次灌頂以後，忽必烈將新征服來的西藏地區十三萬戶作為供養奉獻給了八思巴。第二次灌頂以後，將西藏三部（即今全部藏區，相當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甘、青、川、滇的所有藏區）全部奉獻給八思巴。第三次灌頂以後，忽必烈問八思巴還需要什麼作為供養，八思巴說，他別的什麼也不需要，只有一項要求，請求忽必烈廢止用漢人填江河的野蠻作法。忽必烈接受了上師的教誨，從此廢除了這項民族滅絕政策。

真希望我們藏漢兩個民族能永遠像這樣相互幫助，相互解難，而不是相反。

十年一結——「新台獨真相」補序

劉添財

再不好好處理這個問題，台灣這條船就會沉沒！

大家要冷靜的把這個問題攤開來談，配合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一連串民主做為，讓我們也把這個關係台灣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解決。筆者十七年多來親自觀察並單槍匹馬參與台獨活動，可謂有第一手的了解，雖然未遭狂瀾「小台獨」人士之暴力毒手（多謝手下留情），現在想起來也不免冒一頭冷汗。如此得來之資料甚為可貴，為討論台獨問題及台灣前途問題所不可或缺。更可告慰者，台獨人士愈來愈了解筆者不是他們的讎友畏友而不是他們的敵人，因此也對筆者愈來愈友善，真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將來繼續發展下去「小台獨」有可能漸漸變為「大台獨」，那麼他們就會成為我的同志了，讓我們共同來為台灣打拼吧！

十年前我把有關台獨問題的文字集結出了一本「台獨真相」。光陰似箭，匆匆又一個十年了，整理了一番出了第二集「台獨真相」名之為「新台獨真相」。再過十年還會整理出第三本「台獨真相」將名之為「新新台獨真相」，那第三本將是最後一本了。

本人這一生與台獨結下了不解緣，由其始觀察到其終，做了一個忠實記錄。住在台灣的人應該對這些記錄最感興趣，可惜的是第一集第二集都無法進入台灣，都受到當道的封鎖。若說它的封鎖是我為敵也非事實，當道的心態只是一種駝鳥主義，只希望能避開談這個問題拖一天算一天而已然而今日的內外形勢已不允許它再迴避掩飾推拖了，島內台獨人士已經公然喊出獨立口號寫出獨立標語了，

10年來的綜合性報導

台灣禁書
新台獨真相

劉添財著

連郵費每本

\$8.75 美金

支票抬頭請開 T. LIU 寄 P.O.Box 7585 Rego Park, NY 11374

物慾橫流

的

彭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葛飛



讀了中春總第五十二期旅日華僑賈保羽先生的「就訪日大醜聞致彭真書」後，一方面拍案稱快；一方面替彭真汗顏同時也為他在日本丟盡人格國格而憤慨！

彭真不止外形兇殘醜陋，靈魂也極端卑劣！現在老而不死成為改革開放的絆腳石，與胡喬木、薄一波、鄧力群等結成頑固保守的新四人幫。在王張江姚四人幫時代，曾有個交白卷的大學生叫什麼張鐵生的訪問日本，日本人曾懸掛「歡迎中國交白卷的大學生」大幅標語予以諷刺揶揄。那已經夠丟人了，但比起彭真來却是小巫見大巫！張鐵生祇不過是跳樑小丑，不過是不學無術而已，他並沒有向日本人伸手，更沒有用民脂民膏購買四大卡車用品。醜都丟到外國去了，痛心的是他並不是丟他個人的醜，而是丟了中國和人民的醜！當初周而復到

日本也祇不過逛色情妓院，看看X級的電影，結果挨了批，丟了黨票，罷了官。那麼像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紀委的主要負責人、訪日代表團團長的彭真如此丟盡人格國格，又當如何自責和給以什麼處分呢？難為他還能厚着臉皮，還恬不知耻地糾合死黨上竄下跳，搞什麼倒胡耀邦，鎮壓民主自由運動，整肅開明知識份子，真是豺狼成性，蛇蝎之心！

或許他想：日本侵華八年欠下幾千萬中國人民的血債和不可估量的財物損失，對於這些，我們「偉大」的黨，竟代表中國人民不念舊惡，大度包容，絲毫沒有要它賠償，這還不夠慷人民之慨嗎？現在我伸手要這點東西算得什麼，簡直是九牛一毛，滄海一滴！何必大驚小怪！日本人也太小氣了，請看咱們偉大的黨和毛主席「代表」中華泱泱大國對阿爾巴尼亞、

北韓、古巴及越南支援了不計其數的無價物資。經過我黨多年教育的人民，雖然勒緊褲帶，甚至餓死，也沒敢抱怨一句。後來儘管他們忘恩負義，而我們還是以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予以寬容了！日本應向我們學習！

記得多年以前彭真在北京市長任內，在同仁醫院選有八名年輕貌美、政治條件好、思想進步的特別護士，對他進行特別護理。當時彭真的體質健壯如牛，同仁醫院向以眼科著名，他的眼睛除有點砂眼外，沒有大毛病，那麼要這麼多特別護士做什麼？對此，「文革」中曾有大字報揭發。

在「反右」初期，某天彭真對文教界人士作廣播講話，劈頭就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地說：「奉勸在坐的右派先生們別做黃梁美夢了，我們打下的江山能讓你輪流坐庄嗎？我們的臥塌之旁能叫你們酣睡嗎？我們的政權固若金湯任何人都別想動搖它！」接着他又大放厥詞極其猖狂地說：「如果有外敵入侵，我領導你們抗敵，北京市現有八百萬人口，包括遠郊區，好，犧牲四百萬和敵人拼！北京市變成廢墟也沒關係，打跑敵人後，我再領導北京人民在廢墟上重建新北京！請聽，口氣多麼狂妄！死亡四百萬人裡就沒有他，他還想再做北京市長！彭真已屆垂暮之年，殺人也殺夠了，榮華富貴也享盡了，丟人出醜的事也做盡了，應該打消野心別再興風作浪了，只須在設備現代化的家裡，閉門思過，反省懺悔，老老實實地等待「壽終正寢」！

又記得看「三國演義」，有一章是講諸葛武侯罵死王朗。王朗這個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被罵得羞愧難當，一頭衝下馬來跌死了。王朗還算是氣性的，恐怕彭真先生連這點氣性都沒有！

「三年災荒」回顧質疑

——已亥二十八年祭

匡建昌

迄今二十七、八年，那時出生的嬰兒，今天已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撩起「共慘」的舊日「時裝」，還使人有如睹「畫皮」之感；「毛澤東帶來幸福」之說，還能令人「談福變色」。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究竟餓死了多少同胞？「自然」災害從何說起？為何拖欠「蘇修」債款？何謂「共產風」？諸如此類問題，各有關權貴們在多年來諱莫如深，儼然禁樹。在此，筆者倒想與同好諸君「相與析」一番。

三年餓斃同胞估計

讓筆者採用一些官方數據，因為任何其它數據都不足以令人信服。

毛澤東在其「毛選第四卷」中，曾用「姑且」的方式承認過國民政府的統計報導：一九四九年，全國有四點五億人口；據北京「一九五八年鑿」資料，有六點五億；據北京一九七八年統計，有九點七億。又據北京近幾年估計，一九五〇年時，吾同胞略為五億。

下面用五〇年五億，五八年六·五億算帳，吾同胞的自然增長率為三·三%，其計算式是：設X為自然增長百分點，即

$$5 \text{億} \times (1 + X\%)^8 \text{年} = 6 \cdot 5 \text{億}$$

$$X = 3 \cdot 3\%$$

這三·三%，與世界其他民族的自增率亦很接近，與馬爾薩斯的統計和估算亦很接近。

若如此，則三年之後人口應為：

$$6 \cdot 5 \text{億} \times (1 + 3 \cdot 3\%)^3 \text{年} = 7 \text{億}$$

而以七八年九·七億算帳，三年之後即六一年實際是約為六億。即：設X為一九六一年

$$X \text{億} \times (1 + 3 \cdot 3\%)^1 \text{年} = 9 \cdot 7 \text{億}$$

$$X = 6 \text{億}$$

怎麼一九五八年就有六·五億，而六一年僅有六億？遑論六一年應有七億之數！

雖然以上計算略去了如：出生率變化、醫術進步、「政府」的鼓勵式限制生育、文革動亂非命死亡等等，但，不難看出其真實程度來。據以上計算，共產黨天堂超渡同胞殍屍約在五千萬到一億之間。無論如何，不止「兩千萬的「陰德」。

慄脚如麻未斷絕

如今影換星移，嘔算紂天「堯」戴，過來人們的神話辛酸仍記憶猶新：投機倒把、買賣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直至淫票；扒衣袋，偷換行李包，盜竊百貨公司，搶伙食團；撬門落鎖，鋌而走險，落荒要飯；有勢力者則尅扣職工伙食、貪污、受賄、偽造票證、層層說報、層層盤剝……。那些年，休談榮辱，幾乎所有的荒唐事都有人去。這一切不過因為缺吃。人們吃定量「罐罐飯」、吃「高級餅子」、吃糠、吃土茯苓、吃「人造肉絲」，甚至「吃死人肉」、吃觀音土……。祖先的土地上充滿了罪惡，道德淪喪到登峯造極！今天，「災害」冠以「自然」雖然已境遷二十多年，對於這死亡「天文」數字、「人災」、「天災」、「還債」一類共產黨的劣績，人民的記憶破滅了嗎？亦未必「逝者如斯」。

正「黨君子」，

何須賴帳作呆

人民必須聆聽其一切來龍去脈。剛巧，一九七九年十月，葉劍英竟在北京說：「因我黨政策不當，曾餓死了兩千多萬同胞！」同時的「北京周報」也登載這則「消息」（英文版）。

嗚呼！怪哉！廿年之後，竟然「我黨」又會講三年災荒並非「自然」，乃人為，並非人民的懶惰或「私字」，乃「政策」故爾！此舉為何？以做愚之揣測，「革命鬪爭」的微妙性和尖銳性用得上。吾死難同胞於無意中竟成爲那些「我黨」人士用來爭權奪利、互相攻訐的矛頭、革命鬪爭的銳器。嗚呼，吾死難同胞不敵之陰魂，真不令人恐懼乎？！

是的，黨說話從來都是算數的，說兩千萬

，就是兩千萬！譬如：說大鳴大放就大鳴大放，說反右就反右，說搞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就搞，……說向前看，吾同胞就不得追究既往，說中國人民習慣於共產主義制度，就不可變更了。但是，這兩千萬豈有說乎？

「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上哪兒去了？未必連諸殍魂一同超渡了？怎樣來消除共產主義對於年青人的疑慮，對於老人們的餘悸、恐怖和創傷，以便藉以重新籠絡人心？

欠帳質疑

是的，黨也像凡人肉身一般的會欠債。所以，有說三年災害乃「自然作祟」，加之還蘇修欠帳之故。何時拖欠呢？據黨報說，乃韓戰費之拖欠。時至今日，衆所周知，自然作祟自不能成說；戰費之說，在下願請教一番。

在此，倒不必去考慮韓戰費支出的正義與否及是否值得豁出大量饑餓同胞的代價，祇須想，老大哥支援我黨，應該像我黨支援印支各國共產黨一樣，不該要別人還帳。若要還，這麼長久的糊塗帳，怎麼算得清？一個放債的黨決不會從欠帳黨掌權後的欠帳算起！即使蘇共要清算我黨之拖欠，亦要從延安、瑞金時代算起，並考慮計息和擔保物等，才合於政治投資的借貸常情呢！怎麼前不算，後不算，僅算韓戰費？北京共產黨快快道來！

「老大哥」何其慷慨！吾同胞生靈死鬼無不替我黨「感激泣零」！

雖然吾同胞不能目睹我黨各期借據，其借幾何，年息若干，期限幾年，擔保抵押等等，但這些借據早已在延安，甚至瑞金時代就隱伏下了三年災害饑饉同胞的潛因。這使吾同胞又非關心這一系列的借據不可。望共產黨及早公

佈個黨的帳務！

「愚」死不瞑目，餓殍帳曆，載在陰冊；所有欠帳，應於豐碩之年，由人民替黨逐數償清。非如此，殍魂與馬恩列斯諸「先烈」之「天堂」對簿，吾同胞難圓差欠之說，恐無地獄以自容呢！

人民選擇共產制度不能成說

據一些下鄉知識青年講，在各地農村的「憶苦思甜」會上，總有些「無知識」的農民們不去憶「解放前的苦」，却公開沉泣於三年災害的痛苦記述中。

這種現象絕不合黨的憶苦宗旨。怎麼辦呢？在諸多共慘缺德「政績」中，首先必須給製造三年饑餓的我黨找個解脫。僅歸因於外國的什麼「反華大合唱」、「蘇修逼債」、天老爺過不去，還不夠呢！人們會追問下去，而且，每當一提起這些共慘劣蹟，又觸發同胞們的痛苦回憶。沒辦法，最後，還是聰明的鄧先生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據他說：同胞們已選擇並習慣於共產制度了。

看來，他的意思似乎是想說：不管人們去習慣這個制度時付出了多少代價（如瘋狂殺戮、沒收等）；不管這個制度哪怕一無是處（如效率低下、貧窮落後），人民選擇了它並已習慣了！這似乎可算作一個解脫。因為既然是出於同胞們的選擇，其治下發生的各種災難，同胞們應該默默忍受，即使它將滅絕人種，開除中華民族的「球籍」！我黨或鄧先生所常提的改革，該不是要改革這個制度本身吧？！因為是出於同胞們的選擇並已習慣了。那麼，要改革什麼呢？看來是想革掉「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尾巴，或僅是共僚們嗜血過飽要想鬆

鬆褲帶？

不錯，在「人民」選擇的貧困、罪惡的「共慘」治下，神州已逾卅餘載。但若讓人民真正作一次嚴肅的自由選擇、大量餓死同胞的共產主義制度絕不會當選！

疑癥鳥瞰

綜上所述，可質可疑處有如下數點。其一是：四九年、五八年、七八年三次普查人口數是否真實？因為三年災荒餓斃數是由此三數算出來。其二是：葉所說的「兩千萬」從何而來？既爲了爭奪霸權而拋出此鋼鞭材料，何又去無影，作罷論？其三是：三年殍魂得沒於地而後又「天其以禮悔禍於我祖先的土地」；抑或「架村之天並無異堯舜之天」？其四是：帳從何時欠起，所欠若干？是黨欠，或人民欠？何筆當還，何又不當還？還了多少，下欠多少？雙方有否混帳？其五是：既有天災，還債之說，何又要說因政策不當，刮共產風招致饑餓？「政策」、「共產風」所喻何物？莫非是共產制度？其六是：既說政策不當，刮「共產風」，而又說共產制度是出於人民的選擇？難道我黨誠以爲是共產制度招來橫禍？其七是：既暗示說共產制度招來橫禍，何又說人民已習慣？難道世間有一種人民習慣的饑餓？其八是：似乎我黨高級人士本想摒棄共產制度，而人民積習過深，無從改起，使我黨不能一展「革掉共產制度」的抱負？……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筆者爲吾同胞殍魂向我黨所質諸問，望我黨均能一一作答，則「我黨」幸甚，國家幸甚！超渡之「功」，勝造七級佛塔！非此，殍魂失之天祐陰庇，塚海茫茫，吾人將祭祀無處矣！

中共向錢看了

(日本) 黎音

今年九月份以前，中共的領導們還對光華

寮問題喋喋不休地大發議論。報紙、雜誌也在連篇累牘地大作文章，搞得火藥味很濃，氣氛頗緊張。似乎日本如若不將光華寮改判給北京政府，中共便誓不罷休，一定要窮追到底。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等國家首腦都連番出馬，就光華寮問題向日本施加壓力，聽那措詞之嚴厲，看那來勢之威猛，使人感到中共維護「原則」、堅持「立場」的勁頭，還真有點「革命到底不回頭」的精神哩！

一時間搞得日本社會輿論嘩然，眾議紛紛。小小光華寮可大出風頭啦，成了舉世注目的對象。人們都瞪著眼睛想個明白，看看日本究竟會如何裁判這場「一僕二主」的中國官司。

然而，進入涼秋九月，當中國的決策者們從北戴河洗完海水浴，返回北京之後，氣氛有了突然的變化。他們非但不再咄咄逼人地談論光華寮問題，而且還將冷卻一時的「中日友好」的舊調重彈起來，給人以要主動修好，重溫蜜月的感覺。開始人們還悶悶：「怎麼？莫非隨著氣溫的下降，這些老人的頭腦冷靜下來了？」當然，這是一種戲謔之論。不久，大家便由官方的新聞媒介中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原來日本政府決定貸款給中國一千億日圓（約合七億美圓）。日本已通知中方，趙紫陽立即對此

表示滿意和感謝。

「說來說去還是錢好使啊！」有些日本人這樣議論。但筆者作為一個中國人，聽起來未免臉上發燒，渾身起了一層鷄皮疙瘩。

據說日本曾有一個處理方案，準備把光華寮從台灣手中買過來，交給中共，以了結此一糾紛。鄧小平聞訊後立刻表示：「光華寮的問題，是關係到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原則是非問題，不是光華寮財產那幾個錢的問題。」明確表態拒絕從日本手中接收買來的光華寮。現在看來，這不過是一種討價的姿態而已。陳舊的光華寮可能連一百億日圓也不值，倘若是在於東京油袋的「陽光大廈」，大概還可以考慮考慮。中共是見過「接收」世面的呀，「胃口」怎可低估了。

光華寮的歸屬問題，是非自有公斷，筆者不能妄說。但有一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想請教「偉大、光榮、正確」並且越老越聰明的鄧大人：既然以往對光華寮問題喊的那麼歡，叫的那麼響，聲稱是「原則問題」，決不能讓步，為什麼一千億日圓到了手，便立即偃旗息鼓、轉顏變色，這不是拿「原則」做交易嗎？如果光華寮根本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問題，當初又何必驚動動眾，小題大作，豈不讓人懷疑別有企圖嗎？

不久前，一位留學生反映：上海一家友誼商店，將一位抱著鬚毛小狗的藍眼高鼻子小洋婦人讓進室內，而把幾位黑頭髮黃皮膚的同胞拒之門外，為此險些引起騷亂。站在友誼商店外面的中國人嚷道：「你們就認得錢呀，外國的狗可以進呀！中國人就不可以進嗎？外灘把你們的魂都買走了，真給中國丟臉呀！」

這些年，在我們中國，一個正眼兒「向錢看」的人多了起來，由此也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投機取巧、買空賣空、詐騙勒索、欺行霸市、摻雜做假、行賄受賂、男盜女娼、見死不救、道德淪喪等等，屢見不鮮。憂國憂民之士驚呼「世風日下」，提倡「整頓」；中共也批判「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打擊不法、狠煞「歪風」。可是迄今社會風氣並未見好轉，「向錢看」的慾火反而愈燃愈熾。究其根源，並非像中共所宣傳的那樣是「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的影響，而禍根就來自中共本身。請看今日中共為了撈錢，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又何怪小民乎！上樑不正下樑歪嘛！當然，中共「向錢看」的生財之道都是非常壯觀的，氣派非常大的，如，給交戰國家出售軍火武器啦，在本土為外國處理核廢料啦，巧立各種堂皇的名目向國際募捐啦等等。弄來的錢都跑到哪裏去了呢？中國大陸人民的平均生活水準，在世界上排在一百位左右，而中共的軍事實力却已進入了世界的前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了。

以上是筆者心懷不平，有感而發的幾句牢騷，可能有些不恭欠敬的犯上言辭，但却是實實在在的肺腑之言，務請中共各位大人海涵。倘若怪罪下來，小人實在擔待不起，剝了咱的皮也拿不出罰款來。最後只有借用王震老將的一句著名口頭禪「他媽的」，聽天由命了！

給中國大使館教育處一秘

俞肇基教授的一封信

編者按：中國駐華威頓大使館教育處一等秘書俞肇基（在國內是位副教授），

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九月兩次到肯塔基大學蹲點，「扎根串聯」，每次一呆就是一個星期。俞肇基工作重點之一，是清查肯塔基大學的持不同政見份子，並恐嚇大陸留學生不要介入民主運動。

俞肇基的活動，可能是一個信號——全面清查留學生中持不同政見者的信號，望各地留學生注意使領館有關人員的動態。

俞肇基在肯塔基大學蹲點期間，該校的中國留學生與他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部份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還草擬了一封致俞肇基的公開信寄給本刊。本刊對該信做了刪節，刊登於下。

中國大使館教育處一等秘書俞肇基教授

您好！您於八、九兩月兩次來我「視察」，每次一蹲就是一星期之久。對您在此所作所為，我們頗有感覺，有話不得不說。

第一，您對留學生屢次威脅說：「你們每個人的情況都在我們的計算機裡，只要一打，誰的情況都在我們眼前。」還警告大家：「前些日子，我們開除了兩個學生，讓他們回了國。」請您不要忘記，您說話的地方是美國，不是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在美國，用共產黨整人的一套威脅留學生是非法的。

第二，您竟然明目張膽地宣稱：「美國和我們是敵對的國家，美國是敵視共產主義的。」這是您的高見，還是官方的秘密政策？鄧小平近年一再推行與美國友好的政策，您的這番言論豈不公然破壞中美關係嗎？

第三，您告誡我們每位留學生：「你們在這裡既要遵守美國的法律，又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天哪！這裡是美國的領土。中國憲法中有「四個堅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

無黨階級專政……。在中國，為了落實這條法律，黨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難道我們留學生在美國也要接受「共產黨的指令」？——如進行黨組織活動之類。如果不接受就要被「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您在我校私查暗訪，給很多留學生扣上了「中國之春份子」的大帽子，恐嚇大家。我們要告訴您，我積極參加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很多人並非「中國之春」。中國之春開創了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民主運動，但除中國之春之外，很多中國人都在從事着同樣的民主事業。民主乃是一種潮流，擋是擋不住的。

俞教授，「識時務者為俊傑」。在中共專制統治近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個黨已腐爛透頂，危機四伏。任何一個有理性、有良知的人，包括像您這樣的中共官員，都應認真思考一下中國的前途和自己的後路，不要成為行將就木的中共的殉葬品。

我們接待過不少大使館官員。他們不少人同情民主運動，小心翼翼地保護留學生。這些，我們留學生心中是有數的。我們也勸你積點德吧！

以上是我們發自內心的話，我們幾個人有的署上了自己的真實姓名，有的暫時署筆名。

望您三思。

美國肯塔基大學

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吳方城（生物化學，博士後），

蔡茅（物理學，博士後），

以及舒戈、白瑜、林依萍

一九八七年九月卅日

於萊克辛頓

國際關注楊山魏案

編者按：澳大利亞馬克·里葛雷先生（Mr. Mark Wrigley），今年七月去信中國駐澳使館查詢楊巍案。同時，澳大利亞國家黨（National Party）黨魁洪·顏·辛格列先生（Mr. Hon Ian Sinclair），也去函澳大利亞外交部查詢此案。他們均收到各自查詢對象的覆函。可見此案已引起國際關注，我們特將兩封回函翻譯成中文刊登。

遠在西太平洋南半球的澳大利亞竟會關注一位與他們毫不相干的中國留美學生的命運，這是中國當局所無法理解的，只能將責任塞給「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某些組織」（意指：散佈世界各地，總部設於美國紐約的中國民聯），並無力地勸說，「希望澳大利亞的朋友們，不要被他們的行為所欺騙。」

上一期「中春」曾指出，尊重人權已成為國際法的一部份，任何國家違反人權，即違反國際法，將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此一指責並不構成干涉內政的罪名。六十年代中，北京官方組織了上萬大、中學生集會天安門廣場聲援美國黑人權運動，最近又在聯合國提案制裁南非白人政府。這不等於承認人權問題是國際社會關心的問題？自己做都做了，却反過來指責別人，如何能自圓其說呢？

對澳大利亞友人、國家黨及澳大利亞政府關注楊巍的人權，我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中國駐澳使館就楊巍案的答覆

（羅惠平譯）

馬克·里葛雷先生：
本人謹代表張再大使回答閣下於本年七月九日來函詢問有關楊巍被捕一事。
楊巍原為中國科學院生化研究所的研究生，於一九八三年八月赴美美國深造。自一九八六年五月返國後，就開始對政府採取敵視的態度

，公開叫囂要在中國實現「民主政變」（democratic coup d'etat）。去年在各個大學張貼反動標語及大字報，投寄、散發反動宣傳品，煽動學生鬧事。他的行動已違反了我國法律和憲法，上海市公安局於本年一月，在完全合乎法律程序下，把他拘捕入獄。
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美國或其他地方，楊巍與之有關的某些組織，正利用此事件發動一場卑鄙的反華運動。我們希望澳大利亞的朋友們，不要被他們的行為所欺騙。

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澳大利亞大使館
一等秘書

周錦明 謹啓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USTRALIA

22 September, 1987
Canberra

Mark Wrigley
68 Mortimore st.
moorabbin
VIC. 3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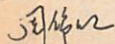
Mr Mark Wrigley,

I refer to your letter to Ambassador Zhang Zai dated 9 July concerning the arrest of Yang Wei. I have the honour to reply as follows:

Yang Wei was formally a postgraduate in Biochemical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e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study in August, 1983. Since his return to China in May, 1986, Yang has adopted a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the Government. He clamoured publicly that he wanted to bring about "a democratic coup d'etat" in China. Late last year he put up reactionary posters and circulate illegal literature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agitated students for demonstration. As his acts have violated the law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untry, he was arrested in January this year by Shangha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complete conformity of legal procedur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some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or elsewhere to which Yang Wei was related are using this case to launch a smear campaign against China. We hope that our Australian friends will take care not to be misled.

Yours sincerely,



Zhou Jinming
First Secretary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就楊巍案

答覆澳大利亞國家黨魁

(肅爽譯)

澳大利亞國家黨黨魁
洪·顏·辛格列先生：

(從略)

我們所了解的楊巍案事實如下：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楊巍在他父母家中
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

▲上海當局開始時否認此案一切傳聞，而
後在二月六日才證實楊已被捕，並正在偵訊中。

▲據稱楊以「張貼反動標語及大字報、投
寄散發反動宣傳品、煽動學生鬧事」的反革命

罪名被捕。

▲家屬欲與楊直接聯繫的各種努力都沒成
功，上海市公安局只同意寄送一些食品包裹給
他。

▲直到五月廿日此案仍未送到檢察官處，
我們也無法獲得更進一步的消息。

被捕者在偵訊期間不允許其家屬或朋友探
視，在中國已成慣例。根據中國法律，偵訊關
押期限不應超過三十天，但因特別情況，在偵
訊當局的具體要求下，可以延長此一期限。儘
管如此，這麼長的偵訊期限仍是不正常的。

在中國最近的政治氣候下，此案多數被當
作敏感案件，而且中國當局可能藉此設置一個
準則，表明未來發生的類似案件都必須受到審
判。它也被視作一種禁令，以警告那些會採取
類似行動的人。在此案作出最後判決前，不可
能有一明確的評估。

本部調查顯示：中國方面不願提供更多的
消息。這一漫長的查詢，使我們越發感到此案
的高度敏感性。

本部將盡一切可能克服困難條件繼續追蹤
更多的消息。不管怎樣，任何進一步的具體行
動均視楊巍何時及是否會受到裁決而定。

外交部長
國會議員

比爾·海頓 謹啟
(Bill Hayden)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日

●文藝園地●

贈郭城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楚人

我來尼加拉，
一覽此奇觀。
大江嶼白練，
神工斷幽谷。
珠簾罄巨石，
薄紗弄飛虹。
蹄驚躍深峽，
潮急送遠途。
神馳故國境，
魄遊太虛中。
我有黃菓樹，

詭譎人莫測。
我有壺口瀑，
橫臂隔關岳。
我有奇男子，
其名曰郭城，
燕趙慷慨士，
豐沛布衣弱。
公庫書海外，
東林優紫閣。
陳生再蹈海，
鄒君重入獄。

空懷報國志，
敢吟「子夜」歌。
易水復蕭蕭，
荊卿骨如柴。
一別走金山，
踏上不歸路。
北美貫脚下，
悲風動河朔。
形羸影更單，
腿傷負重荷。
望君踉蹌行，
日酸不忍卒，
念此長唏歔，
昊天可奈何？

快速滙款公司

FAMILY REMITTANCE INC.

紐約市堅尼街221號林肯銀行樓上517室

221 CANAL STREET, SUITE 517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 966-2631 1-800-624-3216 外州免費

所有滙款都有
全額保險

您要滙款至
中國大陸嗎？

本公司專理，歡迎支票、信用卡
優惠滙率（比銀行高）
快速信實（只需四至五天）

郵寄滙款申請書

請轉付下列滙款：

Please effect the following remittance:

美金 Amount in words	M/F#	人民幣 RMB
收款人姓名 Payee's Name	滙款人姓名 Remitter's Name	
地址 Address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ephone	

繼十月六日美國參議院以壓倒多數票通過西藏人權修正案之後，十月八日又一致通過了要求立即釋放楊巍的赫姆斯提案。據外電報導，在華盛頓的中國新聞社和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都已就這兩個提案提出了強烈抗議。人民日報也在十月八日、九日、十日、十一日連續報導了西藏人權修正乙案問題，多次抗議在西藏問題上美國政府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並稱西藏人權修正案是反華修正案。

然而，對另一個更為敏感的提案——楊巍，並指責修正案誇張地說有兩千多名（在美）中國留學生（今年早些時候）在一封公開信上簽了名，而實際上簽名的學生僅有一千多名。顯然，中新社在這裡玩弄了一個騙人的花招，有意識地把今年一月一千名留學生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信件與今年五、六月份何東昌副主任訪美之後，兩千多名大陸留學生聯名寫信給美國參議院參議員赫姆斯先生這兩封信時間，收信人地點，收信人姓名絕然不同的兩封信混為一談。由於赫姆斯方案開宗明義即已表明該

●留學生專欄●

中共不敢公開報導

赫姆斯提案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張朝

一修正案中其當局竟保持了出奇的沉默。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中共報紙向國內人民或向國外的留學生報導一句有關楊巍提案的消息。中共的這種不正常的難堪的沉默更加證明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空虛無力，中共政府已墮落成爲一個完全沒有信心的政府。同時這一沉默亦引起社會上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廣大留學生的警覺。

由中報發出的消息說；中新社指責美國對那些有證據的證明自己會被指控的中國留學生以留美的方便是否歪曲了中國對留學生的態度

提案是應兩千餘名大陸留美的留學生要求而形成的，僅就提案的起因而言就已經觸到了中共的痛腳，致使中共不顧臉面竟然玩起既不能騙人但又不能騙己的拙劣把戲，使這一盤棋尚未開局即已失手了。

大之後，中共一旦空出手來就會對留學生施以更加嚴厲的懲處。盡管中共一再宣傳不會對一月簽名的留學生迫害，然而縱觀中共一貫置知識份子於死地的劣跡，再看現在方勵之、王若水、蘇紹智、吳祖光等有良心的知識份子被清算，還能指望人們再天真地上一次當嗎？更何況，中共不肯承諾六月聯合簽名的兩千多名學生不會遭到迫害，已經給日後中共整肅留學生埋下了伏筆。

爲了整肅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侵蝕的留學生，中共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在今年五、六月份訪美期間曾拋出了臭名昭著的「何東昌方案」，旨在驅回大部份留美學生，並設法協助一批高級軍政幹部的子女合法定居海外。由於近年來，國內人民對高幹子弟的飛揚跋扈日漸不滿，太子黨直接進入軍政高層已日漸受阻。也由於中共內部紛爭已日趨白熱化，任意安插子女接班已受到對立派系的箝制，還由於中共元老養尊處優頗多長壽，又不肯主動讓位，僧多粥少高幹子弟競爭激烈。更由於中共高層決策人士對動蕩的政局亦缺乏信心，急於要安排子女移居國外，置房置產以備不測。因此，何東昌方案的出籠實際上是中共安撫軍政要員的一副良劑。

由於廣大留學生不滿旨在整肅留學生的何東昌方案，因此用聯合行動表示了他們的意願。赫姆斯方案的無異議通過，打亂了中共的如意算盤，何東昌方案大約也僅僅是廢紙一張了。作爲不事國是，以整老百姓爲專職的中共，是不會嚙下這口窩囊氣的，他們還會在沉默中設計出多種花樣誘騙脅迫留學生回國。有識之士認爲，中共的這種不尋常的沉默預示着可能會有一場大的屠戮出現，廣大留學生只有團結一致，抗爭到底方有可能避過劫數。

民進黨中的台獨陰影揮之不去

(華僑·美國) 周立仁

「台獨」是困擾台灣政局的一個長期問題，以往在台灣不要說是搞台獨活動，就是發表主張或讀同台獨的文字、言論，都會被判處重刑，今天許多在海外的台獨份子，有許多是偷渡到日本和美國的。

然而現在情形不同了，台灣解除了戒嚴、廢除了報禁、開放了新政黨的成立，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已先後有工黨、中國自由黨、中國民主正義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民眾黨繼民進黨之後宣告成立，而民進黨中的一些激進份子，更不斷公開提出台獨的主張。

將近四十年來，國民黨先是強調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文化、血緣、語言、宗教、習俗等等不可分的關係，甚至還有學者「研究」之後，發現原住民山地同胞是從中國西南遷去的。主張台獨的人當然不理會這套，他們說他們是台灣族；他們說今天在台灣「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小部份」；他們否定國語（普通話），說是「要講媽媽的話」；他們要「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國民黨在撲滅不了台獨的行動和主張後，開始提出台灣獨立會招致中共出兵的危險。國、共兩黨水火不容，但反台獨的立場是一致的。

民聯的王炳章先生也在中國之春上談過獨立、自決的問題。王先生在文中說，中國的任何一個省，乃至於台灣的任何一個縣市是否都可要求獨立、自決？我在此可以告訴王先生，有些台灣人看了之後說，「當然可以」，還有些台灣人說「為什麼不可以？」看中國之春的台灣人以高級知識份子居多，可見各種立場的反台獨說法，都不會被這些人接受的。

而在台灣島內，民進黨的一些激進份子一面在議壇上進行語言暴力、在街頭上進行不理性的群眾運動，並公開提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國民黨於是由行政院長俞國華正式宣佈，主張台獨就是違法，將「依法處理，別無選擇」。同時決定傳訊提出「台灣應該獨立」的蔡有全、許曹德。這等於是向民進黨攤牌。

民進黨的二全大會雖然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日，以一七七對六票的懸殊比數，否決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黨綱，但却以決議案的聲明方式強調「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另外還通過「先就台獨問題廣徵各縣市黨員意見反映後，提交下一次全代會繼續討論」。

同時在十一月十日的會議上，坐過國民黨牢，長期與國民黨對抗，在高雄縣選舉中予取予求的黑派大將余登發，提案要求修改黨章，在黨綱前言中增加一段文字：「民主進步黨之精神以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犧牲奉獻為宗旨，為大眾服務，始能成功執政，建設世界上最民主、最富強的中國」。他並解釋說，他所以堅持民進黨黨綱前言要增列「建設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富強的中國」，是因為事實上已經指出，台灣獨立，絕對沒有前途。但是表決的結果只得到二十個人的支持。余登發大怒，當場表示要退出民進黨，憤而離席。

由以上種種，讓人懷疑，民進黨可能只是以決議案的方式代替黨綱，強調了「人民有主



美國眾議員索拉茲(右三)

經常參加民進黨的政治活動

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不變宗旨。民進黨的新主席姚嘉文在當選後接受訪問時也說：「我們始終堅持根據住民自決的基本原則，以人道原則、平等立場及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對抗：：各方對台獨的反應，國民黨已明白表示了不容「主張分裂國土」。中共也在十一月十七日由人民日報發表「民進黨宣揚台獨不得人心」，以及同日香港文匯報「斥台獨的謬論」的社論，認為台灣長老教會、政治受難者聯誼會和民進黨關於台獨的言論，「實際是政治行動的前奏」，一旦台獨活動嚴重危及統一，北京「是不會置之不理的」。主張台獨的人認為，台灣獨立可以擺脫中共的干預。但文匯報的社論說，「事情恰恰相反：：爲了維護領土、主權及祖國統一，將被迫干預。」

中共的領導人也不止一次的表示，中共會在台灣出現親蘇、獨立、內亂的情形下，對台灣出兵。國民黨也常提醒在台灣的住民，主張台灣獨立勢必誘使中共對台灣從事軍事冒險。台獨在海外的活動據點，以日本和美國爲主，當年被國民黨軟禁的彭明敏，就是由日本人弄出去的，先到歐洲轉一個圈子再到美國落脚，但近年來主要的活動已集中到美國。

美國雖然在傳統的作法上，一向是扶植一個反對力量對抗執政黨，但在與中共建交後，已一再表明「同意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無論它如何優容台獨在美國的活動以及在國會的遊說，在現實的政治作法上，美國不能公開支持台獨。在另一方面，維持一個台灣的安定局面，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台灣宣佈解嚴、開放黨禁都是美國所歡迎的，每當中共聲明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美國必然接着表示反對。

至於美國的一些議員，在重大問題上或緊

要關頭時，也多半不會與政府的政策唱反調的。與台獨人員關係最密切、接受美國台灣人團體捐獻爲數不小的甘迺迪、裴爾兩位參議員，和索拉茲、李奇兩位衆議員，儘管肯爲他們效勞在國會中提出令台灣當局難堪的決議案，但也不得不在口頭或文字上，讚揚台灣的經濟成就、民主自由的進步。

以李奇衆議員爲例，他在華府會見台灣來的「中美平等貿易促進會」一批民間人士時，就明確排除台灣獨立的可能性，也明白表示根本不支持這一類較激進的看法，他以前也再三告訴黨外人士，他個人不以爲台獨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行方案。李奇還表示了訪問台灣的意願，希望能實地看看台灣近年來的政治、經濟進步情形。

比李奇名氣要大、權勢也較大的索拉茲衆議員（因爲他多年來一直擔任衆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已親自到台灣去看過。這些人的政治生命建築在自己選區的選民上，沒有那一個美國政客會傻到或有心思成天去爲一批與他不相干的人的政治目標去費神。政治捐獻不論如何龐大，在份量上抵不上選區選民的一票。

在各種主觀、客觀的形勢下，民進黨很高的沒有把「台獨」主張列入黨綱，暫時避免了與國民黨的正面衝突，以便保存實力，但同時以決議案的方式強調了這一主張，安撫了黨內主張台獨的激進派，避免了內部的分裂，而且還更進一步的要廣徵各縣市黨員意見反映後，提交下一次全代會繼續討論，以便在有利的時機隨時另作處理。

國民黨在這種台獨陰魂纏擾下如何因應。國民黨說過，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它的意思是說，中國問題解決了，台灣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但是，像國民黨今天的種種對大陸政策，如何能解決大陸問題？所以國、共兩黨今天都要爭氣，趕快把自己的政治搞好，並把眼光放到全中國，才能理直氣壯的叫這些人不要搞台獨。當中國的政治真正達到「世界上最民主、最富強」的地步時，任這些人撐破嗓門高喊台灣獨立，相信也不會有什麼人贊成。

廣州餐館

KONG CHOW RESTAURANT, INC.

48 CENTER STREET, RUTLAND, VERMONT 05701

TEL: (802) 775-5244

正宗粵菜 · 名廚主理

精美菜式
大宴小酌
堂食外賣
價錢公道

第五個現代化

——台灣應採的民主過渡方式

·中國民聯常委·(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張俠

一、什麼是民主政體？

道爾(ROBERT DAHL)將民主政治定義為「多元政體」(POLYARCHY)，即一個「相當自由化，普及化，有高度的包容性及在政治上公開競賽」的政治制度。在此政治體系內，公民可以自由組織結社，在選舉中能自由選賢，而政府領袖也能透過選舉對民意負責。

相對而言，權威政體是一種「對政治競爭有明顯的程序限制」的制度。以中華民國為例，權威政治是經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國民黨政府的「行政政變」(EXECUTIVE COUP)而產生的。那時，民主政府成立祇有十六個月，國民黨佔多數的國民大會宣佈臨時條款，凍結了憲法中具關鍵性的民主條文，同時實施戒嚴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撤往台灣，此後，台灣就一直生活在戒嚴令的管制中。其間，國府雖然四度修正臨時條款，但至今台灣仍處在權威統治下的狀態。

二、規範性的架構

當探究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民主，怎樣從權威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等問題時，先要有規範性的標準，並以此做為政治行動的指針。

在此，我建議台灣追求民主化過程中應有以下五項規範：

第一，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非暴力的。

第二，由於中共的武力威脅，台灣的民主化應該不擾亂社會與經濟，以免給中共制造干涉的藉口。

第三，民主化應該避免報復，不得對過去的政府官員予以報復。不僅因為台灣的權威主義政府還算溫和，而且在過去卅多年中，國民黨將台灣從一個落後社會轉變成新興工業社會，這方面的成就應該被肯定。

第四、台灣的民主化尚需一段時間的培養，民主化的充份完成須有一定的必備條件。其中，有兩個先決條件特別重要：經濟發展與人民的政治修養。

就經濟發展而論，李普塞(S.M. LIPPSETT)認為，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應有以下的經濟條件：財富、工業化、都市化、教育、牢固的中產階級。就政治文化修養來看，艾克斯坦(H. ECKSTEIN)提出政治民主化須與社會民主化相協調的論點。艾克斯坦認為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必須在社會上有一致的權威模型(CONGRUENCE OF AUTHORITY PATTERNS)，亦即是人民對政府權威的態度應與人民對其他社會系統(例如政黨、利益團體、工會等)的態度相一致。簡單來說，穩定的

政治民主主要靠社會內部各種團體機構本身的民主化水平來實現。若社會團體缺乏民主的權威態度和關係，政治縱使民主化亦不能持久穩定。台灣民主化的經濟條件大體上已具備了，問題在於人民的政治文化是否符合民主水準。

第五，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須是穩定的，有秩序的，且持久的，這樣才能產生一個有意義、成功的民主社會。這種民主當然繫於民主的先決條件是否成熟。李普塞認為，若新社會不向過去的政府官員尋求報復，成功的可能性將隨之增加。

三、民主化的類型

謝爾(D. SHARE)在民主化的比較研究中，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掌權者是否贊成民主化」。假如執政者容忍或主動倡導民主化，則由權威體制過渡到民主較能保持政治體系的持續性與穩定性。若統治者提倡民主，則變遷較易受控制，可阻止或減低擾亂社會的動亂。執政者在民主化的前後，都不會失去民心。

若民主化得不到掌權者的讚許，那麼首先執政者就面臨失去民心的危機。就算民主化仍能進展并取得成功，新的掌權者對過去的政權可能會毫不留情。在此種型式的過渡中，經常發生暴力行為。清算、流放、拘禁、公審、屠殺等都曾派上用場，政治上也極不穩定。當民主化得不到權威政體的同意時，就算民主政體建立起來，由於民主化的過程充滿危機，致使新舊的政治制度、符號象徵、政治文化，與社會經制度產生嚴重的脫節，繼而造成新生的民主政權許多不穩定與無效率的情況。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過渡是漸進的還是激

進的。漸進的民主化是超越一個世代完成的民主化過渡，其主要優點是其穩定平衡作用。但是此種民主過渡可能是各種過渡方式中最難履行的一種。歷史上，除開英國或某些北歐國家外，沒有別的漸進民主化的例子。至於激進的民主過渡，雖然有其直覺上的吸引力——若民主是個好東西，那愈快愈好——但較易形成政治不穩定。

依據上述變項，我們可以列舉出四種民主化類型：

第一，漸進主動的民主化。民主化得到執政者的同意，甚至於積極參予扶助，且過程和緩。

第二，急進主動的民主化。民主化由執政者發動，但進程過急。佛朗哥死後的西班牙即為一例。

第三，長期革命鬥爭所導致的民主化。當權者對民主力量不妥協不容忍，逼迫民主份子採取非民主的暴力手段推翻執政者。另一方面，當權者十分強大，使革命鬥爭特別持久。

第四，經破裂而產生的民主。民主化得不到執政者的贊同，經由短期暴力革命達到。此類型可經由下述方式達成：

(一)由群眾發動暴動。法國大革命是一個例子。(二)經由政變達成。葡萄牙沙拉薩死後的民主化屬此類型。菲律賓最近的革命是混合政變與群眾暴動兩種方式。(三)權威政體崩潰。崩潰的原因通常是被外國擊敗，戰後德、意、日等國的民主化可劃歸為此類。(四)自動遷政。權威政體人心喪盡，不能再繼續統治下去，而將政權突然地交給民主反對派。福克蘭戰役後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之自動遷政於民，就是這種方式。

張俠在北京天安門



四、台灣應採取漸進民主化過程

國府的民主化應效法第一種類型，執政黨應採取主動的態度，且力使過程和緩。如此，民主過渡時期不單是非暴力的，且因此類型民主化不擾亂社會秩序，亦能較少讓中共製造干涉藉口。民主化若出自於執政黨，亦較少有將給各方尋仇報復的機會，同時穩定的民主化也

較可能成功。

主動而漸進的民主過渡，實施起來比較困難，至少具備五個條件：①執政黨贊成民主化；②反對黨與執政黨互相合作；③執政黨對民主化表現出誠意；④有技巧圓熟的政治領袖；⑤穩定的外在環境。茲逐項討論。

①執政黨贊成民主化。無論基於現實考慮或意識型態的驅使；主動而漸進的民主化必須由執政者領導發動。國民黨既是能考慮現實的政黨，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含有民主化理念。這兩方面都對民主化有利。台灣充份成熟的中產階級的民主化呼聲，以及美國的壓力，也是有利因素。

在權威政體中，反對民主化最力的是政府的保守份子和軍隊。民主化若要成功，必需有這些保守份子的默許。李普塞曾謂「若保守份子的地位與信條能確保，即使他們失去了權力，民主化似乎也繼續。」就台灣而言，這意謂着國民黨須保持黨內保守份子特別關心的信條。其中，最重要的是維持國民黨與中國大陸象徵式的聯繫，避免台灣的獨立。一方面台灣獨立將造成中共進犯台灣，另一方面台灣亦將造成執政黨內保守份子的激烈反對。為此，台灣的民主份子應避免堅持走台獨這條路。

最後，謝爾認為有兩種情況會增加權威政府自動民主化的可能性：若執政者愈感覺安全，愈可能更進一步推動民主化。此外，若新一代能當權——特別是沒有與權威政府創始有直接關連的新一代——也會使民主化較順利進行。

②反對黨與執政黨相互合作。主動漸進的民主化的第二個條件是反對黨能與執政黨合作。謝爾認為，若執政黨強而有力，則反對黨基於現實考慮，較可能採取和平的方式推動民主

化。但是，反對黨能否與執政黨合作亦要看雙方方面能否避免意識形態上的僵化，在該溫和時應採取溫和路線。

最後，反對黨能否與執政黨合作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執政黨能否和反對黨分享權力。如李普塞所說：「每當新份子政界開始活動，若能被允許進入正統的政治機關，他們便能建立起對政治制度的忠誠，亦會允許舊統治階層保持其地位。若執政者長期拒絕新政治份子參權，限制他們的政治進路，那麼這些反對份子便會離心離德，愈會採取極端的手段。」

③執政黨對民主化表現出誠意。主動漸進的民主化是長期性的民主過渡方式，特別需要反對份子的耐心。為了平撫反對派的猜疑與憂慮，執政黨須顯示希望民主化的具體證據。執政黨表現民主化的誠意，可有數種方法。最基本的是，應消除權威統治下的最惡劣的特色。以台灣來說，此即為戒嚴令，及其從屬的對自由言論、集會與新聞的限制。安全法令能代替戒嚴令確保國家安全的作用——但國安法應「有理」，即能允許負責任的反對黨成立并且出版其刊物。國安法的用詞亦須清楚明確，以免產生誤解或被人反覆無常地解釋。

再者，執政黨對那些最具權威性的組織（如負責國家內外安全防衛的軍事與安全單位）也須使其正常化。軍事專業化的方式有：（甲）指定文官當國防部長；（乙）任職的軍官不能兼任政府內非軍事之職；（丙）教導軍隊其職能祇局限於對外的安全防衛，且軍隊應忠誠於國家憲法，而不應忠誠於國民黨。至於內部安全機關，此為權威政治的最惡劣的特徵。負責國內安全的組織必須規則化，應對立法院的人民代表負責，而不是像目前這樣，通過國家安全會，它祇對蔣總統個人負責。

最後，另一種表現民主誠意的方式，是創造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台灣的經濟發展已創造了經濟上的先決條件。剩下來的就是艾克斯坦所說的「一致權威關係」的民主政治文化。台灣種種的自願協會尤須民主化，包括政黨、各種利益團體、商團與工會等等。

執政黨若要獲得民主反對份子的信任，必須讓其分享權力，允許反對黨在政界進取。台灣已經有競爭性的選舉，先是讓個人競選，最近（即去年十二月）允許反對份子成立民進黨參加競選。台灣可進一步開放，唯有當反對派不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它才不會走極端。波瓦爾（POWER）認為，暴動、抗議與暴力的增加是與極端政黨的統治密不可分的。

④有技巧的政治領袖。第四個條件是一個人為的因素。在從舊制度向新制度過渡時期，個別人物起着重大作用。因為主動漸進的民主化是各類民主化方式中最困難的方式，此種民主化對政治領袖的要求也比較高。

執政黨內的領導階層不但須克服黨內的保守勢力，且須贏得反對黨的信任。同時，執政黨的領袖須塑造民主政治的文化觀念，并保持政府效能。

漸進長期的民主化方式亦需要具有卓越政治技能的反對黨領袖。反對派的中堅須有彈性，避免意識形態的僵硬。他們須能妥協，避免採取極端的姿態，能調和執政黨內的保守勢力，不採取過份對立的態度，同時也要有耐心，不可期望民主一蹴而就。

⑤安定的外在環境。主動漸進民主化最後的一個條件對台灣特別有關，此即有充份安全的環境。前已論及，權威政府覺得強大安全時才會自動民主化。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保守勢力最容易以此為藉口，要求延長權威統治。

台灣的安全要看中共。因中共堅持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統一的權力，台灣的安全有賴政府保持有效的國防力量。要達到此一目的，美國必須保證繼續賣武器給台灣。

五、結論

本論文的建議是台灣應採取主動漸進的民主化方式。此種方式不單是非暴力的，不會擾亂台灣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發展，亦不會導致將來民主政府成立後權威政府的官員受到懲罰或報復。因此，此種民主化是適時的，最能產生成功而穩定的民主。亦即是說，主動漸進的民主過渡對各方面都有利，本質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但此種民主過渡方式實施起來并不容易。以台灣而論，實施起來更為困難。因為有些因素很難掌握，例如中共對台灣的侵犯意圖以及美國的對台軍售都不易控制。雖然如此，台灣仍能控制其它因素，尤其是控制在此過渡中兩位最重要演員——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行動。若要民主過渡成功，反對派須忍耐抑制，摒棄意識形態上的極端立場而走緩和妥協之路。漸進的民主過渡能否成功，更有賴於權威性的執政黨。它須有實施民主的誠意，且能控制保守份子與軍方；它須有開闊的胸襟，與反對黨分享權力。

亦即是說，主動漸進的民主過渡方式需要執政黨與反對黨兩方面都能表現出理性態度，具有自制、溫和、妥協的精神，放棄單方面利益，以求全體人民的幸福。若執政黨和反對黨能夠實施此種精神，那麼也就符合了民主政治的種種要求。因為溫和妥協的政治手段就是民主的本質。

海外無產者的煩惱

(中國大陸作家·法國)張諄

最近的煩惱，是發覺自己無論如何，都與「愛國華僑」這一美好的現代詞掛不起鉤來。

最早最大的愛國華僑，大概就是建造了「廈門大學」的新加坡華人陳嘉庚先生吧，整整的一所大学，五、六棟的大洋樓。雖然忘記了安衛生設備，上廁所要走到外面的茅廁，以致害得魯迅先生過去在此任教時，小便在盆裏，趁人不備從窗戶拋出，但錢用的仍是不少。目前頂有名的愛國華僑就是包玉剛和霍英東等殖民地巨富，也是往中國投入了好多錢後才「賺」到的美名，霍氏似乎在廣東造了個「高爾夫球場」，包氏則在京蓋了「兆龍飯店」等。另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時時見到某某愛國華僑「捐贈」、「合資」、「貸款」等消息。

這些和錢有關的字眼在我眼裏是來晃去，直晃得我心灰意冷，我的錢，別說蓋大學，連外面的茅廁也蓋不起。「高爾夫球場」嘛，我想那是貴族的娛樂，我興許連買個打球的拍子都要三思而後行呢。兆龍飯店，我只進去買過兩包香烟，飯沒吃過，覺更不敢去睡，所謂「總統臥房」，僅聽說過而已，因為一睡，就睡跑了一個月的飯費。這樣「進都怕」的人，還配說「蓋一座」的大話嗎？

我的不配愛國，無法愛國，一切的罪過全在于自己的「無產階級身份」，報紙上的「愛國報導」，使我明白愛國是「資產階級的權力」。

我們這樣的「海外草民」，既然得不到祖國政府的重視和封賞，那麼就乖兒地掙錢糊口吧。可又不服氣，總想要關心關心祖國，做

點與國有益之事，于是我決心用筆，經常批評批評祖國，找出祖國的毛病來，加以鞭撻，為的是使祖國更加健康、進步。

如此地用筆苦戰，也熬過許多不眠之夜，耗掉許多青春的頭髮，却始終不見人民日報「海外版」對我有表彰。不屑一顧嗎？甚至還要仇恨，以為是賣國的。

當不上愛國華僑也罷，當愛國人士吧，漸漸發覺，愛國人士也是難當的，首先因為自己不夠壞，私心不夠重。當初李宗仁回國時，飛機場萬眾歡迎，鋪着紅地毯，國家主席親自迎接，原因是李氏名氣夠響，當過「民國代總統」，殺過成千上萬的共產黨，雙手沾滿人血。想想我回國時，機場上只有我媽媽和我姐姐兩人，多麼淒涼。就因為我沒有殺過人嗎？沒當過共產黨死敵國民黨的總統嗎？可李宗仁竟是「愛國人士」，我却只是「草民」，「反華分子」。或者我也偷一架國民黨飛機開回中國去，這偷公家的飛機逃跑，行為雖然惡劣，但我這一回國就是「黃金萬兩，美男洋房」，並且立時成為「愛國人士」，出席國宴。但我做不出，我不能為了個人利益就偷人家的貴重物品，並強迫同機人員一起飛，我是講德性的人道主義者。

或者試試「友好人士」，像韓素音等一樣，無恥地寫出許多吹捧文章，不倒翁似地追着中國政治風向轉作一團，任那中國人民的血白白淌入大地，反正自己得個每年應邀回國的光榮，並收到祖國「四合院」一座的厚禮；爾後再十分輕率地對西方人說：「我對中國政治不

感興趣，我只要賺錢。」嗨，這本來該是好作的，但是一摸，自己居然還有臉。沒錢而又要臉，可見像我這樣多麼不幸。

於是，終於覺得自己愈來愈不行了，簡直報國無門了，只好「草」下去，若還不肯放下以筆愛國的熱情，甚至有繼續把國「賣」下去的危險。

國內的長輩們那麼天真，曾囑咐我「到了國外，要和自己的大使館取得聯繫，參加一些與祖國有關的活動。」我就等，不見大使館招呼我去「參加活動」，去辦證件時，也不見館裏貼有告示叫「草民」們來使館「晚宴」，唯有在報紙常見些「紅色名流」和「紅色資本家」們歡迎新大使，或歡送舊大使的消息。後來聽說大使館每逢國慶定開宴會，招待「愛國華僑和各界人士」，去者又是些華人潤佬和「官人們」，草民一律拒之門外，國家之慶大概只是有錢有勢之人的事情了，我又不配不配去了。

趙紫陽總理、胡耀邦總書記來法國訪問，巴黎市長提供市政大廳接待「華僑」，打工的和我這寫稿渡日的「小人們」都沒收到請柬，又讓「剝削工人」的華人資本家去了，好像只有一個半知識分子半畫家的人被請去了，這可能是寫錯了名字才掉下來的運氣。其實祖國推翻資產階級的歷史重任應該依靠我等才是，我等深受「資產階級壓迫」，國內政府來了該站到我等一起和資本家鬥爭才對，誰知竟和資本家碰香檳酒去了，那麼，我們無產者的未來呢？共產黨放棄窮人了嘛？心不由寒澈……

歌曰：

我欲愛國兮，沒有錢；

我欲友好兮，怕丟臉。

我欲報國兮，找不到門坎。

加拿大移民服務中心

1. 提供各種加拿大移民資料
2. 代辦加拿大移民手續
3. 幫助聯系加拿大聘用單位

- 有知識技能
- 有加籍親屬
- 有足夠資本

均可移居加國

本公司優待留學生，

收費僅為一般律師的一半

Tel: 718-476-3700 Mon-Fri 10 a.m. - 6 p.m.

通訊處： 84-02 Roosevelt #28 Elmhurst, N.Y. 11373

請來函來電詢問手續及費用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
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
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

本會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思蜀（會長）（已獲得政治庇護）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Jackson Heights 朱永祥（理事）（已獲得政治庇護）
New York 11372 TEL: (718) 898-9700 劉翔（理事）（正申請政治庇護）



● 請勿繪圖 ●

● 迎接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 ●

中國民聯總部募捐呼籲書

親愛的僑胞、讀者們：

中國形勢蘊育着巨大的變革。鄧小平死後、甚至在死前，中國形勢將有巨變。中國大陸結束專制制度並向民主政體起步的時機正在逐步成熟。

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亟需一支獨立政治力量的興起。中國民聯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成立三年多以來，民聯已在中國大陸和全世界建立了廣泛的組織網絡。在去冬震撼全國的學運中，民聯發揮了一定作用。

在十二月底，民聯將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研討形勢，制訂策略，選舉新的協調機構，提高民運的理論和組織水平。

參加民聯代表大會的很多代表是留學生，旅費仰賴各界捐款協助。為使這次大會順利召開，我們呼籲各界解囊相助。

您的捐款，可獲減稅。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亦歡迎捐款者與我們個別聯絡。

凡捐助者，我們將致以感謝狀，歷史將記錄下您對中國民運的貢獻。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 46 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話：(美洲) (718) 429-6777；

《香港》 3-7710410

■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8.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